

社会主义的 政治与经济

W·布鲁斯著 何作译 绍文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

W·布鲁斯 著

何作译 绍文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17 9685 0

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 1/4印张 122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500册

统一书号：4190·084 定价：0.54元

中文版序言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中译本撰写这篇简短的序言。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于社会主义和整个世界的前途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本书出现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在重新审查过去的经验并制订新方法之时，其意义不论多小，也不同于一般。

我无需重述本书的内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已故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为英文版写的序言已明确地阐明本书的主要思想，当然是让读者自己去探讨和评价书中提出的论点。我想说的是，在中文版（如同在1978年出版的日文版）中，除了最初的七篇文章——几乎全部写于六十年代，当时作者仍在波兰生活和工作——还补充了四篇较新的文章：

《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的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试图提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波兰的物价问题和政治》；《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二十年后》——根据欧洲第二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考察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为了解决二十世纪末人类面临的问题，试图提出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增加的几章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写于前一版出版以后，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与阐明本书的主要思想很有关系。这个

主要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牢固的、也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

多年前，我曾有机会(不幸的是这种机会不多)拜读过中国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著作的译文。在最近一段时期中，中国作家们又重新出现在政治经济学舞台上。后来，我十分幸运在1979年12月到1980年1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难忘的访问期间与中国经济学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所有这些经历使我深信不疑：如果条件允许，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分析批判能力。这意味着一篇译成中文的著作可能会遭到深刻的批评。我完全了解，我自己的著作也有遭到这种批评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交换观点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唯一所能期待的途径，反过来，社会科学理论的真正发展又是建设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W·布鲁斯

一九八〇年二月于牛津

英文版序言

布鲁斯教授的名字逐渐为我们所熟悉，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国家，都是由于：第一、1956年的小册子《价值规律和经济刺激问题》；第二、1961年题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的比较大部头的著作，对关于计划经济中的市场作用的争论贡献了重要的新思想和崭新观点的结果。^①第二本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个重要理论上的争论——即二十年代中期苏联的争论，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争论，以及斯大林死后五十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计划化的经验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在波兰的争论。

不过，本书所收集的论文和随笔，不仅对关心东欧各国计划经济中六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有关问题的人，而且对更大范围的人来说也是感兴趣的。下列某些论文和经济改革有关。但那些论文（事实上如同作者所强调的）同斯大林死后，特别是1956年以后在东欧各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所进行的争论相联系，也和更广泛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工业内部的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有关。我想大多数读者会由于作者把问题公式化和进行讨论时的坦率、无所畏惧、明晰性和平衡感而有强烈的印象。这种坦率程度是以前在这一类的讨论中很少看到的。

他的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是在作者从1956—1962年差不多同时担任了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

司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期间。在这样的地位上，他是已故奥斯卡·兰格 (Oskar Lange) 教授的亲密同事。在起草1956—1957年波兰经济改革 (当时政府原则上采纳了、但终于未能有效而全面地付诸实施) 的一部分草案时，他和另一位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 (Michal Kalecki) 也合作过。所以，他不仅是作为理论家，而是带着计划化和经济管理问题的若干经验来说话的。战前，他是华沙自由大学学经济学的学生。二次大战期间，大部分岁月都是在苏联渡过的，在1956年以前，他继续在华沙计划和统计大学 (兰格和卡莱茨基两人有一段时间也在这里任教) 学习，随后登上了讲坛。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还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附设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过政治经济学讲座。1968年以后^②，担任住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在作为格拉斯哥大学客座人员留在英国。^③

从本书中选出某个特定部分或思想来进行专门论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如果要试图这样做，那末作为值得特别考虑和议论的问题，下列各点应引起英国读者的注意。第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作为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就解决了的行为的这一概念。这个概念中有随后需要继续向前“加深它的社会性—这是和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总体有关的发展—”的含意 (对德热拉斯 (Dilas) 和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的某些尖锐评论，也是在这个上下文中进行的)。第二，他对于和分权有关的种种论点的论述。这是明确地在第一章中进行的。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也有所论述。第三、特别在第五章中他所强调的关于在社会主义计划化中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的互相渗透 (必须抵制在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想要从政治经济学中排除这两个术语中任何一

个的倾向)。最后，是从意大利《再生》(Rinascita)周报译出的关于1970年12月波兰事件的、他的启发性(即使可能是有争论余地的)分析。在此出版英文版之际，谨向作者、译者和出版者一同表示祝贺。

莫里斯·多布

注 释

① 两本书都是由华沙国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后者在1970年出法文版，1971年出德文版，1972年出英文版(1971年出日文版——中译者)。

② 布鲁斯因与1968年3月的事件有牵连，被免去华沙大学教授——日译者。

③ 布鲁斯现在是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客座教授——日译者。

日文版序言

这次日文版增加了四篇论文，在过去意大利文版（1972年）、德文版（1972年）、英文版（1973年）和西班牙文版（1974年）中是没有的。其中的第一篇《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我在牛津大学经济学统计学研究所的讲义稿，通过这篇东西，试图提供一位经济学史上伟大的智者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其它两篇，《波兰的物价问题和政治》、《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二十年后》，是根据本书中所展开的基本命题的观点，对最近波兰经验中若干方面所作的探讨。这几篇论文最直接的意义是英文版中最后的论文《矛盾和它的解决方向》（是本书第八章）中所分析的问题的继续。

最后一篇论文，《实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是在巴黎讨论“二〇〇〇年的恐惧”的国际会议上所提出的报告。其目的是为了对人类在二十世纪末所遭受的病魔，提出真正治疗的方案，并分析社会主义必须满足那些条件。增加上述四篇论文的理由，决不仅仅因为在各国文版出版以后，有了增补的可能性，而是因为这些论文最好地突出了本书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特征。由于这些论文是本着批判的态度和创新的愿望，著者深盼在社会科学方面受到尊敬的日本读者们能同意这种思想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我从未将我的著作献给过任何人，但这次要破一下这个习惯。我将这本日文版献给住在波兰华沙的爱德华·利匹尼斯基教授。^①这本日文版出版的1978年，正是教授九十岁生日。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这样一位人物——他以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培育了好几代研究人员，坚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优良的传统（他的最新著作《卡尔·马克思与现代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他坚持留在最前线，为了实现“富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进行艰巨不懈的斗争。以此表示一点最深切的敬意。

W·布鲁斯

一九七八年四月于牛津

注 释

① 爱德华·利匹尼斯基(Edward Lipinski)生于1888年，波兰经济学界最老的前辈，现代波兰经济学者中的大多数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利匹尼斯基教授在七十二年前，1906年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直到现在他一直是属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所以也是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最老前辈。

本书著者布鲁斯失去华沙大学教授职位起因的1968年三月事件之后，利匹尼斯基教授经常提出政治方面的建议，申述改革为当务之急。1976年4月底，他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一封公开信，恳切陈述必须作出政策的改变，而盖莱克是他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后辈。布鲁斯在本书的第九章中论述了教授所提出的警告的正确，仅仅在两个月以后(1976年6月底)，发生了物价暴动事件，就获得了证明。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W·布鲁斯	1
英文版序言.....	莫里斯·多布	3
日文版序言.....	W·布鲁斯	6
第一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分权的若干一般 问题.....		1
第二章 经济刺激、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的发展.....		22
第三章 经济改革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方面.....		32
第四章 商品物神性和社会主义.....		45
第五章 经济计算和政治的决策.....		71
第六章 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81
第七章 社会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与政 治的关系.....		98
第八章 矛盾和它的解决方向.....		124
第九章 波兰的物价问题和政治.....		136
第十章 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二十年后 ——接受爱扎克·多伊察奖纪念讲演.....		140
第十一章 实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 ——对二十一世纪来说社会主义意味 着什么.....		153
译后记.....		166

第 一 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分权的 若干一般问题^①

至少有十年之久，计划经济运行体制的发展问题，在波兰成了广泛而又活跃的讨论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纯理论方面或实际方面，都进行了极为全面的议论。在1956—1958年曾经达到了一定的高潮之后，争论暂时沉寂下去。但是，最近两年重新又被提出来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运行体制加以必要的变更，现在成了首要考虑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不仅是波兰，而且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来说，也是适用的，尽管有程度上的不同。

曾经成为议论对象的那些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们的重要性，这个事实表明：计划经济运行体制某些制度上的变更的必要性，是从经济生活的现实本身产生的。

全面衡量一下波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二十年的经验，显然是肯定的。波兰属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很高的国家之一。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所完成的社会、经济的变革，规模是巨大的。如果考虑到极为沉重的战争损失，那末，肯定的整个图景就更加清晰了。如果再同战前的波兰以及二次大战后大致从同一发展水平出发的其他许多国家比较

一下，那就特别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波兰的经验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以及关于在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所用的具体的制度形式没有理由去进行批判的分析。如果把潜在的可能性同实际成绩结合起来考虑，那末，应该深思熟虑的范围就更大了。当初，曾经主要地在由经济管理的各个阶段的行动方式所决定的主观因素中，去寻找某些否定现象的原因。不错，这种因素始终都有某些意义。可是，如果更深入分析一下，那末，马上就会弄清楚，除了主观的方面之外，必须考虑到重大的制度上的种种因素。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般原则，不是只有通过一经建立就永远不变的单一的制度形式才能达到，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当然是在一定的规范之内）也是可以实现的，这种看法已逐渐取得优势。如果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别，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就更清楚了。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有实现各种不同体制的解决方法的可能性这个思想，虽然提出了若干基本问题，不过通常是把这些问题归结到经济决策的集权和分权这个领域来理解的。然而，这种理解方法所以能够被接受，只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不仅把纯粹组织的方面，而且把经济的方面——首先是计划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为全面考察的对象。

这一类问题的出现，同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某些实际尝试联系起来，不仅在社会主义各国，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引起了关心的浪潮。在西方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新闻性强的文献中，它的解释不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尽管努力是集中在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的改进上面，但却有人试图把这个争论描述为好象是从计划经济本身倒退的一种兆头。

这篇文章，试图叙述一下波兰的争论中所提出的主要论点。不过，笔者的意图不是要做全面的概括，而是要以自己的观点指出问题的所在。不用说，笔者的理解方法，对于许多参加过波兰争论的人们来说，可能都是有议论余地的。由于明显的原因，希望读者也能体谅这里与其说是全面的分析，不如说是以概要的形式来论述问题的。

社会主义经济的集权和分权问题的现实范围

计划化和执行计划过程中集权的决策和分权的决策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不是从地区观点，而是从可以叫做按部门的分权化，即从国民经济、工业、部门、企业这样的观点来进行考察的。为简单起见，这里把中间阶段撇开，仅仅来论述“中央级——企业”的关系。但是请注意：“企业”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个别企业，也包括大企业的联合。

社会主义经济的集权和分权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有必要从限定其范围——把范围限定在具有普遍适用性——开始。这里，我们假定经济已经完全社会化了。就是说，生产资料全部是公（国家）有制，个人收入的唯一来源，除了年金、奖学金、身体残废者的补贴等社会保险费或类似的预算支付之外，假定都是在公有企业或机关中的劳动。只有在一点上，这个假定要加以修正，那就是包含了关于小规模私人生产——主要是农业——的若干议论。

从定义的本身来说，社会主义经济至少是需要把某些种类的决策加以集中的。经济决策的中央级即“中央计划当局”的存在，是这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特征。中央一级按照特定的目的和行动准则去行动。我们假定——这是从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解得出来的——这些目的和准则是

和公共利益一致的。因此，中央的决策所依据的经济计算，是宏观经济的方法，就是说，供选择的方案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观点来考察的，而不是从特定的领域、部门和企业的观点来考察。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另一个特征可以加以补充的，是动态的和长期的标准占优势。

作为做出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的中央一级的经济计算，主要是具有所谓“直接的计算”——即作为基础资料的来源，不以市场的标准为依据，而是原则上按实物量所做的计算——的特征。^④关于长期增长率的决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的决策，对各个生产部门的投资的大致分配，与此有紧密关系的最终产品的未来构成——也是大体上的——问题，消费基金的分配原则等等，这些决策，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既不是也不能来自市场的信号和标准为根据而做出。这对于长达十五年到二十年的长期计划，尤其适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忽视市场的或准市场的标准。如果考虑到以根据反馈而修正的必要性为前提的逐次近似接近法(Procedure of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s)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更是这样了。可是，在做出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和长期决策的过程中，市场的种种量所起的作用，同遵循一般所接受的发展路线的、可能利用的资源和符合期望的结果之间的直接对比这个第一位的要素相比，总是第二位的。^⑤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作者认为，包括南斯拉夫型在内，对于某些类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说，“中央计划当局”对于组织结构的所有其他构成要素有必要保持其较高的地位。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等级制的关系与垂直的联系，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计划经济不能仅仅依靠通过以市场为媒介而建立的水平联系。

然而，这还不等于已经解决了集权的范围问题。因为那决不等于说，计划经济因此就必须经常把一切决策加以集权化并仅仅通过垂直的联系来进行操作。

首先，必须考虑由个人（家庭）做出决策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这里所包括的是：职业和工作地点的选择，以及熟练程度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等，即关于劳动过程中所谓活动等级（degree of activity）问题的决策和关于选择消费资料的决策。这个领域的种种决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与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相对应的另一极。一般说来，后者的决策（宏观经济决策）是在中央一级进行的，而前者通常是用分权的方式做出的。除了明显的例外情形之外，没有理由不能把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的自由，以及关于选择消费结构的自由，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不可少的特征。因此，任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必须包含某种范围的分权的决策。这件事情与一个重要的归结相联系。即由作为受雇者和消费者所做出的决策的分权化，至少关于这个领域，要求运用市场形式是必然的。在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对象的一部分西方文献中，根据这样的理由——受雇者和消费者的决策是已经由关于个人收入的规律和结构，劳动力的需求，消费资料的供给等等的中央决策，事实上决定了的，——对劳动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的重要性估计过低。这种看法看来是不正确的。第一，即使依赖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单方面的，那对特定个人（家庭）的行动自由来说，也还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在总量（aggregates）必须去适应事先已经给定的结构这种状况下，市场形式也将容许个人的多样化。但是，用这样狭隘的方法去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将是错误的。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的自由，以及选择个人消

费类型的自由，通过市场机制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和最终生产的结构发生反作用，从而也——至少，在同社会偏好的最优类型可以并存的这个限度内，——对宏观经济的决策发生反作用。

然而，劳动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对生产的影响力如何强的问题，不仅取决于这些市场同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取决于宏观经济决策领域和个人决策领域的，可以说处于中间一级的决策方法。这里所包括的，是把总的发展模式 (Pattern) 具体化为短期 (即年度) 计划，是确定特定部门和企业的产出计划、投入结构的细节、供给来源和销售方向、具体的报酬制度等问题。不错，在这一级上的解决，已经由中央的宏观经济决策决定了总的轮廓。尽管如此，在已经给定的一般指令的范围内，还是留有很大余地，可以从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向中间进行选择。而按照作者的意见，这就使得把常常叫做经常的或局部的决策的中间组 (group) 加以个别处理这件事情正当化了。关于这一组的决策，事先不能说它们是应该用同主要的宏观经济决策一样的方法，即直接在中央一级来做呢，还是应该交给社会化了的企业——这个“企业”的名称下面可能要包括部门组织 (branch organizations) ——去做。在后者的情况下，会出现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新领域——“中央计划当局”同企业之间的新领域。这件事情又会导致一方面是劳动和消费资料市场，另一方面是社会化企业间的市场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大大增强。

概括上述议论，可以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集权和分权的范围问题，通过把一切经济的决策区分为三个组，进行图式上的理解 (schematically approach) 是可能的。

1. 规定经济发展总方向的、基本的宏观经济的决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投资和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投资支出在种种领域和种种部门间的分配，消费基金在不同社会集团和职业集团间的分配原则，等等。

2. 经常的（或局部的）决策：特定部门或企业的产出量和产出结构的细节，供给来源和销售方向，部门内或企业内的人员构成和报酬形式与方法，等等。

3. 个人的决策：家庭收入范围内购进消费资料的结构，职业和工作地点的选择，等等。

在上述几个决策组（groups）之间划一条界限，即使在理论上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依照我们的观点，只要抓住这三个组中的每一组所包括的决策的类型（types）之间的一般差别就足够了。以此为基础，对计划经济的集权和分权的界限，一般地加以规定，或者换句话说，一方面对集权的最小限度，另一方面对分权的最小限度加以规定，是可能的。这里所说集权的最小限度，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至少第一组的决策即基本的宏观经济决策必须由中央计划当局来进行。在另一极上，所谓分权的最小限度，由第三组的种种决策的分权化来构成。这并不意味着中央一级被剥夺了对个人的决策发挥影响的可能性。通过个人选择的参数（工资、价格等）的决策，存在着发挥这种影响的广泛可能性。但是，这毕竟是对自主的主体所做决策发挥影响的间接形式，在本质上不同于代替它来做出决策。

因此，计划经济中的“集权和分权”问题的范围原则上限定在第二组的决策即居于某些中间地位的、经常的决策方面。对于它们来说，或者集权，或者分权，都是可能的，而根据采取哪一种的解决方法，可以把计划经济区分为两种运行模

式,即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严格地说是导入(built-in)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

下面是关于这两种模式的叙述。

集 权 模 式

在这种模式中除第三组所包括的种种决策之外,其他一切经济决策(第一组和第二组)都是由中央一级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央集权模式的主要特征是:(1)单一级的决策(one-level decision-making)。集权模式的所有其他要素都是从这里派生的。(2)计划的严格等级制结构。下级的计划是与上级的计划相适应的正式的从属部分,并且在中央级和企业之间,垂直的联系占优势,而企业相互间的水平联系,则只具有纯技术的、执行计划的手段的性质。

(3)从上边向下边传达的情报采取直接命令的形式,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已经由这种命令决定了(强制性的指标计划化)。而从下边向上边传送的情报可以叫做“报告”,是为中央的决策提供材料。(4)同这种组织体系必然联系着的,是以实物形式表示的经济计算和资源分配占优势。尽管货币形式的表示是存在的,但它的作用通常是消极的。用货币形式表示的种种量,不构成选择的基础,只不过是集计(aggregation)的手段和完成中央决策的控制手段而已。

没有一个计划经济的具体的运行体制是和上述集权模式严格一致的。只不过是找到同这种抽象的叙述或多或少接近的近似而已。这种“差距”,是由于很多妨碍在严格意义上达到百分之百集权的因素。例如,中央计划当局处理情报从而做出决策的“处理能力”,特别是在计划技术方法的目前发展阶段,必须记住它是有限度的。其结果,一切所谓

中央决策，实际上并不一定都是中央决策。就是说，“中央计划当局”没有可能去核对所有“报告”，而只能盲目批准下级所提出来的建议和意见。此外，在同完成中央的指标联系起来的刺激因素——包括物质刺激和地位 (status) 问题两方面的广义的——影响下，在经济关系上发生许多非正式的组织上的连锁反应，因此实际情况要进一步偏离上面所说的图式的景象。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对于计划经济的现实组织形式的分析来说，这种集权模式是无效的，那将是错误的。在原理上建立在集权模式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运行体制，是容易发现的。例如，1949—1955年这一时期的波兰经济的运行体制的情况就是如此。后来，向分权化方向做了若干修正。但是，那还没有走到这样远，以至于把体制改变为建立在分权模式的基础上。

分 权 模 式

同集权模式正好相反，这个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做出决策的级的多层性。在我们的简单化叙述中，只是把中央级（第一组的种种决策）和企业级（第二组的种种决策）这两个级的决策当作了考察对象。在分权模式上，不同级的计划都是独立制定的：中央计划以“中央计划当局”的目的和标准为基础去制定，企业的计划以适用于企业的“博弈准则(rules of the game)”为基础去制定。因此，在这种模式上，不同级的计划之间不是通过直接命令而是通过间接手段（经济工具，参考下文）取得联系的。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企业相互间的水平联系，从而是市场关系；货币的资源分配手段占优势。

当然，分权模式决不能削弱中央计划占优势的原则。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一般说来，这个优势地位是通过适用于下级即适用于企业的、相应构成的一套一般准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把企业活动引导到从中央级的观点看来是符合要求的方向去的诱发因素体制 (system of incentives) 而达到的。例如，假定利润的最大限度化是一个准则，则中央计划的优势地位是建立在以下各点上：

1. 直接的中央决策的宏观经济性质。它决定着企业活动的一般条件，例如生产能力的增加率及其结构，总需求及其结构，等等。

2. 经济政策的种种工具的适当使用，即起企业所做决策的参数作用的市场的种种量（价格、工资、利息率、税收制度等等）的适当决策。

从一般行动准则的观点来做出自主决策的企业，是在中央的直接决策所规定的基本比例范围内，并且是在中央决策的市场的数量（这些数量对于企业关于产品结构、投入结构等的选择起一种独立的参数作用）的影响下行动的。

显然，市场机制在分权模式中起重要作用。货币关系是经济运行的能动工具，它提供现实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从而影响企业的决策。使用“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这个词，之所以比“分权模式”这种有些含糊的词更确切，其原因就在这里。

分权模式的市场机制，至少有两个重要特征：（1）市场的种种量，在对选择主体 (subject of choice) 的关系上必须始终保持它的参数性质；（2）市场的种种量，必须或者按照社会的偏好程度由中央计划当局来决定，或者至少用间接方法使之受到有效的影响。把这种模式中的市场机制叫

做“有调节的市场机制”是有益的。因为这是为了强调它的作用是计划的工具，而不是与计划无关的、甚至是与计划相对立的一个自发因素。要建立这样的机制，决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经济（这里根本没有发生过使市场机制从属于事先被认可的社会目的的问题）或者建立在集权模式前提上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不是运用市场机制，而是使用直接的指标和以实物形式表示的资源分配命令）都不曾面临的问题。

这里必须再一次提请注意，实际上分权模式的种种原则是不可能没有例外地实现的。把行政的管理体制（通过命令的计划化）完全更换为作为分权模式的中心概念的参数的管理体制（某些人所说的“自动体制”），有很多困难。即使比较接近分权模式的南斯拉夫的制度，在一部分领域里，也不是使用参数的管理形式，而是使用行政的管理形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按照强制性指标而进行的计划化仍占统治地位。不过，最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正在走向引进与分权模式相符合的种种形式。

这里把我们的假定——完全社会化了的经济——暂时修正一下，让我们谈谈关于计划化体制中包括着农业的波兰经验。在波兰，可耕地的85%是私有地。很显然，象农业这样一个占全部就业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重要领域，还不得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门槛以外。另一方面，不可能象在中央集权模式中那样，把个体农业用直接命令的办法包括到计划化体制中去。因此，国家当局以农业以外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高度发展了的多种多样的经济政策上的种种工具——例如农产品收购的组织化，提供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给农业，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有关流动资本和投资这两方面的信贷政

策，等等——为依据，采取间接的引导方法是必要的。在这里详细描述所使用的方法，不是我们的课题。可是，从计划化的观点来看，它们是相当有效的。

两种模式的比较效果问题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计划经济中的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的相对效果的问题。要做出绝对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种解决办法和第二种解决办法哪一种合适，即使考虑到纯粹的解决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是要取决于许多因素和具体状况的。下面我们试图探讨一下两种概念的有利和不利之处，以确定两者之中每一个可以并且应该占优势的种种条件。

从我们对分权模式的图式的叙述中当然要引出这样的事实，即分权模式的目的不是分权本身，而是提供在中央级公式化了的，在它的指导下要达到的社会优先目标的合适的实现手段，尽管使用的方法不同于集权模式。从这里常常提出重要的疑问：既然“中央计划当局”处于向下级发出直接命令责成它们去完成同样目的的地位上，完成“中央计划当局”的目的是它们的共同的最终课题，为什么要建立用间接手段来操作的复杂的分权组织呢？例如，如果同样的结果也可以通过向企业发出直接命令来取得，那末，为什么要选择通过价格操作使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这种兜圈子的方法呢？

上述问题中所包含的暗示，只有当满足了十分复杂的一系列条件时才能被接受。这些条件是：（1）中央级要具有关于它自己的目的的完整知识，并且要能够把那些目的完全公式化，即不仅是一般的，而且在细节上加以公式化——这是建立完全集权的组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2）通过一切

必要阶段并在一切方向上的情报传递，例如从下边送给上边的“报告”，“中央计划当局”对“报告”的处理和做出决策，用直接命令形式对下边传达决策，要用使之不失去有效性地到达执行阶段的速度进行。（3）在从下向上和从上向下的两个方向的传递和情报处理的过程中，情报不能遭到重大歪曲，比如说，不能受特定物质的和其他动机所支配的特定利害关系的影响。^④

显然，只有在特定状况下，才能使这些条件达到满足的程度或接近满足的程度。至少在目前的情报技术发展阶段上，只有在追求相对少数最优先的目标的情况下，这些条件才能或多或少严格地得到满足。这里撇开了通常引为例证的为了战争目的的例子。但是，为了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把资源集中在一定数量的最重要项目上，等等，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些条件下，中央集权模式的主要优点之一就变得最明显了——那就是高度的选择性。所谓“高度的选择性”，就是例如即使有密切关系的其他部门也要撇开，对经过严格选择的优先部门投放资金的能力。这种能力，同规定了用实物形式表示的目标并分配资源的集权模式所特有的方法有关系。使用这个方法会使如下一点成为可能，例如即使在同时存在对其他种类的钢和其他种类的制品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形下，也不是一般地去增加钢的生产，而是增加特定种类的钢的生产，并且不是把这种钢分配给一般的制造业，而是分配给特定种类的制品，等等。在某个时期，特别是在经济结构发生激烈变化、与此同时在很多地方发生不平衡和紧张（大的计划目标对极有限的资源）的、迅速工业化的初期，其所以出现走向高度集权化的趋势，可以用中央集权模式的这种

本质特征来加以说明。回顾1949—1955年六年计划期间波兰的条件，当时的高度集权化，也许它的全部因素都不能证明是正当的，但是，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

如果以上论述的宗旨至少在基本上可以接受，那末关于分权的适宜性问题也就容易回答了。越是经济上的目标复杂化了，越是优先目标的项目不断扩大，则满足有利于严格集权的计划经济组织的有效操作的条件机会就越少。如果缺少上述条件而试图使这种组织保持下去，那就难免要导致减少不仅是第二组而且是第一组的种种决策的执行效果。因为中央一级在不断增加的经常问题的沉重负担下，会丧失对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的集中能力。况且，在社会主义企业间的关系中，在市场事实上被剥夺了任何有意义的作用的这样一种体制中，最高一级所接到的信号是否恰当的问题就变得重要了。其结果，为了保证“全面的计划化”而采取高度集权化方向，这难免要威胁计划化的基础本身，并产生很大损失。

随着任务的复杂程度增加，同时随着可能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多样化，对下面一些事情的要求也在提高：

——对产品消费者的要求的适应过程的灵活性。

——同在集权模式中得到优先的“产出量偏向”相反，从总支出极小化的观点来看的代替生产要素的能力。

——不仅是通过最重要的投资方案，而且也通过开放企业的小规模的自己投资的可能性，以促进技术革新的能力，等等。

随着这一类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分权的有效性也提高了。前面说过，这种分权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经济的计划管理，而是允许集中在总的问题上，把细节的决策留给下级去

做，不过下级的行动要以根据中央级决策的规定并且使用中央一级所规定的参数为前提。

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来考察问题

到这里为止，几乎专门从纯经济观点考察了计划经济中集权和分权的相对优点问题。显然，这是过于狭隘的探讨方法。计划经济的“集权和分权”问题，特别是从对民主的发展道路有贡献的因素这种观点来看，也有社会的、政治的方面。

有些事是清楚的，没有必要深入地详细阐述。经济的分权就是，例如工人参加国有企业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发展对公有制的必要责任感的条件，等等。波兰的工人自治制度，是在同走向分权所采取的若干措施的密切联系中产生的。这种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这一级的决策范围实际有多大，企业是否有自己的基金可以自由使用。在波兰就这个领域所进行的许多调查研究，证明这件事是没有议论余地的。

按照上面所下定义的分权，即仅仅是关于特定一组决策的分权，当我们试图去揭示它对在中央一级所决定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有什么影响时，就要产生更为复杂的问题。作者的意见是，直接的互相依存关系在这里几乎不能想象。中央所做出的决策的民主性质问题，与其说取决于纯经济的组织，不如说取决于政治组织。不过，认为第二组决策的分权对中央的种种决策没有任何影响，也是错误的。下级的自主性活动，即使是在中央所决定的一般准则范围以内的，也会产生对中央计划当局来说的、某种独立的评价尺度，也可能促使中央计划当局者使他自己的决策去适应从下

边所表明的偏好，至少是在对基本的全国偏好没有影响的领域里。

因此，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即使撇开纯经济效率的标准不说，许多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也已经表明：在计划经济中，一定程度的分权是值得向往的。一种进步形式的社会组织所应做的贡献是去克服异化，使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社会发展的形成工作中来变得容易，并且也将容易发现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从这个观点来说，无疑分权是有重要的有利之处的。

分权和广泛利用市场机制的条件

为了既不损害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又能利用分权的优点，某些重大要求必须得到满足。这些要求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1. 第二组的种种决策的分权化，同不能保持一般市场均衡的那种过度紧张的经济，是不相容的。利用作为计划经济（分权模式）操作手段的、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在呈现出明显的卖者市场（seller's market）现象的情况下，是不完全可能的。因此这就需要凭借实物的资源分配，用行政手段去防止企业的垄断行为。近年来在波兰，分权之所以迟迟不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达到或多或少保持均衡的成长条件上有困难。

2. 第二组种种决策的分权化，要求在为下级规定和纠正行动参数（如价格、工资、利率等）时，有一套非常精确的方法。这些参数必须是用符合全国的偏好标准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因此，这就需要有适当的技术，去把实物表示的比例“翻译”为货币表示的比例，例如把合乎需要的

产出结构转换为价格关系的语言。

这里我们碰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按照新的管理技术的发展来看的。关于集权和分权的未来趋势。人们广泛接受的见解是，由于现代情报技术和程序编制的发展，严格意义的集权管理上的种种困难已经被排除掉，从而我们将会提高关于中央集权模式所讨论到的各种前提的实现概率。不过，同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划经济中的分权所不可缺少的上述种种要求的实现，也将变得很容易。在这里，我们所考虑的是以下两方面：对于在最高一级把经过很好平衡过的一般比例加以计划化所需要的技术基础，以及可能是更重要的，即建立一套合适的、十分灵活的参数体系的可能性，以引导分权的活动使之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相一致成为可能。

因此，作者不同意那种认为技术进步会自动地预先把发展方向确定下来的意见。集权组织和分权组织之间的有效选择范围，必须考虑到这两个方向上的技术条件的改善，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决定。

对二分法的两个模式方法的若干保留

上述从集权和分权两种模式论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进行的理论分析，在目前波兰的经济文献中流传得相当广。不过，作者要提请人们注意那种同两种模式的分类联系着的，僵化的二分法的方法的危险。对于僵化的二分法的方法的批判，最初主要是以纯实用主义的论据为根据的。然而最近理论方面也出现了支持这种批判的论证。理论上的论证，^⑥是同众所周知的、对新古典派关于生产函数的性质和形状的假说的批判性分析有关的。如果以非线性生产函数为前提，

那末各经济单位即利润最大限度化企业都可以把使这种符合社会的合理标准的合理选择成为可能的价格体系同任何有实效的计划联系起来。同一体系的价格，随后也可以用来作为对生产要素和生产物的供求平衡意义上的调整决策的工具。然而，在非线性生产函数的前提不能成立而必须以线性生产函数为前提的情况下，使用广义的价格作为下级单位决策的唯一参数，就变得不充分了，或者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这种场合，利润最大限度化就不能成为充分的选择标准了。因为，从社会的合理性的观点来看，某些不合理的解决，将会带来相当于从合理的解决所能得到的那么多利润。价格的情报职能和调整职能，在特定产品的总产出量中所占的特定供给者的——或者在对特定产品的总需求量中所占的特定购买者的——份额越高，价格的这两种职能就越是有限的。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必要，即或者用若干量的非价格的情报（non-price information）来补充价格，或者甚至是用它来代替价格。在某些情况下，只要让这种情报在市场关系的过程中发生——例如只要由产品消费者提出一定的需要——就足够了。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如下议论也是可以成立的，即关于产出结构和（或者）投入结构，投资的资本集约度，一定时期内的总生产额，等等，应该由上级用直接命令的形式提供必要的情况。

来自实际方面反对二分法（第二组的种种决策是集权或者是分权，二者必居其一）的议论，所强调的是不同经济部门存在着不同条件，以及从以集权模式为基础的运行体制成功地过渡到一种以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为基础的运行体制所需要的，前面说过的一切条件，都要同时获得是困难的。

没有疑问，上述理论的和实际的保留，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加以考虑。这些保留证实了这里所反复阐述的主张，即纯粹的模式解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些保留还表明，从中央集权的体制结构（framework）向分权的体制结构的过渡，是需要一些渐近的过渡的。

然而另一方面，一切经济的运行体制，都有在其本质的各点上不能损害的、独立的内在逻辑，这也是很清楚的。从不同的模式中把不同要素加以折衷主义的混合，往往会比从一般效率虽较低但一贯适用的体制所能期待的结果更坏。因此，作者的意见是：经济的运行体制，原则上在一定时期内应该以极为明确规定了的种种模式前提（model-assumptions）为基础，同时，要有足够的灵活性，允许若干必要的和一时的背离，以防从有害的公式主义来对待运行体制。就现在波兰的条件来说，作者确信：在第二组的种种决策的分权化和扩大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方面，进行根本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这种发展方向，在1964年6月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四次大会的决议中，在某种程度上阐述过。在决议专门讲经济问题的各章中，强调了改进中央级的计划化技术的重要性，同时也把经济运行领域中所需要的一系列措施加以范式化。可以举出下列各点^⑥：

- 加强所谓综合指标（盈利性，生产费用）所起的作用；
- 在研究开发适当的经济工具过程中，削减直接的实物指标数；
- 加强经济刺激的作用；
- 改善价格体系，为提高价格的灵活性创造条件；

——把所谓工业联合体，从行政性质占统治地位改组为有做出决策的广泛可能性的经济单位（同时要削减各工业部的业务上的职能）；

——提高在企业内部解决问题中工人自治的作用。

类似的倾向，尽管有程度大小的不同，在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必须注意，问题是极为复杂的，以及因此在假设和现实之间可能有的不一致，尽管如此，上述倾向无疑可以看做是重要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体制结构的变更的客观性。必须再一次强调，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问题，是有关在中央计划经济范围以内的变更。

我们的议论，基于明显的理由，限于社会主义经济。可是，经济管理中的集权和分权问题的范围，是远为广泛的。对于总的发展趋势来说，本文有不少地方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意见。

在现代经济中，不能听任个别利益同可能性去相互作用的问题，其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反对计划化、制定规划、“巨大政府”等等的人们的努力，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或者延误若干过程，但是他们却不能使总的趋势倒转过来。因此，我们作为对象的问题，具有不仅限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很大广度。

总之，社会主义创造出最有利于这种进步倾向——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解决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自觉地掌握发展过程——的种种条件。然而，这种进步倾向决不能超越必要的界限，应该为同分权联系在一起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源泉留有足够的余地。由此就产生了对这里做了某些议论的那些解决进行探索的必要性。我希望这里所讨论的种种概念或类似的概念，对于达到计划经济中的集权与分权之间必要的

平衡有所贡献。

(本文最初发表于《汉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年报》，1965年版)

注 释

① 这篇论文以《波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关于若干一般问题的备忘录》为题，用德文发表在《汉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年报》上（但是，该年报刊出的是“根据英文版的德译”，如同以下作者原注所说，可以推断原著是用英文写的——日译者）。这是作者于1964年向日内瓦国际政治协会第六次大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分权问题》一文的详细摘要。

② 把“直接计算”和“间接计算”〔后者指根据实际市场或“影子市场（shadow market）”的市场量所进行的计算〕这一对用语带进波兰的争论中来的，是阿·瓦卡尔（A. Wąkar）和J·G·捷林斯基（J.G. Zieliński）两个人。特别请参照捷林斯基的《同盎格鲁撒克逊文献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争论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华沙，1961年）一文。这一对用语，目前在波兰广泛使用。不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作者，并不同意瓦卡尔和捷林斯基从直接计算和间接计算之间的区别所引出来的理论上的推论。

③ 关于在波兰的长期计划化中所用方法的最好叙述，请参考M.卡莱茨基在1963年向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不发达地区利用科学技术的联合国会议提出的论文《制订长期计划的方法概要》。

④ 请参考奥斯卡·兰格的《管理中的集权和分权的若干问题》，载《实证社会学论集》，1962年。

⑤ 请参考爱德华·利西尼斯基的论文《价格的情报职能》，见《经济学者》，1962年第2期。

⑥ 参考《新路》月刊，1964年第7期，第181—184页。

第二章

经济刺激、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的发展

1.对于这一章来说，给技术进步下一个严密的定义，并不具有根本重要性。我们的主题在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促进还是妨碍技术革新的种种经济条件进行探讨。因此，我们所关心的对象不仅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引进，也包含着生产者对技术变化的适应性。这件事情，既不意味着对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的适应性是不变的，也不意味着以资本集约度的提高这种形式在技术变化的进行过程中，按一定比率用资本来代替劳动。

这篇文章主要是以波兰的经验为基础的，从规模和发展水平来说，波兰不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先锋（Pioneer）国家，所以不应忘记，这里所说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问题，大部分是使别国已有的技术来适应波兰的种种条件的问题。

2.社会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的刺激问题，首先应该从对整个经济的技术变化的适应性有利的刺激这个观点来进行考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于技术进步来说，提供了远比资本主义经济更为有利的基本前提条件，这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各点来说明：

a. 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的一般目的（满足社会需要），

意味着重视使用最有效果的生产方法和重视产出量。不存在类似垄断资本的习性即对以改善消费资料的使用价值（即耐久性）为目的的技术变化进行抵制。

b. 由于从整个经济的规模上进行经济计算，这就使消除（至少在理论上）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冲突成为可能。因为有可能去控制总的有效需求，所以左右经济增长的，就只是可能利用的资源的规模和效率了。

c. 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以极宽广的时间为尺度而进行的，所以有可能考虑从长期来看才会提供收益的那种新的生产过程。

d. 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促进新的生产方法的广泛采用。技术情报或者是在企业之间直接地，或者是通过机关和组织间接地，有可能自由地利用。生产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废除，是技术革新得以广泛采用的重要因素。

e. 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计划化，是可能的。由于这一点，把努力集中在有选择的部门，成为可能。但有一种危险，即其他部门的重要性得不到充分的评价，同时要削弱科学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自发性。但通过保持取得平衡的方法，资金和人材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上、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适当分配，相信可以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进步的计划化的优点，而把有害的结果缩小到最少限度。

f.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的结果容易产生这样的倾向：个别企业仅仅考虑它所直接受到的商业上的好处来计算教育的效果（这也适用于e）。而社会主义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目的包含着任何人都可以受教育的可能性，这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很清楚的。

从以上各点可以知道：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的观点来

看，竞争并不一定总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在计划经济中，如果撇开外部的因素不说，使技术革新成为生存条件的竞争（如果有商业上的效果，那末虚拟的技术进步也是可以的），可以为实现经济活动目的的这种积极的刺激所取代。竞争的压力，虽然在同外国的经济关系方面感受得到；但是，在技术、组织的成果方面，对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国家来说，这种竞争可能是有益的。

“社会垄断”这个用语如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它不会带来私人垄断所产生的对技术革新的有害结果。常常有人说，社会垄断妨碍引进新的消费资料。这不能先验地当作正确的东西来接受。为什么？因为那种商品引进的失败，并非由于缺少刺激，而很可能是由于有意识的选择（例如资本积累的优先）的结果。因为这种新的消费资料的生产，虽然对于投资支出或者国际收支难免要发生坏的影响，但在迅速发展中的经济中，两者都有紧张的倾向。

由于新技术和新产品带有较大的不确实性，计划化手法具有保守的倾向，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般地从宏观经济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有全面利用技术进步的倾向。在可以直接感觉到经济的总的利害关系的地方，就完全没有对技术进步起反作用的刺激(disincentive)。对于由中央提供资金的基本投资来说，这件事就特别适用。经验表明，当着手新的规划或全面现代化时，有一种选择最先进技术倾向。可能影响这种倾向的不是在于刺激的微弱，而是在于获得情报的可能性。可能利用的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和可能利用的资源的量，等等。危险不如说在于相反的方向，即在于技术主义者对技术进步所迷惑（如果采用试验不充分的技术，这就可能导致损失），或者可能利用的经济的

代替方案没有经过充分研究也是可能的。经济上的最优解决，不一定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只有采用计算代替的投资计划方案的经济效果的先进方法，才能使选择经济上的最优技术这件事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然而，这些方法并不一定总是被正确使用的，当人们试图对代替的计划方案进行真正公平的评价时，尤其如此。

3. 然而为了技术进步的经济刺激问题，在经济的下级部门中是非常迫切的（我们之所以没有使用“执行一级”这个提法，是因为问题的性质不仅影响计划的执行，而且也影响计划本身的编制方法）。在这一级上（即“执行一级”——中译者），经济刺激所指向的目的是促进现有生产过程（以及新产品的引进）的改善，促进企业本身的（小规模）投资实现方式的改善。很明显，在企业内技术进步被促进到什么程度，这对技术进步的整个问题是有很大重要性的。因为生产物（output）——它同时也构成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撇开机器设备的进口不说），直接影响通过中央的计划投资引进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所以，中央当局对下级施以强大压力，使之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进步去改进生产方法，特别是产品质量，这是不奇怪的。这种压力也会通过专门安排技术进步的计划中的特别部分（事实上这是更重要的）以及处理生产目标与经济目标的计划部分（这里预定要按照生产的标准技术系数来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和新产品）而施加给下级。

这种压力有效吗？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中央计划所加给下级的压力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能使总的社会利益同种种个别经济单位的利益以及个人（工人、家庭）的利益调和到什么程度来决定的。

如果假定不存在自主的（个别的）利益，而总的社会利

益又是同任何经济单位或个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那末整个问题就可以归结为提供恰当的情报的问题了。这种利益的总的调和感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存在的——撇开职业上的野心等等不说——并且也成了对技术进步的直接刺激。但是，由于明显的理由，仅仅依靠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相一致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建立特定企业或个人的努力同由社会所达到的成果之间的直接联系。任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管它的分权化的程度如何，之所以都必须评价这些投入的相对价值，都必须建立适当的一套精神和物质的刺激，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从这里就要产生一系列的结果，如同经济本身一样，我们按照从集权程度较高的体系到较低的体系这种顺序来进行探讨。

4. 在集权模式（在这里，计划在各个级上都有强制力，消费物资和劳动力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上，中央当局通过以下各点来保证技术进步的全面利用：

——直接的技术系数；

——技术进步的指令计划（所谓技术的、组织的革新计划）；

——按品种分的产品构成计划所包含的指令（为了保证新产品或改进的产品的生产）。

假如下面两点是由中央当局作主支配的，那末这种方法可能是很有效的。

a. 为了编制计划的、独立的情报来源。

b. 保证完成计划的手段（特别是量的控制和质的控制的有效手段）。

只有在优先程度高的少数项目中，才能够满足这种条件。在大多数场合，中央当局只能依靠从下面送上来的情报；

但这种情报难免不由于企业适用成功的指标而有所歪曲。

以完成计划任务为基础的评价，在下级导致可以理解的并且常常是当然的压力，使得它们去追求从容不迫的、从而是容易执行的指令。甚至关于产出指标（这里边包含着若干因素的重复计算），要克服这种倾向也是困难的，何况关于计划所拟定的技术进步，那就更困难了。在这种部门中，反常的目标计划之所以有比较高的概率，就是这个缘故。一方面有把企业的实际可能性估计过低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有把过于严格的计划强加给企业的倾向（在中央当局的修订走得过远时）。

这一点又同另一个问题相联系。以执行结果和计划指标的对比为基础——特别是面向企业的——的成功标准，与其说长期的，不如说短期的才是更现实的。在高度集权的经济制度下，操作用的计划之所以比长期发展计划更加重要，就是这个原因。这一点往往导致评价技术进步的效果所需要的时间视野同意外短的企业的时间尺度之间的冲突。这件事不仅可以从企业经营者的动机形成中，而且从工人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原因如下：

a. 他们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受整个企业的成功（这取决于中央当局所采用的成功指标的标准）的影响。

b. 他们对维持计算基本工资所采用的现行定额、工资率等等，有所关心。

以计划指标为基础的评价体系的保守成分越是加强，则中央当局对下级所提供的情报的依赖程度也越大。因此，中央指令对忽视下列情况的概率就会变高，即由个别的改善（它们本身虽然比较小，但集中起来可能成为开发利用的重要因素）中所产生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由于物质上获利的动机所鼓舞或者由于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看成是一致）当首创精神来自下面时，高度集权的制度，有时难免不能提供实现该项技术革新所必需的手段。如果企业不能自由处理必要的基金（以及获得与此有关的物的投入要素的可能保证），那末要实行从下面提出来的技术革新，就难免要经过烦琐累赘的协商谈判之后才能被中央当局所接受。只有当中央当局确信该项建议的价值时，它才能被列入计划，而企业才有把它付之实行的可能。

最后，以执行结果与计划指标的比较为基础的成功指标体系，当操作上的计划处于支配地位时，由于担心任何改善都会被仅仅是被提高目标的下一个计划所“耗费掉”，所以难免要妨碍企业把它的努力和一部分资源用到技术改进上面去。

企业强烈要求用中央资金来投资（即不会成为企业的负担的投资）的原因就在这里。

与此相抗衡的方法之一是，在经济的金字塔结构的某个中间级上，设立独立的技术进步基金，以便为那些酝酿时期长的方案以及从计算了危险率之后执行结果仍然不成功的方案所产生的损失提供资金。这种技术进步基金无疑是有益的，但它的作用也还是有限的。因为：

——它是同企业的经济成果无关地独立设立的，并且只有在得到有关当局批准之后才能利用；

——它虽然可以用来负担由于引进技术革新所产生的费用或损失，但却不能利用它来支付由完成现行计划的困难所产生的费用或损失。不过，如同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在经济部门的下级中，阻碍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正是后一种现象。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在企业、部门等等中，中央计划应保证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进步的种种因素是完全无效的。经验表明并非如此。但是，在这一点上，计划的有效性，受到由构成集权计划经济模式基础的种种前提所带来的种种因素的限制，这却是事实。在优先的部门取得很大进步，而在其他部门则非常落后，这种技术进步的不平衡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很大特征，就是这个原因。随着逐渐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这些困难的解决也更加紧迫。最近举行的大量讨论虽还没有最后结论，但是它所暗示给我们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到分权和利用有调节的市场机制中去寻求。

5. 本章是以如下一点为前提的：即在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出来议论的基本点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即使用“分权化”、“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等概念也不会发生很大误解。特别需要加以明确的是，分权化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央计划，而是试图通过使用另外的——按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见——更有效的制度上的结构，即在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所规定的范围以内的分权，来达到中央计划的目的。对于市场机制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市场机制必须理解为，不是同计划相对立，而是完成计划的工具。

分权化和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利用，通过以下各点将会增加对企业、部门等等技术革新刺激的有效性：

——通过提高财务指标（盈利性）的重要性。这将使企业比现在更加重视降低成本和增加销售。它还会通过减少以实物表示的指令的重要性，而促进生产要素的代替，增大产出结构适应需要变化的伸缩性。

——通过不是把奖金制度（包括雇用人员通过“企业基

金”参加利润的分配)同计划指标结合起来,而是同增长率的实际改善或用绝对量表示的目标的完成结合起来。

——通过把企业的扩充和投资所能利用的基金的规模同财务指标联系起来。这种安排在“发展基金”和“准备基金”中已经有了萌芽的存在;但是必须把它进一步加以发展,使之不仅作为对个人收入增加的刺激,而且作为对关心他们的组织的成长的那些人的刺激来发生作用。

——通过把中央提供的投资基金包括在企业的盈利的计算中,即通过更多地利用信用、利息率等等,从而促进企业本身改进资源的利用而提高效率。

然而,通过经济的分权和比较广泛地利用市场机制来改善技术革新的刺激的有效性,也会带来一系列不利结果。这里有两组问题:

a.关于生产、劳动生产率、成本等指令性的指标体系的限制(有时甚至是废除),可能意味着削弱上级部门为了改进生产方法和产品质量而施加的压力。同时也可能在用企业方面为了技术革新的十分长期的刺激来代替这种压力上归于失败。还有一种可能,即企业的时间视野依然不够广阔,不足以超越雇佣人员和管理部门的短期利益。

b.把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管理移交给下面一级的经济部门,这会导致努力的分散和对整个社会偏好估计不足。

以上两组问题都极为重要。基本投资、特别是专用于新的项目规划或全面现代化的投资,即使假定由中央当局来分配(这是必然的事情),情形也是一样。

下面所建议的制度上的变更提供了对抗这种倾向的方法。

a.采用最低年限的有约束力的定额。这将有助于稳定经

常的运行条件，消除或大大减少长期目的的努力得不到承认的担心。

b. 把企业的某些责任移交给工业企业联合，并把这些工业企业联合，从行政单位改组为经济组织，如社会主义的公司和托拉斯。这样可以扩大时间视野，更全面地研究企业的需要，导致采用关于所使用的技术的长期政策，并且自主性的扩大，会比不超出个别企业范围的情形更能改善资源的集中。

很明显，只有在对企业和工业企业联合的活动的的外部条件也加以适当改变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一类制度上的变革。这意味着为了通过使用适当的价格政策、税收和信贷政策等去影响在经济的下级做出的决策，要积极地广泛地利用间接的工具。为了防止类似垄断的行为，使必要程度的价格的灵活性同企业和工业企业联合的价格参数作用协调一致，是极为重要的。除制度上的变革之外，还需要通过使仍然占优势的“卖者市场”终止下来从而对生产者加强市场的影响。

本章标题所说的问题，这里只做了概要的叙述。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并不是要为技术进步去创造刺激。所需要的是，在继续全面利用由社会化的经济和中央计划为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刺激的同时，还要开辟到现在为止没有被恰当利用的、经济下级的首创精神的源泉。人们不能期待会有理想的解决，但是，这里之所以提了几点建议，这表示：一方面是预想到更直接的经济效果，同时也是预期社会利益同个人利益的一致，是成熟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的这种意识，会成为意识发展中的长期因素。

（最初发表于《共存》1966年第5期，帕加门出版社）

第三章

经济改革和它的社会的、 政治的方面

六十年代中期，几乎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对其经济制度实行重要的改革。

虽然各国进行改革的时间，特别是改革的形式和规模各不相同，但是如果我们除去需要单独加以考虑的南斯拉夫之外，这些改革在时间的选择和总的趋势方面还是很相似的。总的趋势是以分权模式取代集权模式，即建立一个利用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如果企业和部门运行的范围是由中央所做出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决策，特别是由那些影响投资的决策所决定，那末“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就是为了取代行政命令体制，而成为联系下级的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的环节。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以下各项创造更有利的条件：**a.**使供应结构适应需求结构，消灭不必要的“为生产而生产”；**b.**增加刺激，以便节约生产支出，特别是原料的投入。这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c.**鼓励革新生产方法和引进新产品。

应该强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革的相似性，因为这是最近的一个进展。1956—1957年，当波兰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一套类似的改革时，各种意见极不相同，在大部分社会主

义国家中盛行的是批判的态度。人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普遍意识到，不能一劳永逸地规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各项原则；相反，必须允许它们有所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受到辩证法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支配。这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适应最广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来说，特别重要。而且，如果在理论上并不否认这个要求（英译demands，日译“这个公理”——中译者），那末应该做出有力的、全面的努力，把它付诸实行，这也是可以预期的。

人们常常用社会主义各国处于从外延的发展阶段向内涵的发展阶段过渡的过程中这个纯粹一般的公式，来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本身和引进改革的速度缓慢。这种解释当然包含着很多真理。但是，人们很难自动接受，这个公式一般地适用于解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改革。因为，那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应用于具有不同经济结构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任何计划管理制度“在当时都是正确的”。今天，人们已经明白，至少集权体制的某些构成要素（例如，把总产量的指标作为一个企业基本成功标志的作法）是造成浪费的原因，它在任何发展阶段都不能证明是合理的。

在解释过去十年中的改革速度问题时，存在着远远超出社会主义经济正在从外延的发展阶段向内涵的发展阶段过渡这一公式的一系列的情况。

斯大林死后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对经济管理方面的各种缺点，出现了愈来愈多的批评。但并不是所有这些批评都伴有对集权模式本身的批评，而且对前一时期建立在各种假定上的经济政策也没有进行任何根本的批判。教条主义的，以及可以用政治社会学术语最好说明的因素（害怕危及现有政治机构的地位）等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然而，在这些因素

之外，还出现了某些经济方面的情况，使得某些抱着美好愿望的人支持计划和管理制度不需要进行根本改革的观点。首先，斯大林时代最后几年的政策和整个制度的性质是如此强烈地阻碍了经济潜力的合理利用，特别是消费品生产（并且首先是农业生产）的经济潜力的合理利用，以致全部的需要就在于纠正这个制度中最明显的错误，以便取得可观的改进。其次，若干投资项目经过建设中的一再拖延终于投产。这些项目虽耗资巨大，但所涉及的投资费用基本上都是过去投入的。因此，阻碍发展的制度上的因素的力量并不立即那么明显。

从1956—1960年这几年中（特别是从1956—1959年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表现出一个高速的成长率，总指标的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几乎不低于1956年以前的几年。同时，消费的增长实际上也比以前大得多。正是这些发展使得人们有可能否认经济制度需要根本的改革，并推迟了这些改革。甚至还出现了某些恢复旧指标和旧的计划管理方法的事例。

在1956—1960年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中，已有若干迹象表明，“早期错误的利用”已经不能持续多久了。在实行1961—1965年这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一点已经变得更为明显。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但也不应忽视失败。这些缺点不仅减慢了几乎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除外）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最主要的是导致了意外低的投资效率（一系列重要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而投资和就业的增加却实际上大于计划的规定）。

几个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增长率的最剧烈下降，这不是偶然的。与前五年7%的平均年增长率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在1961—1965年的这一数字是2%。同一时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增长率则从8%降至3%。^①高度发达的经济具有比较复杂的结构，这意味着加重了以下所有通常与集权模式相联系的失败：企业里很少进行技术革新；在生产结构适应需求结构方面不够灵活；对节约活劳动和原材料支出的重要性不够重视；改进质量不利等等。如果人们记得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没有以外延发展来代替内涵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储备，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外贸，那么人们就不会奇怪它们的失败为什么会如此之大，要求改革的压力为什么会如此之强。

人们一直把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作为旧经济体制效率下降的标志。然而显然，归根结底，应该在消费者领域中寻找成败的真正标准。在这一领域内，不论是最近的实际收入，还是在集体消费部门进行的投资，计划目标没有完成的程度都是很大的。

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方面的缺点绝对地归咎于它的经济运行体制，这将是错误的。正如讨论这个问题时所经常强调的那些理由，即使最认真的经济改革，也不能期望它自身能够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并扫除所有的障碍。这方面的任何幻想都是危险的。

但是，我认为，即使有这些保留，计划管理制度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所以，对前一时期的评价所产生的关于改革的建议当然是正确的。迅速而又不断地进行这些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有效发展虽然不是充足的条件，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有些人欢迎这些改革的建议是把它作为废弃计划的预兆；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对此感到满意，而某些马克思主义团体却为之惋惜。这些反映的基础都是由于一

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计划和市场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经济体制。人们把计划与一个由命令来实施直接决策的制度等同起来；而市场却被认为是一个自发的自动调节的机制，因此从定义上就排除了社会对经济过程的控制。

我认为这些意见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化是自觉地分配资源，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计划经济的体制必须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且中央集权经济的命令制度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采取的唯一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有调节的市场机制则是（至少也许看来是）比命令的、实物分配的机制更适于计划经济。而且，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其结构更加复杂，如果计划不得不包括许多优先项目，如果只有改进生产质量和生产的多样化，进行技术革新并增加外贸等才能达到数量上的指标，如果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既是目的本身，又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供应计划具有适当的灵活性，那么利用市场来保证计划的实现不仅是合乎需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这听起来多么荒谬）。坚持集权型的、详尽的、直接计划化的老方法，不仅将导致效率的降低，而且还可能意味着失去对经济过程中许多环节的控制：信息系统的容量和中央处理资料的能力是不能胜任的，使得提供信息的速度减慢，内容失真（由于整个既得利益制度，从这里产生的失真不能互相抵消，只能愈来愈增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计划经济中使用某种自动调节的手段是如此重要。只由中央当局大体上进行控制的市场机制则提供了这种手段。苏联杰出的数理经济学家诺沃西洛夫（Viktor Valentinovich Novozhilov）在谈到经济决策的“直接”和“间接”（市场）的集中时，所强调的正是这个有控制的分权决策的问题。^②他说：

“直接和集中地解决经济问题取决于中央计划当局做出具体决策。间接的集中……则是规定计算投资的参数。地方当局借助这些参数……可以找到最符合总的经济计划的变式。……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中，间接的集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使直到最详细的一切地方决策都毫无例外地服从中央计划。”

显然，为了达到改革所要产生的效果——借助有调节的市场机制来加强计划制度，以便改进计划的连贯性和有效性——必须具备若干复杂的条件。特别重要的是，在向新制度过渡的各个阶段中都应同时规定经济控制的适当手段。

由于对这个问题已有许多专门的探讨，所以有可能把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一整套措施包括到改革中去，其中包括改革制定中央计划的方法，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价格结构，以及决定价格的方法，并改革决定企业行动准则的指标和刺激因素。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讨论、试验和研究的对象。尽管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但它们都被认识到是现实的问题。

然而，计划和体制改革的实质和结果都不是纯经济性质的，技术经济的改革和管理上的改革尤其如此。它们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因此必须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范围内加以考虑。不幸的是，问题的这个方面还很含糊不清。所以，为了举例说明的目的，考虑问题的某些一般的侧面，可能是十分有用的。

让我们以经济刺激问题为例。人们一度认为，强调集权制中经济刺激的重要性的任何倾向都是与社会主义集体社会这一未来理想格格不入的。在这个社会主义集体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不应是经济动机，指导行动的应是理想主义、团

结感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当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对此倾向所抱的怀疑似乎已减少（虽然在西方各左翼团体中对这个问题仍有争议）。但是经济改革并不只是引进经济刺激，而且还要改变它们的性质。要提高刺激的效力，就必须保证这些刺激提供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正确结合。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或接近做到这一点，那么同公共生活的社会主义理想方面的政治教育结合在一起的促进联合的各种因素，将比在目前情况下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现在的刺激制度在许多方面表现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而不是两者之间的一致。

还有与这个总的问题相联系的其他问题，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文献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某些领域则完全是空白。最醒目的遗漏是人们根本没有讨论过经济计划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对收入的社会结构及收入的差别会发生什么影响。

人们有时认为，提高经济刺激的效力将不可避免地在各类工人的工资之间造成更大的差距，特别是它将提高管理人员的收入。但是，至少从理论上说，经济分权的发展与个人收入的日益悬殊之间没有而且应该没有直接和简单的关系。从我们已经讲过的可以知道，改革的主要因素是刺激体制的改革，即改革把刺激与取得的结果相联系的方法，在资金分配等方面更注重个人和集体的贡献。这并不会自动地扩大收入的差距，特别是如果我们假定社会因素在决定收入结构时起到较大的作用（特别是以工人自治的形式）诚然，计划和管理改革本身会引起收入结构的某些变化，但是，它们是不同种类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变化来源于各种不同职业在经济上的相对重要性的重新评价。确实存在（而且应该考虑）

各类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严重问题，这是由于较多地使用了综合财务指标，但这是不同种类的问题。

所以，如果设想经济改革本身决定收入结构的变化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问题仍有待于总的经济政策来解决。需要保持收入差别与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之间的冲突，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不能一下子就解决。然而，政治经济纲领中应比以前更公开地承认确实存在这一冲突。这将有助于将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并缩小它们的影响，尽管收入差距在发展的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在制定计划和对情况进行经济分析中，应更为注意这个问题。除了一般地评论收入的分配比资本主义统治下更平均外，我们的信息既少，也不明确，使我们难以对目前收入的社会分配情况或它的趋势说得更多。

现在，人们比建立社会主义的初期更强烈地感到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恶果，因为革命后的那段时间是社会变动很大的时期，是群众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最大的时期。以后的稳定则趋向于使社会等级制度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别和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永久化了。由于使那些父母收入低的儿童处于严重不利地位（机会不平等），就有使社会阶层固定化的危险。

这给我们带来常与经济改革有关的另一些问题：即由集体消费基金提供的社会服务（包括直接向公众提供服务的项目投资）的问题，它们的长期发展、增长率和个人消费的关系等问题。显然，除若干其他的作用外，集体消费基金提供的服务，在拉平收入差距特别是缩小这些差距对年轻人在机会上造成的影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们认为，经济改革应该规定，在采用收益性原则时，也应相应地更广泛应用社会服务的有偿供应原则。在若干国

家，特别是在住房方面，可以找到近年来实际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迹象，它们可以证明以上的观点。

虽然必须在时间和地点的范围内考虑个人的决策，但我认为，如果断定对迄今免费提供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提出偿付要求，其根源是由于刺激制度，这就是错误的。经济改革是为了提高经济支出的效果，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一定会阻碍社会主义长远目标的实现。在这些目标中，平等——至少从机会均等这一意义上说——占主要位置之一。从长远观点看，平等在经济的和社会的意义上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使得人类能力的全部潜力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当然，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之间有矛盾，冲突的剧烈程度要看总消费基金的多少和个人收入的平均水平而大不相同。解决这一冲突，取决于各种情况下的许多细节；但在制定计划时不能因为实用主义因素是难免的而迷失了基本标准。在我们所讨论的事例上，那种标准还不太明确，还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必须扩大推动经济单位的经济工具的作用，这不是一个在集体消费一级就能自动应用的原则。而集体消费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对一些问题的一般概述，不能用来引出对经济政策具有直接意义的结论。不论是在收入的发展方面，还是在集体消费与个人消费之间基金的正确分配方面，都没有提出数量上的建议。我只希望指出总的一点，即计划和经济体制的改进不能只限于结构上的改革，还必须保证中央计划当局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

在我们的计划文件中，有大量的信息资料是关于产量将

要发生的变化，商品的平均消费量和必要投资的规模等。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则毫无叙述，对于变革的方向则毫无解释，对于用来保证所预期的变革方向的方法也毫不重视。所以，扩大计划规模在技术上和概念上会遇到很大困难。然而，对这种扩大的需要似乎变得更迫切了，部分原因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制度改革有这个要求。首先，由于分权模式更重视长期计划，因此这些计划必然更重视社会经济问题；其次，由于企业经营中的自主性和市场机制意义的扩大，因而增加了中央计划当局在正确决定一般发展方向时的责任。

然而，改革的社会问题不限于新经济政策的内容，而且也有着在分权经济中利用经济结构的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和与实行改革本身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紧密联系的。

第一个问题包括一些与工人参加社会化经济的管理有关的复杂问题。在企业一级，工人参加的形式是工人委员会，这一思想和这一思想的实现是走向分权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其名称、权力、尤其是实际的意义有所不同，但经济改革与工人委员会的创设总是同时进行的。很难相信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偶然的，因为对于中央计划与某种程度的企业自主性相结合的制度来说，工人参加管理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企业自主性的目的是解放那些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人的首创精神，只有使这些人对整个企业的成功产生责任感，才可能发掘这些首创精神；而反过来，除非受雇者对他们的企业的活动具有真正的影响，否则企业的成功是无望的。在扩大企业经营的时间视野方面，工人真正参加管理是特别重要的。现行经济

制度的最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中央计划的宽广的时间视野与企业的特别狭窄的时间视野之间的尖锐矛盾。企业为了达到（中央计划制定的）指标，经常使用不太经济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使它们能够在计划期限内得到结果。没有必要强调，这样做阻碍现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延误它们去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等等。解决这个矛盾不仅需要把重点从短期计划转移到中期和长期计划，而且需要投资者有指望从负担投资风险中获得利益。一个企业必须能够为其长远利益工作，保证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发展集体的决策、集体的刺激和集体的责任。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以指望通过这里概述的各种改革来解决它。由于劳动力的流动，难以使受雇者关心企业的长远目标。然而，首先让我们指出，人员的变动是逐渐发生的（具有持续性）；其次，工人委员会的发展和规定长期的经济刺激，可以减少劳动力的流动。正因为如此，在巩固工人委员会的同时进行始终如一的彻底改革可能有助于改善局面，尽管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关系的整个发展问题。

我们之所以距离受雇者充分参加管理还很遥远，是有很多理由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人们唯恐打乱现有政治结构的任何组成部分。结果，工人委员会淹没在现有的体制范围内，受到党和工会的控制，而党和工会本身又受到等级制度的更高一级的直接控制。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保持了过分集权的经济体制。它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不能为工人委员会提供一个职权的适当领域。而且，管理部门一方还存在着低估工人委员会重要性的趋势，管理人员不愿与别人“分享权利”。有时人们认为，工人参加管理只不过是在形式

上向意识形态所作的让步，真正实行起来只会降低效率。击败这些短见的看法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为了使工人委员会能够完成新的经济模式为它规定的任务，必须迅速接受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管理。只是响应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的号召并不能自动产生这种态度，至为重要的是一种政治气氛，即使人产生参加一般管理事务的必要和重要的感觉，并提供这种态度产生效果的积极经验那样一种政治气氛。

很不容易判断在已经进行改革的各国中这些先决条件存在和发展的程度。在波兰，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确切地说，奋起直追还需要做许多事情。1956年，一个自发的、强大的群众运动使得许多工业中心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共同参加管理的思想是与整个政治经济改革计划连在一起的。现在，很难说人们对于体制改革还有这样大的关心，还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也很难说人们对于工人自治的思想还有什么热情。

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总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企业或地方当局的自主性的扩大，以及我们已经讨论的这种改革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它们为工人自治在经济较低的各级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在充分地正确评价这种改革的合理性时，必须记住，改革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所需要的增长率和进展规模。在计划经济中，某个工厂或某一地区的情况必然取决于整个经济的情况，即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决策。如果把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管理民主化只限于企业或地区，那就是错误的；而且从长远观点看，这种限制只会加剧特定集团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

为了使分权制在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都是有成效的，对于那些关系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利用的总的决策，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制定长期经济计划及其社会结果的决策，社会必须能够施加真正的影响。

无论上述论点是否为人们所接受，我所概述的经济改革计划的成功显然不仅取决于技术经济的解决，而且取决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社会政治方面的重视程度。

(本文最初载于《计划经济》，1966年第11期，华沙)

注 释

① 在波兰，增长率的下降是微不足道的(6%比前五年的6.6%)。然而，它也是在超额完成投资 and 就业指标的情况下才达到计划中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在苏联，与前五年的9%相比，1961—196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才略高于6%。波兰，苏联，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情况是，由于农业相对雇佣了大量人员，它们还可以通过外延的方法获得某些增长。然而，甚至这些国家也正在经历上述困难，虽然从纯经济角度来看，这些情况没有其他国家那么严重，发生得也晚一些。

② 《经济学和数学方法》，第1卷，第5期，莫斯科，1965年。

第四章

商品物神性和社会主义

商品物神性理论一直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要素。也许可以说，这一理论执行了两种互相联系着而又不同高度上的职能，就是说，一方面在商品经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中，执行本质上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在社会经济现象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探讨中，执行方法论上的职能。

如果把过去常常被提出并且在今天可能特别值得考虑的问题概括一下，那就是：商品物神性理论，特别是在同社会主义制度的联系上，如果是有意义的话，那末有多大程度的意义呢？本文是从一般的、试论的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

(一)

这里要假定商品物神性理论的种种基本命题是已知的，对于这些命题的叙述要尽可能简短扼要。当然，这样的概括本身——至少在涉及到对马克思的理解的这个限度内——在某种程度上就表明了作者自己的见解。在这个领域里，黑格尔主义的沉重传统所留下来的、对纯粹哲学语言的使用，也要尽量避免。

1. 商品物神性理论，我首先把它理解为：是对在商品经

济中人们被置于的那种客观状况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最重要之点如下：

a.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被物化了。

b. 劳动的社会性被掩盖起来。在外部，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表现为私人劳动，这一点又表现在私人利益的最大限度化上，结果导致社会的原子化。

c. 经济的和社会的过程，是由孤立的生产者们的活动自发决定的结果。他们必须使自己去适应那些自己无力控制的种种因素，技术发展的一般水平、价格、工资、就业的动向等等。

一般地说，商品物神性理论是叙述异化占统治地位的那样一种状况。这如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是来源于如下事实：“……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① 商品物神性理论是马克思创立货币物神性理论和资本物神性理论所依据的基础。

然而，在批判商品生产以及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历史主义的原则。因此，它是现实主义的批判，不否认在某种状况下商品关系具有进步性。

2. 商品物神性理论是对“虚假意识”的批判，即对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中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职能，是对作为制度的市场进行辩护的职能。在那里，是假定市场可以保证资源的最优分配，交换中的当事人的平等，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和消费者主权，对种种生产要素的公正的报酬（比例于它的生产率），等等。

整个《资本论》，从马克思阐述商品物神性理论的第一章到第三卷最后一章，都是对这种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里也是历史的批判，指出市场的资源分配机制只有相对的意义——从而又强调它的过渡性——阐明了把商品关系看作是经济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自然”关系，是错误的。

3. 商品物神性理论是分析社会现象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的特殊事例。在这个意义上，它作为对一般形态的物神性的批判，具有更广泛的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去发现把社会关系的真正内容神秘化了的、掩盖起来的种种形态背后的、它的真正内容，这是社会科学的主要课题。

(二)

上面说过，《资本论》中的商品物神性理论，构成了分析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神化了的各种形态的一般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它的影响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下劳动的解放，不仅意味着从资本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也意味着完全废除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如果追溯这种思考态度的起源，那就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开头部分，在第一卷第一章考察商品物神性的一节里，在他把“商品的神秘性质”同“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②加以对照的地方找到。

又指出了，从“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③这个地方，曾经有人引出这样的结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意味着过去所理解的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终结。因

为揭露隐藏在物神化形态背后的社会关系的真正内容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了。就是说，社会科学——按照这种想法——将为一种经济工程学（economic engineering）即生产力合理组织的科学所取代。

但是，现实无论关于商品关系的出现，或者关于形态的物神性，都已弄清楚了，并不是那样“简单明了的”。

已经弄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商品关系，比曾经预期的更有持续性，并且——这可能是更重要的——至少同革命刚刚胜利后的时期相比，商品关系的范围和意义都增大了。即使把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苏联的发展撇开不说，而把1929—1930年、并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相应的时期分别当作起点来看，总的趋势也是极为明显的。——就是说，经历了这样一种发展道路：从相当彻底的实物分配开始，经过采用消费品的商品形态和市场的劳动力分配形态，到国营企业间更广泛地利用商品关系，实现中央计划时更大胆地利用市场形态（市场的各种工具）。在大部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里，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方向，以及过去被看作是属于由社会供给的领域的一部分需求改为有偿化，由个人来负担的倾向，都在加强——从所有这一切来看，关于变化的方向大体上是没有怀疑余地的。

当然，尽管可以看到某些根本见解的变化，但还不是说这种趋势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不过，即使那种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现象的纯粹定义式态度的观念（例如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那就不存在商品”或者“由于存在着商品，这种体制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会顽强地表现出来，那也纯粹是次要的现象，对于科学的见解没有任何影响，更不用说对于现实的事态发展了。企图代替对现实的矛盾着的

种种侧面的认识，而寻求依靠封闭的定义体系 (a closed circle of definitions) 的口头上的解决，这种态度的幼稚性是太明显不过了。

在另外的理论高度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商品关系，它的范围，它的长期发展趋势等等，早已成了讨论的对象。在这里进行了这样一种尝试，即承认社会主义下的商品关系的“正统性”，去寻找现实的解决以及对种种基本问题的回答。并且，在这里虽然有时也可以看到贴“修正主义”的标签，但是（1）炮弹越来越落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对修正主义的指责，不是指向认为一般地存在着商品关系的那些人，而是指向提倡“过于广泛地”利用商品关系的人），以及（2）最近的经验，特别是1968年波兰的经验表明（指作者布鲁斯被免去华沙大学职务的原因，即1968年3月事件后的反对修正主义运动——日译者），即使是激烈的“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风暴，也不能排除对经济改革（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导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扩大商品关系的作用范围的经济改革）进行讨论的必要性。当发生政治危机的时候，有时也使用“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怪物来攻击某个特定的人，但是，迄今为止在我所讲的那种倾向中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倒退。这听起来也许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连续的反对修正主义运动的失败，已经由它本身提供了证明：在欧洲社会主义各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上，商品关系的基础是具有客观性的。

事态的这种发展，证实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关系问题要做具体的、历史的理解的重要性。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由于一系列理由，商品关系的范围扩大和重要性的增加，可以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如同围绕这个主

题的讨论所常常说到的，可以预期有积极结果的若干重要领域如下：

——提高经济管理的效率，提高生产对需要的适应方面的灵活性；

——提高中央计划的效率，更有效地在宏观经济的水平上来控制经济过程。不管表面看来怎样，间接的控制工具和所谓市场机制的扩大利用，在某种状况下，对于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关系的整个复合体（complex）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直接指令的普遍使用，有可能产生只不过把自发性极大的增长隐藏起来的危险的虚构，以致损害中央计划的基础。

——促进个别领域（个人和集团）的目标同一般目标的结合过程，这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广泛利用而展现的，常常同经济刺激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讨论的复杂问题的结果。如果通过这种手段而实际加强了个人（以及集团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结合，那末，那不仅可以改善短期的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具有教育的效果，比用口头教训方法所能得到的，更能对社会主义意识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刺激。

——下面一点同上面所讲的一点有紧密联系。那就是一方面是商品关系和自主的分权决策的范围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所必不可少的要素的工人自治的现实前提之间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所尝试过的一切经济改革中，市场机制的更广泛的利用这个要求（postulation）之所以总是伴随着工人自治的思想，显然不是偶然的。

——所有这一切又可使人们期待：经济改革特别在技术进步和组织改善的领域里，将促进创造性的首创精神的发展。

没有必要再深入到近年来所常常议论的问题的这个侧面。重要的是，问题的第二个侧面——即马克思当作商品物神性所阐述的商品关系的那个侧面，在我们的制度里是否完全废除了？在为了实行经济改革而扩大作为计划化工具的商品关系的领域，仍然留下很多要去做的事情（我这样想）的状况下，这个问题可能被认为还为时尚早。但是，片面的探讨方法——特别是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既能产生深刻的后果，并且这件事情在战术领域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必须避免的。

在任何时间的任何现象上都是有矛盾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关系也摆脱不了这一点。即使在我们的社会里，人的关系的商品形式，也是孕育着很多危险的。

最一般地说，商品关系的发展，意味着增加了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孤立化，并且意味着在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方面，个别利益的自主性加强了。这无论从社会主义制度的短期目标或长远目标来看，都有可能产生下述一系列并非人们所愿意的结果：

——由于在收入同支出相比中占不相称的份额而牺牲社会利益去实现个人利益。这是由于使收入同经济成果相联系的结果而发生的，要扩大商品关系的领域就需要加强这种效果（参考下文）。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当它转移到企业这个集团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上的时候，可能要进一步激化。在这里，由于它的规模，企业要比个人具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由于在现实的世界里不存在“完全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必须认真对待不仅是为了强迫接受不合理的价格，而且也是为了垄断劳动市场、操纵生产能力的利用

程度（即开工率）等等而利用垄断地位的可能性。

——提高市场的重要性，把个人收入同企业的经济成果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必须对市场投机倾向的增强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给予若干考虑。一方面，应该从按照投入劳动进行分配的原则这个观点来确认个人工资同企业的经济成果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许有必要去补偿和企业的成绩无关的失败，以及去抵消不安定感的影响。

——授予国民经济的个别经济单位以真正的自主性，从该企业的观点来看，由于不考虑外部的投入、产出，有失去经济计算的整体性的危险。它还有可能导致时间视野的狭隘化。

——所有这些（以及同样的）因素，有可能对社会意识产生有害的影响，带来一种把人的关系商业化了的感觉，并且削弱团结互助原则的作用，等等。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即使完全承认在社会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扩大商品关系的领域和职能的必要性，也决不允许去掩盖可能带来（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带来）与此有关的令人失望的这一方面的后果。这对于有关客观状况的两方面，即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的个人地位以及这种状况在意识中的主观反映都是适用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商品物神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依然是有效的，并且对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也是有效的。因为：（1）到目前为止，商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存在的，并且（2）按照投入劳动进行分配的原则，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在某一点上与商品交换极为类似（社会和个人关系中的等价交换——“do ut des”“我能给你，是因为你能给我”）。对于商品关系所起的作用超过最小限度那种状况来说，这一点就更

恰当了。

(三)

因此，商品物神化理论并不导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关系与社会主义不相容这种结论，不如说，倒是提出了一个利用商品形式和市场形式时的界限问题。如果玩弄一点词句，也许可以说商品物神性理论包含着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商品货币机制作用的物神性 (fetishism) 的必要警告。

这种物神性的本质何在呢？如果最简要地从而最一般地回答这个问题，那末可以说：它在于把社会主义经济简单地当作商品经济，不过（而这是根本重要的）是当作其特点只是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别单位，使用从整体分离出来的社会化了的生产手段这一点上的商品经济。我不想给人一种把词句神秘化了的印象，但是我认为，例如作为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看到商品关系”这种表述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个表述，在某种情况下，是会带来重要的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结果的。

给社会主义经济下定义为商品经济，那就把可以允许商品关系在它的范围内起作用的界限的整个问题放弃了，并且从在经济运行体系的有意识的社会选择中我们所面对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的范围内，把这个问题给排除掉了。从而，在这里就不产生特别是从长期观点来看的工具论意义上的选择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商品生产，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从而，在各个生产单位的目标同国民经济水平上的任何优先的经济目标不相关地并独立地存在这个意义上，每个生产者的目的函数是如此明确地被决定的。如果采纳作

为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定义，实际上就要变成不仅目标的等级制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aims) (用兰格的话来说) 的消失，而且被赋予使用价值生产——对它来说，交换价值生产只不过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能代替它——的优先地位也会不见了。^④ 而且，全体的结果是个别结果的总和，正像总投入是个别投入的总和。很难想像一直被当作商品经济来对待的经济，即使它有可能考虑外部经济和不经济(diseconomies)，那末它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包含了部分对整体、分系统对系统的关系，从而又暗示了某些优先的目的函数的存在，以及以这种函数为依据的直接的最优化计划的可能性。

然而很明显，在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中，经济单位的行动准则，是全面地由价值规律的作用决定的，并且一般的均衡是追求均衡的个别单位努力的结果。其结果，价格结构也必然要由这种均衡的努力来决定，与此同时，那样一套均衡价格在什么样程度上反映着整个经济的机会费用(opportunity costs) 的问题，也就不会产生。因为，社会的机会费用这个范畴(作为区别于市场价格的一个范畴)，在严格规定的商品经济模式中是没有它的位置的。

当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公有制对于那样的商品经济的职能所具有的影响。商品生产者们的社会主义的并且是集体的生产者这个事实，特别反映在目的函数上，这个目的函数，现在不可能是资本收益的最大限度化了，但却是由收入——按照投入劳动来分配而且是由个别组织(例如企业)的经济成果所决定的收入——的最大限度化所规定的。假定经营单位是一个工人的集体，那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行动准则，可以说是由自然决定的了。因为，为了某

些优先的利益，从上面来决定那些准则将是不可能的（例如参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的兰格的模式）。^⑤ 这个自然的行动准则（为了纯粹经济上的目的），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将是受雇者每人平均的纯收入（即扣除税款后的纯收入——但企业受雇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已被规定了）的最大限度化。这个准则没有必要去加以规定——只要不受从总的利益的观点来看的某些外部行动的妨碍，准则就会自行建立起来。这种外部行动和商品经济这个不受限制的定义无论如何都是矛盾的行动。在这点上，值得记住的是：受雇者每人平均的收入最大限度化准则，会对已知生产能力下的企业的均衡点的成立发生极为明确的影响（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均衡点与其说会在利润最大限度化企业中成立，不如说将在比较低的产出和雇用水平上成立），并且也会影响生产技术的选择（将会有使用资本集约度高的技术，即有使用资本对劳动比率高的技术的趋势）。当然，通过国家手里所掌握的适当工具（特别是通过广义的价格政策和税收制度）去影响企业的均衡点是可能的，但是，第一，由于目的函数是不能由上面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工具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第二，使用这些工具这件事情本身是同先前采纳的定义相矛盾的。

在现实当中——即使在现实当中有完满地符合我们的理论概念的任何事物（1965年的改革，企图产生的南斯拉夫模式可能是最接近它的）——特别在现代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一种积极的经济政策。当这种政策的种种因素十分密切地相互协调的时候，人们也许会不如把它叫做“计划化”。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始终一贯地被理解为商品经济，那末看来这就把计划化的作用归结为仅仅是以下三个职能：

1. 总的发展趋势的预测。

2. 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但是，由于经济和技术条件走向集中的倾向，这个职能的有效性也许是有限度的）。

3. 在市场不能有所反应、或者其作用的方式明显违反社会长远利益的特定情况下，对市场过程进行调整（对落后地区的开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等）。

因此，如果采纳上述那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解释，那末在那样一种制度中，对于计划化来说，在某种情况下，除了作为对市场机制的基本资源分配职能的调整者的作用以外，很难看出还有任何作用。

（四）

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决定着经济运行时所利用的机制有没有某种有意识的选择。由于拒绝了上述定义，我们同时也就抛弃了经济关系的商品形式的绝对性质。不过，我的意见是，这种绝对化正是经济学中的商品物神性的本质。这和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切利用商品关系的场合所看到物神性的见解是相对立的。在有意识地为经济运行去建立一种机制的社会，将选择直接的和市场的资源分配形式的各种不同组合，并且使商品关系从属于自主决定的目标和合理标准。这样一来，社会就可以在一定的阶段上，在商品关系有助于达到社会目标的领域里，不失去利用商品关系的机会，而又能克服商品物神性，特别是克服从社会的原子化（atomization of society）派生出来的那些侧面。当然，即使是那样，计划经济中的市场机制的利用，也可能带来令人不快的侧面效果。但是第一，运用适当的制度上的措施，将会使不利之点少于有利之点；第二，为了对抗那些侧面效果，可以采

取直接措施。

在对问题的这种理解方法中，其基本的理论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归根结底是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即以消费为最终目标，以劳动为投入尺度的一种社会。这意味着：特别是就长期规划来说，在社会的规模上规定宏观经济的目标和手段，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虽然，在包含着多数目标的情形下，按照制定规划的困难来看，也决不是容易的）。这就使得有必要把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中被看做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很多因素加以“内部化（internalize）”。举个简单例子，虽然劳动资源利用上的失败（失业），对于企业费用不发生任何影响，但那是社会的费用，因此必须包括到经济计算中去。

这又使得如下一点成为必要，即根据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计算出来的社会费用（也就是，不是当作经常的市场过程和自主的生产者行动的这种函数来计算的社会费用）去运行。社会的机会费用必须从全面的经济最优化计划（对最优解应尽可能最接近于近似值的计划）推演出来，即必须从在已知时间视野中、以已知目的函数和对整个体系的制约条件为基础的计划推演出来。这样得出来的目的函数（英文版作“机会费用”——中译者）应表现在一套“正常价格”（几年以前所使用的术语是“最初价格”——现在一般叫做“计划价格”）上，然后它应该作为一套市场价格的基础。这种方式 and 上一节里所说的体系之间的区别是，例如可以通过从波兰的特殊的最优化计划中，为了实际目的而推导出来的少数的量之一来做例解。而我所关心的，一方面是关于追加投资的收益的收回期间，另一方面是关于市场利息率的收回期间。这里的问题不止是利息率的没有控制的变动问题，或者

说甚至不是这样的问题——这种变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频率会越来越。然而，即使例如由中央财政机构把利息率紧紧地控制住的时候，依资本市场的供求而定的、从而归根结底依宏观经济决策而定的均衡点照旧存在。与此相反，投资效果的一般经济标准这个意义上的收回期间，则是从考虑了目的函数和制约条件的宏观经济的前提推演出来的。这种收回期间，随后当作做出决策的一个要素——那些决策的范围显然是被限定了的——由各个投资者来加以利用〔收回期间是为了特定的投资方案去选择技术方案 (variant) 的一个手段 (device)，而不是以用于产业之间投资效果的比较为目的的。就是说，它不是以用来决定未来的生产能力的产业内部结构为目的的〕。

收回期间的计算原理以及在计算投资的经济效果上利用它的方式，为中央计划对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意味着什么问题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同时它们又表明了代替直接的调节形式而利用间接的调节形式的优点。就是说，决策是在下级采取的，在这里，中央所难于考虑到的、一切当地的因素都给了它们应有的考虑。然而，所有的计算都是利用把微观经济水平同宏观经济水平结合起来的参数进行的。

市场机制的范围和职能，是和经济上的决策的分权化程度密切相关的。因此，这就清楚地意味着：任何想要作为中央计划的工具来利用市场机制的尝试，都包含着分权化的界限问题。这里没有必要去详细讨论在波兰如此频繁地议论过的问题，只要回忆一下主要结论就足够了。

1. 分权化的界限，是由如下需要所决定的，即需要直接在中央做出一组基本的宏观经济的决策，特别是和长期发展有关的决策。它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

的分配，主要投资领域的决定，消费收入在不同的居民集团之间的分配等等问题。从经济观点来看，特别重要的是要保证中央对投资支出的基本流量的控制。这不是能够通过某种把投资机械地分为中央集权的投资和分权的投资（例如通过把两者的比例定为 7 : 3）来解决的事情。中央当局必须能够对生产能力增长的规模和结构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确定投资分配的一定比例时，如同在其他类似问题上一样，将会需要考虑情报系统的传达能力，中央情报管理当局的情报处理能力，情报歪曲的概率，以及由于集权化程度的不同而提供情报的成本也不同，等等。

2. 分权化的界限，也决定于前面讨论过的，中央为各个经济单位所决定的行动准则。我们已经知道，依靠企业的“自然”的目的函数，是不可能的，而是有必要用从整个体系的考虑所引出来的标准来为分支系统规定目的函数。中央当局在制定行动准则的同时，还必须规定决定企业的经济成果（按照规定的准则来测定）与企业雇佣者的收入之间的关系准则（至少在主要原则上）。中央当局还必须有能力去保证工资基金同市场均衡和收入的社会结构这两者都是可以协调共存的。

3. 最后，分权化的界限，是由保证对处于金字塔结构底层的经济单位的目的函数或支出函数的经济参数的控制这种需要决定的。这些参数是由制品的价格和劳务价格以及广义的生产要素价格（和税收制度）构成的。为了使价格成为分支系统的适当的指导者，就必须保持价格的参数性质，同时，价格又必须反映整个社会的偏好。从这里就产生了如下结果，即当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时，可能需要诉诸通过命令来进行干预，但是，不用说，如果这种经济的运行机制的逻辑是

应该坚持的话，那末，这样的干预就应该是例外的。

以上三点，对于我在另一个地方所阐述的^⑥分权模式（“利用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概念，并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在我的意见里，我想它们已经表明，分权模式的种种前提满足了商品关系应该从属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同在第三节里所讲的、把商品关系绝对化的倾向相反）的这种要求。

（五）

分权化的界限问题，本质上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中的经济关系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总消费的分配的、商品关系的范围问题。

消费基金的基本部分的分配，是通过各个居民的收入形成和支出来进行的。但是，消费基金的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消费的。即使不深入到复杂的分类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在国外和在波兰，都越来越丰富）中去，也很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商品关系的作用，也取决于消费如何分割为由个人收入提供资金的消费部分和由社会基金提供资金的消费部分。

十月革命以后消费类型的发展过程，从这种观点来看，是同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关系所经历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相类似的。最初（即使把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特殊需要撇开不说），很大一部分消费是由公共基金提供资金的。但是后来，集团消费所起的作用开始降低，整个消费领域或者转向个人负担（运费和一系列公共设施），或者提高了在种种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经费中的个人负担比例。特别显著增加的是住宅费的个人负担（住宅建筑合作社的发展，房租的提高），但

也有虽然增加得不那样明显，可是提高了个人负担的重要性的一些其他领域，如医疗。

为消费提供资金的方式的变化，如果说仅仅是向一个方向，那大概过于简单化了。至少这对波兰和苏联的过去十年间是不适用的。在这两国里，不仅集团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没有减少，而且还略有增加，不过，集团消费比例的这种变化不大的状态（levelling-out）或者略有增加，与其说是由于特定服务的社会负担的增加而达到的，不如说是由于过去被拒绝给予社会福利的居民集团（主要是农民）现在被准许给予这种福利而达到的。因此，在始终享受到集团消费的某些好处的集团，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集团消费停滞不前或者甚至缩小了的感觉。不管怎样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关于集团消费的政策，

（1961年10月，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党纲提出要在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并在下一个十年里达到世界最高生产水平，这是一个不现实的计划。在人民生活方面也一样，提出到1965年要完全废除个人所得税，1971年以后，要把住房、用电、教育、卫生保健、交通通信等等费用逐步变成免费，1976年以后，实行免费供应伙食等等，到1980年，要使人民的实际收入中的一半左右是由社会消费基金提供的，这样就达到了共产主义的人口处，云云。但是，东欧各国没有追随这种计划。——日译者），并没有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中明确反映出来。至于苏联本身，1970年在计划与执行结果之间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商品关系占优势的日益增加的领域，在一部分部门中，商品关系的比重正在提高。这可以用一系列原因来加以说明，其中某些原因是暂

时性的（例如，随着居民购买力的增加，保证市场均衡就很困难）。但是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应该归于这样的论据：即发展商品形式在满足消费者需要上是有利的〔需求水平对经济容量（capacity）的适应，扩大消费选择的自由，更加容易弄清居民的实际偏好，通过劳务利用的改善而提高生产能力的利用效果，等等〕。在把若干领域从集团消费转变为由个人收入来负担的消费时，作为基本论据的是，那将推动经济刺激体制的一种设想（同按照劳动投入进行分配的分配原则结合起来的，由个人收入来负担的消费——与此相反，对集团消费来说，则缺乏这种结合关系）。

如果否定这个论据有某些说服力，那将是错误的。决定集团消费对个人消费的比率（从而决定在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来利用市场形式和非市场形式）这件事情，无论就集计量和特定部门来看，都是很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同时，使这些论据普遍适用，以及为了支持不间断地扩大商品形式的利用（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而片面地引用这些论据，无疑也是一种商品物神性。

满足需要的非市场形式，是社会连带性原理（原文“principle of solidarity”，solidarity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社会连带主义”所说的“社会连带性”——中译者）的表现，即在只靠个人力量难于对付的状况下社会成员互相扶助的表现。在这种意义上，高度发展了的形式的社会保险，是社会结合的重要要素。但是，如果把问题只限定在这上面，那末随着社会日趋富裕和安全感的增加，人们可以期待，集体消费基金差不多会减少到等于零。不过，满足需要的非商品形式的意义，并不限于一种社会的善行。无论是作为宏观经济水平上的经济的长期增长因素，也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

政治纲领一部分的集体生活的原理，都被赋予了它们所应具有的巨大作用。

某些需求必须由社会基金来提供资金，这是为了要在这样一些领域里保证随时提供必要的资金。在这些领域中，随着投资产生着重要的长期的社会利益，但为此而支出的费用却超出了个别经济单位的资源限度，而且收益也越出了它们的时间偏好的范围。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经济规模和外部经济过于庞大，在个人欲望方面完全不可能满足需求（例如预防传染病，公共设施和运输设施的基本要素的建立）。但是，即使在公共负担和私人负担两方面都有可能提供资金的部门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等），经济的规模，外部经济和分散危险也是极为重要的，并且纯消费的侧面（例如它本身是一种善行的教育）同投资的侧面（作为增加生产能力的教育）是那样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从有必要保证这些长期的经济增长因素的有效动员和利用来说，也需要公共基金在提供这些服务中起最大的作用。

非市场形式的社会意义，可以分为两组问题。第一，在创造从社会来看是合理的消费结构中，公共资源所起的作用问题。第二，在补救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收入不平等上面，公共资源的作用问题。两组问题有紧密的联系。

对可供用于消费的资源的一部分，由公共基金来提供资金的这个决定，会限制各个家庭选择消费品和服务的自由。但是，当社会偏好与个人偏好分歧过大，把这种服务的提供交给个人去选择会危及到满足整个社会的重要需求时，可以证明利用非市场形式来满足需求是正确的，恰恰就是这种限制（通过免费供应而完全排除选择，或者通过价格补贴而部分地排除选择）。从以上所说的可以得出如下结果，即这种

冲突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又是为利用不通过市场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分配形式做辩解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目的不仅是要保证消费结构的当前和短期的变化，而且要完成长期的目标——符合社会主义社会要求 (aspiration) 的消费类型的发展——而这种消费类型是不易通过利用市场机制加以促进的。

满足需求的非市场形式的再分配效果，是作为和收入水平无关的受益的可能性 (access to benefits)，或者——这是往往会发生的——作为受益的可能性同收入水平的反比例关系 (对低收入阶层，由公共负担来提供商品和服务) 的结果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基金的相应部分的刺激职能，实际上就被削弱了。但是，作为一种补偿，没有受益可能性的某些社会集团，可能得到利用某些消费部门的可能性。如此达到的更加平均主义的分配，实际上也可以叫做“庇古效果” (低收入阶层消费增加的边际效用大于高收入阶层消费减少的边际效用)，并且也不能忘记它所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有利之处。集体消费的平均主义的供给之所以特别重要，在于保证教育上的机会均等，它有助于抵消父母的收入差距所强加给下一代的不利之处。

也许没有必要去详细论述这种集体消费的优点。不过，必须加以强调的是，集体消费的平均主义效果，与其说是来自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不如说是从负担服务 (为服务提供资金——中译者) 的方式和分配利益的方式产生的。实际上，无论是偶然地或者非偶然地根据情况可能发生商品和服务的集体供给会带来扩大收入差距的结果——也就是，相对高的个人收入同对社会福利的相对高的参加结合在一起。我所说的，并不是那种同在社会的、政治的等级制度中占有重要

地位结合着的公开的特权（虽然是很难用数量来表示的），而是从过去积累起来的有利因素产生的，更容易接近某种社会福利的可能性。这种现象特别明显的是有关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那些在比别人更好的物质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达到比平均水平更高的教育水平，这就意味着这些子女得到专用于教育的、公共基金的一个不相称的——在某些情况下极不相称的份额。在有关教育制度这个限度内，这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作为问题的是，可能成为特殊资本——教育资本——的继承，并且这又会导致一方面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另一方面是可能通向忽视人的才能的丧失。这就是要采取一种自觉的政策——不仅是把消费分为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而且是决定负担（付费的分配）和不付费的分配的一种自觉的政策——的重要原因。无论这个问题的哪一个侧面，都是不能通过依靠市场所能解决的。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私营企业问题，不是本文所要涉及的对象，但是值得顺便指出的是：一项更明确并且更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对于私营企业所具有的影响之大，会远远超过它的直接经济结果。商品关系很少受到控制的领域里的过高收入，会具有心理上的影响，这也可能是和商品物神性有关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源泉。

撇开这一点，我想要说的是：当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用市场机制的时候，应该铭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对消费品和服务的商业供应规定界限。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那就会成为商品物神性的牺牲品。

（六）

从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关系的性质和范围的概要中可

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现代社会，必须由中央来做一系列基本的宏观经济的选择。除了做出某些直接的重要决策之外，中央当局还必须规定下级组织的权限，必须能够规定分权的界限，为金字塔结构的下级自主单位（分支系统）规定“博奕准则”，以及消费品和服务的商业供应的界限。

为了这些目的而进行选择，理所当然地是一种政治行为——决策的实质和所用的标准两者都是政治的。决策的实质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基本的宏观经济的选择，取决于互相矛盾的不同的社会利害关系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集团的互相矛盾的利害关系之间的某种妥协。一般说来，使一切利害关系都同样得到满足的那种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不存在的。宏观经济的决策本质上是政治的，是因为标准不是从外部给定的，而是从体系本身推导出来并且建立在某种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整个国民经济方面的最优化，不过是对特定目标或目标体系的解式而已，因此必须以从内部推导出来的价值标准为依据。

宏观经济的决策是“政治的”这个规定，往往受到人们的怀疑对待，人们害怕“政治的”这个形容词的效果，降低了由中央当局代替同“客观的”市场标准联系起来做出的决策而做出的选择的重要性。十分明显，“政治的”这个词在这里没有任何轻蔑的含义，它不过是反映着如下事实而已，即宏观经济的选择——恰恰因为它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不以当前的市场指标为转移——必须用不同于个别经济单位做出决策的方式来进行。总之，要理解某些专制的统治者为什么强烈地否认他们所做出的决策是政治性的，并不困难。因此那只不过是把所做的决策说成是客观必然性的直接结果，从而

说成是先验地最好的、并且是实际上唯一可能的决策，这对于专制的统治者来说是最方便的。

从基本的宏观经济决策是“政治的”这个主张可以得出结论：在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也就是在建设“生产者的自由联合的社会”上，主要问题是如何保证对这些决策的、真正社会性的参预和控制。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这是国家的问题，即为了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问题。

我并不认为，由于这一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经济关系的类型这个命题就无效了。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管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能分离的，不能把它们互相分开进行考察。对于正确理解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过程——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的这个过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在波兰的文献中，强有力地阐述社会化是一个过程这种思想的，是爱德华·利匹尼斯基(Edward Lipiniski)。“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实。当劳动者不把自己的生产任务看做私事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完结了。只有当存在着劳动者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真正共同管理时，才存在生产资料的真正社会化”。^⑦这种思想同商品物神性理论以及同克服异化之间的联系，是很清楚的。

利匹尼斯基很重视决策的分权化，他把这个分权看作是“克服个人与社会的生产任务之间的矛盾”的有效方法。他写道：“管理的分权化，即把对有关集体活动的最广泛的技术的和人的问题做出决策的任务，转移给甚至是最小的集团，这有可能开辟克服异化的新的现实主义的道路”。^⑧

从信息传递(flows)的更大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方面证明是正当的、决策的分权——特别是如果它伴随着工人自

治的发展一起进行——在产生生产资料的真正共同管理的感情上具有根本重要性，这是难于否认的。人们把希望集中寄托在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上面——这不仅是对变更模式的纯粹经济结果的希望，也是对变更模式的社会、政治结果的希望——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但是，这些变更它们本身不能提供回答，除非人们准备把社会主义经济作为集体的商品经济——宏观经济的决策最终是作为自主的个别决策的结果来进行的，集体的商品经济——来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结果被接受了，明确规定了分权的界限和市场机制的职能，与此同时，又明确理解了某些宏观经济的决策必须由中央当局自主地做出，那末，问题的解决就不该是仅仅求之于分权化了。解决首先必须求之于保证在中央做出决策中社会的真正参预，也就是为了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的真正民主化。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必须是列宁在如下一段话中所指意义上的国家消亡的过程，“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⑥

除非社会化过程有所进展，否则社会结合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即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共同管理这种感情，将会减弱。也可能有人企图用象民族主义或者甚至是种族主义这一类的结合因素，去代替社会主义的结合因素，不过其结果——特别是从长远来看——都是灾难性的。奥古斯特·倍倍尔曾经把反犹太主义说成是“白痴的社会主义”，它常常会导致发展高压统治机构和压制自由的言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引起如不造成重大的社会损害就非常难于纠正的社会倒退（这里的叙述同以下情况有关，即1968年3月事件后的反修运动，带有强烈的“驱逐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色彩。布鲁斯

也成了这次运动的牺牲者——日译者)。

本文中所阐述的标准，不是用于也不能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各国政治制度的运行方式的评价，尽管随着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到更高的物质水平和知识水平，那些标准将会增加重要性。但是，如果这个商品物神性理论作为关于社会关系的一切形式所具有的物神性的一般理论被接受，那末很明显，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科学应该作为第一个任务的，就是把它们的形式同真正的内容加以对比，对现在的政治制度做细致的彻底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来也没有过满足于对社会现象的表面的描述，而总是去探索隐藏在外在形式下的内在关系。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关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即政治制度，没有实质的理由不能采取这种理解方法。

爱德华·利匹尼斯基写道：“可以认为，神秘化是历史上经常反复发生的现象，当保护既得地位需要现实的神秘化时，它总是要出现的，”^①社会主义也不能例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物神性理论仍然有它所应起的重要作用 and 刺激作用。这特别适用于它作为对形式的物神性的批判，具有的重要意义。

(本文最初发表于《今日政治》1969年第11、12期)

注 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3卷第38—39页。——中译者

② 《资本论》中文本第1卷第88、9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者

③ 同上，第96页。——中译者

④ 爱德华·利匹尼斯基：《经济理论和当前的经济问题》，华沙，1951年。特别是参考《经济学者》1948年第4期所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使用价值》一文。

- ⑤ 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
- ⑥ W·布鲁斯：《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1972年，伦敦和波士顿。
- ⑦ 爱德华·利匹尼斯基：《经济理论和当前的经济问题》，华沙，1961年，第190页。
- ⑧ 同上，第205页。
- ⑨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1页。
- ⑩ 爱德华·利匹尼斯基：《经济理论和当前的经济问题》，华沙，1961年，第235页。

第五章

经济计算和政治的决策

(一)

随着国家在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增大，政治决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国家作用的增加，意味着宏观经济过程不再是微观经济活动的结果，全面的考虑在经济决策中则起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些因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特别重要，这就使得考察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从1929—1956年这一仍然有待全面评价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决策方面的巨大压力，尽管在整个这一时期中人们一贯认为决定政策的不是政治的规律性而是经济的规律性。并且人们还假定，在选择一项而不是另一项经济政策时，总是而且只是由经济的规律决定的。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正如我们有些人从自己的经验中所知道的——在于说明这些规律，以便为实际的经济实践提供一个伪科学的解释。

目前的倾向是从经济学中排除一切政治因素，这是上述情况的一种反动。人们以为最优解的探索只能建立在经济计算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这是由日益复杂的数学形式所表现的、经济的集计量之间的关系、绝对客观的分析所构成

的。难以否认，重视经济计算是经济学趋向合理性的一个较重要迹象；也难以否认，经过改进的经济计算方法在解决我们经济的长期和短期问题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承认所有这些的重要性时，还应该记住：

——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计算中，我们真正能够期待的是什么；

——只靠经济计算做出决策的限度；

——政治因素在经济计算中所起作用的性质，以及为了保证在决策过程中所有这些因素的同一步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

本章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但必须强调一下，这里只是个极其简单的概述，离全面分析还差得很远。我将利用关于增长理论的波兰文献，特别是卡列茨基著作^①中所讨论的选择代替法作为例子。我想强调一下，我用它们只是作为简单的例解，而不是作为理论上的论证。更重要的是，我所选的例子不是作为加快增长率的唯一战略而提出来的，而仅仅是若干可能性中的一种，这些可能性提供了关于经济计算与政治决策之间关系的特别清楚的例证。

(二)

在进行任何经济计算之前都需要先规定目的函数，即探索最优解时作为目的的、效果的 规定 和 定量化。让我们假定，我们现在的目的是把消费扩大到最大限度。

这个目的本身已包含一项政治内容。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消费的最大限度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经济活动的一个天然目的，但是：

1. 在某些时期中，这个目的可能不如其他目的（如社会

的重建工作，军事生产的最大限度化等等）优先；

2.对消费的最大限度化的解释可以各不相同；

——按人口平均的消费的最大限度化；

——实际工资的最大限度化，即每个就业人口的个人消费的最大限度化；

——受（或者不受）一定制约因素（例如，收入差别的某些变化，个人消费与集体消费之间的一定比率）支配的上述两个指标之一的最大限度化，等等。

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面对着一个政治决策，即规定目的函数，选择衡量这个目的函数的指标。我们在做出这样一个决策之前是无法断定怎样才是资源的最优分配。

让我们假定我们已经做出了最初的政治决策。我们决定计划的长期目标是总消费的最大限度化，这就是说，假定这个决定中不存在人口增长的问题而按人口平均的消费的最大限度化，那么现在，什么是我们经济计算的基础呢？政治因素又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我们将利用上面提到的图式的例子。

让我们假定，在我们必须从可允许的计划方案中进行选择以前的这个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是每单位时间10%，投资率是20%，资本效率不变，等于2。^③这一投资率保证5%的就业增长率（假定这等于劳动人口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则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5%。显然，根据我们的假定，由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变，它（这里又一次简化为等于国民收入减投资）也以每单位时间10%的增长率稳步增长；如果20%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那么80%就将用于消费。

现在让我们假定，中央计划当局正在考虑是否能够通过

提高增长率来既增加消费总量，又增加按人口平均的消费。不可能通过提高就业增长率来加速增长，因为劳动人口的增加是一定的。但是，有可能通过在一个新装备（或现代化的）项目中提高机械化水平，即通过使用资本集约度更高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向较高的资本效率过渡的时期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高于以前的5%，因此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也会提高。一旦达到较高的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就会确立起新的机械化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也就会恢复到以前的“自然”增长率。我们在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两方面就获得了永久的有利条件，因为增长率虽然和开始时相同，现在它却是一个较大绝对量的比例了。

例如，某一特定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等于平均每个工人10个国民收入单位（总是按不变价格计算）。那么，在资本效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技术的发展，第二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将增长5%，即将等于10.5单位。然而，如果提高了资本效率，第二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比如说将增长到平均每个就业人口11个国民收入单位，即第二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等于10%（5%由于技术进步，另外5%由于资本集约度较高的技术取代了资本集约度较低的技术）。如果不再进一步提高资本效率水平，劳动生产率在以后时期中的增长就只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即将只增长5%。然而，11的5%仍然高于10.5的5%，以此类推。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国民收入的水平在一个资本集约度较高的变式中将高于在资本集约度较低的变式中；但是只是在采用资本集约度较高的方法的过渡时期，增长率才比较高，而以后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

为了精确起见，应该指出，上述例子是以中性的技术进步（如卡莱茨基著作的第七章中所下定义）为前提的，而且我对过渡时期的说明也是大大简化的。例如，我假定整个国民收入都是由连续的投资项目不断投产的结果而产生的新工厂生产出来的。实际上，生产设备是由许多“年代的产品”组成的，这意味着，向较高水平的资本集约度的过渡不可能立即发生，而只能随着设备的更新而逐步发展。在经济增长理论（见卡莱茨基著作的第七、八章）中，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在从一个资本集约度向另一个资本集约度过渡时生产设备的“更新”。“更新”率对于“过渡时期”的增长率至为重要，但是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结论，所以不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从较低水平的资本效率变为较高水平的资本效率必然总是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显然，是以合理的行为为前提的，即把资本效率的提高对劳动生产率没有积极影响这样的事情作为不合理的东西而排除了）。但是它也同样有利于消费这一点是否很清楚了呢？

最后让我们再从结论上来开始讨论。到此为止，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成过渡所达到的资本效率水平愈高，国民收入所达到的水平也愈高；此后，不论资本效率的值如何，国民收入都会有同样的“自然的”增长率。但是从增长率、投资率和资本效率之间的关系中还可以得出结论：同样的增长率同较高的资本效率结合起来时，就要求投资在国民收入中占较高的比例。显然，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投资率越高，消费率就越低。所以，在过渡时期结束时，消费率是不肯定的，就是说，资本效率越高，国民收入就愈高，但它用于消费的比例就愈低。一切都取决于这两个

因素中哪个起主导作用。

现在我们回到数字说明上。让我们假定，在资本效率为2，投资率为20%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最初水平等于1,000，即消费等于800。如果按这一资本系数进行发展，那么经过某一段时间（等于“设备更新”所需的时间）后，比如说国民收入达到1,200，消费达到960单位（变式A）。然而，计划当局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发展变式。让我们假定变式B具有以下特征：资本系数为2.3；增长的加速化运动（过渡时期）完成后的国民收入水平为1,300；维持10%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率为23%、消费率为77%；这样，过渡时期结束后的消费水平约为1,000个单位。现在，让我们考察其他三个变式（C、D、E），每一个都有较高的资本效率。在下表中列出这些变式。

国民收入、资本投资率和消费率表

	A	B	C	D	E
过渡时期完成后的国民收入	1,200	1,300	1,380	1,430	1,460
资本效率	2.0	2.3	2.6	3.0	3.5
维持10%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率(%)	20	23	26	30	35
消费率(%)	80	77	74	70	65
过渡时期完成后的总消费(概算)	960	1,000	1,020	1,000	950

在这些顺次排列的变式中，资本效率越高，国民收入就越高，但并不是所有变式中的消费水平就越高。变式C提供了最高消费水平。变式D提供的消费水平比最初的变式A高，

但低于变式C，尽管其资本效率较高。变式E的国民收入水平最高，但它所提供的消费水平却低于所有其他变式，包括最初的变式A。更重要的是要记住，除非发展战略有某种改变，否则各个变式的特征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即使完成了向较高资本集约度的过渡，变式E总是国民收入水平最高而消费水平最低，变式C则总是消费水平最高等等，因为同国民收入的每一个水平相适应，投资和消费在各个时期都以10%的比率增长。

(三)

从以上分析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首先，并不是增长率的所有提高都能长时期地提高消费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因为人们常常以为，虽然增长率的提高可能在短期内对消费有不利影响，但在长期内对消费总是有好处的。然而，变式E则表明了一个事例，即目前消费方面的损失，并没有由从长期来看的消费后来的提高而得到补偿，因为所选择的方法的资本效率太高了。

其次，虽然一个加速增长的变式长期地提高了消费，但这不等于计划当局可以同其他变式进行比较了。例如，变式D提供一个比变式A更好的消费效果，但不如变式C，虽然D比C花费的代价更大（从较高的资本效率来看）。B和D的消费效果虽然相同，但是D所需要的投资率较高，因此应拒绝使用D。如果由于过去错误计算的结果，过多地提高了资本效率而使我们自己处于变式D提供的状况（或变式E提供的更糟糕的状况），那末消费的最大限度化就应该后退，即不是加速增长，而是通过向较低的资本效率“改动”使增长减速。

这两个结果都是以纯经济的计算为基础的（但它们是为某一特定的目的函数——消费的最大限度化——所进行的计算）。如果目的不同（例如在一个长时期内生产的最大限度化），那末结论就会不同；如果为了这个目的，变式E就比变式C略胜一筹。

然而，假定我们的目的仍然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化，是不是就可以把变式C当作最优解来采用呢？全然不是。人们必须考虑到从一个资本效率向另一个资本效率过渡这个时期中所发生的事情。与A和B比较，变式C长期地提供了较高的消费水平，但它也要求过渡期间能有较高的投资率，因此需要较多地牺牲目前的消费。这当然并不一定意味着消费水平的绝对下降，但是不论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下降总是大于A或B。这是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传统的冲突。计划当局使用严格的经济计算是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经济计算使得人们有可能拒绝采用那些没有把目的函数扩大到最大限度的变式（这里是变式D和E）；它还指出可能的解决范围（这里是变式C、B、A。这些变式可以满足的条件是，目前在消费方面的牺牲可以由消费的长期效果得到更大补偿）。但在C、B、A之间进行选择则需要使用非经济的标准——估计为了未来的利益应该牺牲多少目前利益。这当然是个政治决策。必须在提供最佳长远结果的变式C（符合“积累的黄金律”）增长计划雄心不大的变式B和既不提高增长率，也不降低目前消费的变式A之间作出选择。

在对目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相对“价值”进行政治上的评价时，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判断某一经济战略对那些参加经济活动的人的态度的影响，也就是对劳动生产率和制度的总效率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但它的重要性是

显而易见的。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到此为止我所讲过的若干要素，因为只是为了作为例证，所以用非常简单的形式做了表述。但基本的结论是清楚的。

一方面，在消除效率低的解式方面，以及在规定找出可接受的解式范围方面，经济计算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忽视经济计算及其所依据的各种理论，并代之以僵死的先验的教条或直觉，都只能造成损失——做出的决策规模愈大，损失的规模也愈大。所以，经济计算的方法在理论基础和应用技术方面都需要不断改进。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一点，即还需要改进适合于应用这些方法的社会经济的先决条件，例如，发展一种为应用经济计算提供经济刺激的经济体制。

甚至这也不能创造理想的条件，但是在制定可供选择的方案时，它可以提供越来越高的精确性。然而，甚至最精确的经济计算也永远不能排除（这是我们结论的另一方面）制定发展计划时做出政治决策的必要性，因为：

1. 最初的出发点（目的函数）是政治决策的结果；
2. 从经济计算所得出的若干可供选择方案中挑选最佳变式也是一个政治决策；
3. 在决定用于消费的基金的规模和结构时，通过它们对那些参加经济活动的人的行为的影响而间接地决定放进经济计算的参数，这也是政治的决策。

结论是，广义的经济决策的最优化，不仅包含着经济计算的体制和技术，而且也包含着相应的政治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达到澄清和妥协，因此以社会名义作出的决策可能接近真正的社会偏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明确和开诚布公地提出发展战略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以便公众有可能对此进行讨论。这就要求在那些负责做出决策的人和舆论之间存在有某种“反馈”(feedback)。这两个好处：

——一方面，这可以使社会学更好地识别其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当然，前提是能够向人们指出，提出的所有决策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另一方面，关于各种选择方案所表明的舆论，可以使那些负责做出政治决策的人学会更好地识别社会为了将来的利益准备牺牲眼前利益的正确限度。这是决定最优解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种政治结构，是发展正在共同管理国有化生产资料那种感情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否则就不能期望社会主义经济持久地向前发展。

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真正地，而不仅仅是在形式上承认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的相互依存关系。必须抵制不同时期中因不同原因而想从政治经济学中排除这个两方面的任何一方的倾向。这两个要素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进步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且首先是生活的需要。

(本文最初载于《经济生活》第42期，1967年，华沙)

注 释

① 米哈尔·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入门》，牛津，1969年。参见卡兹米尔茨·拉斯奇：《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概要》，华沙，1965年。

②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从下列简化公式中除去非投资因素和就业

$$r = i \cdot \frac{1}{m}$$

在这个公式里， r = 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i = 投资率(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 m = 资本效率(国民收入每一单位的增长所需要的投资支出量)。

第六章

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首先，从证明主题的提法的正确性开始，我想是合适的。实际上存在不存在将理论经济学（人们常常把它看作是有效分配有限资源的一般理论）分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混合经济的经济学的理由呢？卡莱茨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为明白的。1969年，他向剑桥大学提出的、在他死后才发表的、他晚年的一篇论文，是这样开头的：“某一社会制度的体制结构，是该社会经济动态的基本因素”。^①显然，这并不是他晚年的转变。他总是明白地指出，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被当作结构体制，在他的分析中又假定这种结构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论述投资的降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给就业和国民收入带来的结果——这对于理解把社会体制引进经济学中的真正的实质的（同神学的相反意义上的）意义，是绝对重要的论点——时，卡莱茨基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就业将通过比照成本来降低价格而得到维持”，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格和成本关系……得到维持，而利润通过削减产出量和就业，降低的幅度等于投资加资本家的消费。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通常是把‘价格机制’看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很大优点，而价格的灵活性又明显地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这实在是自相矛盾的。”^②

这段话听起来可能很奇怪，所以简单说明一下。假定资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投资活动降低了，那将如何呢？卡莱茨基根据大家知道的论据说：那将带来利润的降低。我们假定新的利润水平是 OA' 。到这里为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以上情况和社会体制没有关系，在任何经济中都会发生。但是，就利润降低的冲击来说，则社会体制不同就会有天壤之别。在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体制下，作为一种倾向，将通过保持现有的价格和成本比率或者保持价格和工资比率，把利润的比例保持在 $\frac{P}{y}$ 线上。其结果，将会把国民收入的水平降低到 OC'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任何经济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去坚持旧的利润（或剩余）比率。即使是一位暴君，只要国家没有损失，也不会反对增加他的臣民的福利。在这里，为了保持过去的收入水平（ OC ）而把人民的消费从 DB 增加到 DB' ，那就可以把剩余的比例减低到 $(\frac{P}{y})'$ 。

上面的例子中包含了很多简单化的说法，但在基本点上正确的。就是说，两种社会体制对于“投资倾向”的降低的反应方式是不同的。一方面的反应方式是，使产出量和就业去适应收入分配给工资和利润的已知类型，另一方面的反应方式是，使收入分配去适应产出和雇佣的能力水平。

这一点本身不应当理解为断定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证明。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开工水平的产出也很有可能比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的产出要大，或者质量更好，更符合需要。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使有效需求的总量去适应生产能力，这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在已知的组织上和其他界限的范围内）。必须研究作为一种由供给规定的类型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其理由就在这里；而这件事情，正如卡莱茨基总

是很有耐心地说明的那样，对于经济理论及其应用的理解方式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

毫无疑问，完全承认作为经济动态的基本要素的社会体制的作用，这是卡莱茨基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在最一般形式上的反映。从这次连续讲演（追悼卡莱茨基的纪念讲演）中的其他发言里也可以知道，对于非常了解卡莱茨基的资本主义研究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我只想指出一点，即在卡莱茨基晚年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想把标准的经济推论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的理解这种宽广的结构（framework）加以调和的一种尝试（尽管不能说是很成功的，但却是很有特征的）。^③ 他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办的《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所提出的卓越论文——关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对于分析现代经济的重要性——是特别值得注意的。^④

卡莱茨基一方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马克思的很多经济分析工具的巨大意义，另一方面并不认为自己必须接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构成要素，或者必须坚持从新的经验和经济理论的进步来看已经过时的部分。例如，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很有反感，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不愿意讨论它（如果不是我理解错了）。他不是 一个御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当时党的领导人的“权威性”解释的束缚，每当他们的政策作急剧转变时，只是为他们的虚构理论寻找论据；同时另一方面，又拒绝把社会主义当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进行检验的对象。对卡莱茨基来说，不管社会主义怎样不同于资本主义，它也决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乌托邦。

他自己意识到他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某些特殊的烙印，当 1954 年 12 月他回到波兰来的时候，他就怀着坚决站在仍然受

神学式的教条（当时我们刚刚开始要抛弃它）束缚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圈子外面的决心。在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件以前一个时期，事态以出乎预料的速度在急剧变化。并且1956年春天以后，卡莱茨基同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挑战性的争论，以及对新政策和制度改革的探索，都有了很深的关系。当时我们才开始感觉到——为了我们的名誉我必须说，几乎是立刻处于高涨形势中的“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当时是这样称呼波兰事态的发展的）来说，我们已经从这位小人物的身上获得了多么强有力的知识财富。

非常富有特征的是，卡莱茨基在两条战线上对已形成的教条进行了斗争。第一条战线的斗争，是反对所谓公认的“规律”，即反对被说成好象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绝对条件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优先发展”的斗争。这个教条是1955年马林科夫下台后在苏联刚刚重新提出来的。卡莱茨基选择了这个题目，作为他向1956年6月波兰经济学家第二次大会提出的论文的标题：《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和国民收入的动态论》。^⑤作为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增长理论的出发点，他采用了简单的增长模式，把这个模式同他自己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的解释结合起来，他阐明了绝对化的结论（第一部类的优先发展）是怎样无法承认的。首先，他证明了同生产资料部门的优先增长相适应，必须增加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其次，在边际资本效率不变的条件下，能够证明生产资料部门的优先增长之所以正确，只限于增长的加速化（而不是增长本身）是属于计划战略的场合。第三，为了支持这样的主张，即一定的增长率需要投资按比例的增加，从而需要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那就有必要假定边际资本效率永远持续地增加。

只要我们是**以最终产品为对象的**，即使引进对外贸易，也没有什么变化。我永远也忘不了卡莱茨基的论文所给予大会的强烈印象，这并不是因为他对特定的增长政策在是或否的绝对方面加以肯定或者进行反驳，而是因为他要求结论应该是从明确规定了的前提和相互关系中、并且不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是培育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烟幕背后撒下的神秘观念的土壤）地推导出来。

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是反对一部分人对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制定计划的**可憎经验所持的极端反动态度**。由于人们对中央集权制的失望，所以认为解决的出路在于采用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来代替中央制定计划的见解很得人心。有些人通过证明有可能引进或模仿全面的市场活动来捍卫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性，或者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应该到它更适于创造并且保证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这种重要的教科书式的条件这个事实中去寻找，卡莱茨基并没有受到这些理论和主张的诱惑。对他来说，拥护社会主义的根据——撇开分配和其他社会方面的考虑不说——在于中央制定计划，其理由不是由于它是一种类似完全市场的资源分配的结构，而不外是由于在事前而不是在事后所采用的非市场的、根据长期宏观标准的资源分配，因利用中央制定计划而成为可能。和在其他很多情况下一样，卡莱茨基不仅有勇气反对现存体制，而且也有勇气反对投合大众的**错误潮流**。

这并不意味着卡莱茨基同意中央计划的集权模式并反对人所共知的经济改革。相反，他为了找出以下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解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些问题就是：**经济决策权限的合理的转移**，**削减强制性计划指标数和废除明明是有**害的指标****（例如评价很坏的总产量指标），

引进同盈利性结合起来的经济刺激，以及价格、信贷政策、利息率的积极利用等等问题。换句话说，他并不反对利用市场机制的思想，但是，他认为在关于主要发展方向的限度内那些应由中央制定计划的经济运行中，这是作为一种从属因素。我们两个人在这个领域里，特别是在经济委员会（我们两人都是这个昙花一现的政府咨询机构的副主席）和在受命审查所谓“实验企业”章程的小委员会里，都曾密切合作过。

卡莱茨基对经济改革采取了建设性态度的理由之一，在于正在出现的（当时是那样看的）、作为经济运行体制的基本要素之一的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是同经济改革互相联系的。他为了准备1956年的工人委员会法，非常积极地进行工作，他并且想阐明两者的相互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两个方向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如果没有某种分权化，那工人委员会也就完全失去了实际活动的领域。1956年12月发表的论文^⑥，他强调：“通过生产的组织化，为工人委员会创造发挥主动精神的可能性的，是扩大企业的权限”。另一方面，他认为同中央制定计划结合起来的工人委员会制度，似乎构成了种种因素——避免经济机制中过去的退化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所不可缺少的种种因素——的合理的结合。虽然他也象往常那样，向人们发出了警告，抱过多的希望为时尚早，但是他深信，从长期来看，这个道路是正确的。当这个方向的运动首先受到阻止，随后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时，他深深饱尝了失望的感受。

尽管在经济管理方面他非常关心并且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但是，卡莱茨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长期计划的领域。作为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学术顾问、计划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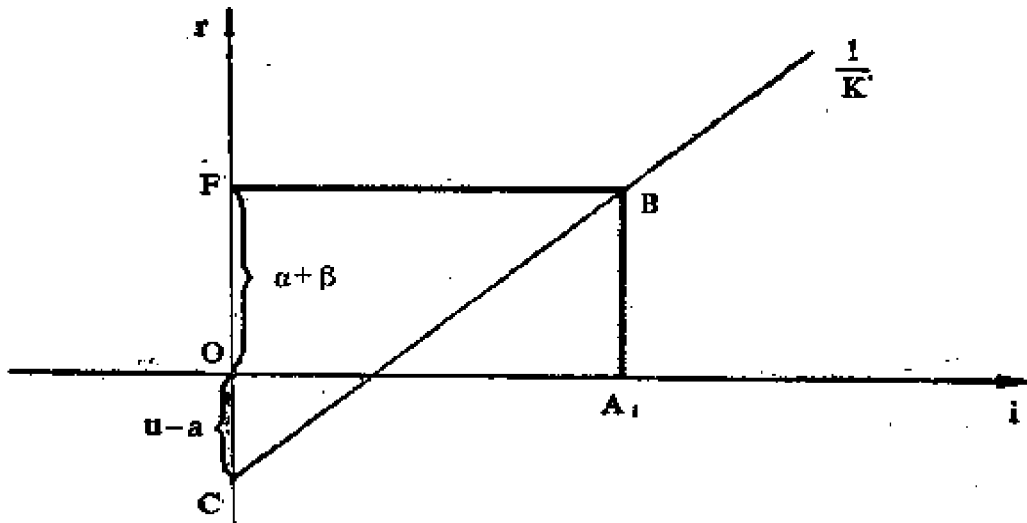
会远景规划司司长、作为经互会会议的参加者等等，他首先是和波兰的长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有联系的。作为这方面的活动的直接产物，出版了几本重要的书。这就是：《1961—1975年长期计划》（1958年），《制定长期计划的方法概要》（1962年），《关于制定长期计划的基本原则》（1963年），以及其他一些论文。^①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他作为制定长期计划的理论基础的东西）的反映，同时也是对这种理论的新贡献。制定计划的实践同增长理论之间的明显的相互补充，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叙述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增长理论。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理论概要》已经用英文出版^②。值得指出的可能是，他所强调的该书只是一种绪论性质的著作，相信还需要进一步做精细的加工，以及他为了避免过于复杂的数学上的表现而做了非常细致的努力。但是，我想指出的主要一点是，他的增长理论同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整个理解方式怎样协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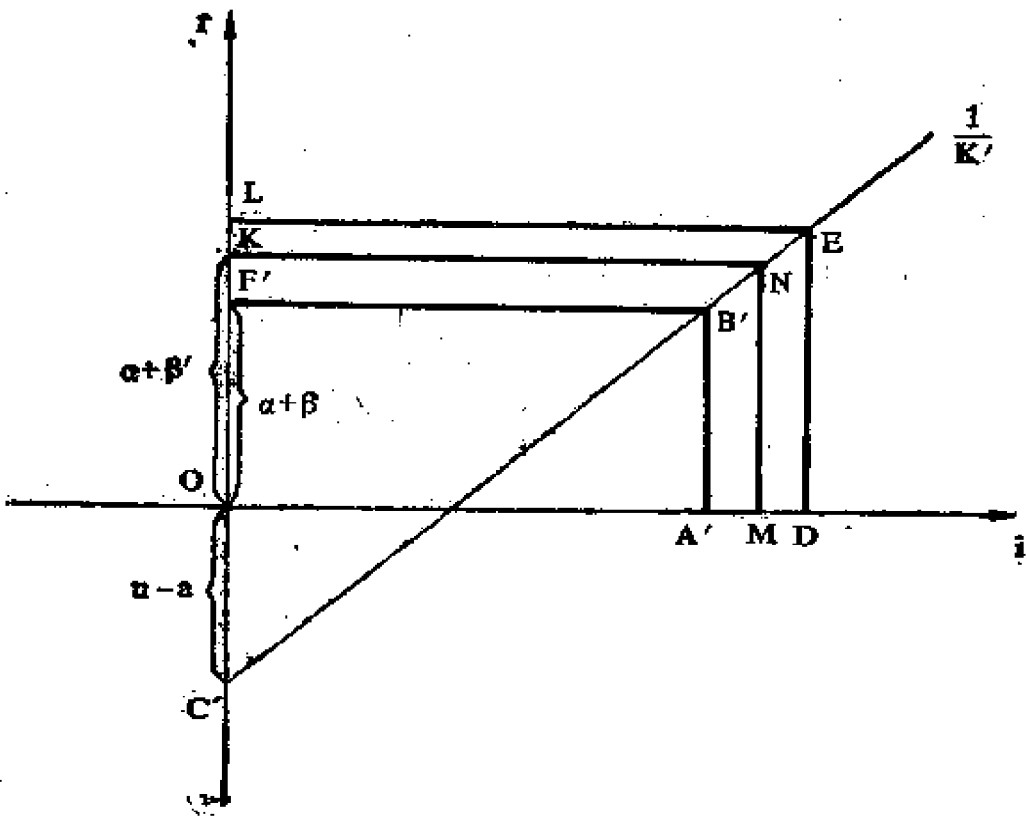
卡莱茨基当作出发点所使用的基本的增长模式，是非常简单的。

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r ），一方面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α ）和就业的增长率（ β ）决定的。用近似的形式来表示，就是： $r = \alpha + \beta$ 。同时， r 又是由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frac{I}{y} = i$ ）和边际资本效率（ m ，或不仅考虑固定资本投资，也考虑库存投资时，则是 k ），以及两个追加的系数——也就是反映由于废弃磨损了的旧设备所产生的负效果的 a 和表示改进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的 u ——决定的。投资和国民收入两方面都是包括折旧在内的总额。这样就得出

第2图(a)均衡增长的基本方程式



第2图(b)有劳动力储备条件下的增长加速化



如下公式：

$$r = \alpha + \beta \quad (1)$$

$$r = \frac{k}{I} \cdot i - a + u \quad (2)$$

公式(2)，完全不需要按照产出量增长部分单位平均的库存投资，从而是基于 $k = m$ 这个简单化的假定来表示的。

在第2图中， i 是用水平轴来计量，而 $\frac{I}{k}$ 则用CB线的倾斜来表示。原点O下面的C，是基于 $a > u$ （如果 $a = u$ 的点C与O相一致）的假定，反映着 $(u - a)$ 的影响。在垂直轴上，可以计量到增长率 $r = \alpha + \beta$ 。

卡莱茨基的基本增长模式，是同哈罗德—多玛的增长模式相类似的；或者也常常有人认为是相同的。从形式上看，也许是那样，不过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说法忽略了关于他的模式的实际内容的解释以及使用这种模式所做的分析。这两点同本文开头所讲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全面理解有密切联系。卡莱茨基自己在我们已经谈到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增长理论”中，认为由于以下原因，哈罗德—多玛模式对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适用。

“有效需求和资源利用的问题，被忽略了……。它只有对实际解决了有效需求问题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才是适用的……。但是，困难是从我们所讲到的模式常常不是集中在来源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的种种本质问题上这一事实产生的。”

作为这类的问题，他强调了两点：即(1)作为与探索均衡扩大的某种体制的、所谓最优均衡增长途径相对立的、

从一个增长途径向另一增长途径的过渡问题；（2）长期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撰写社会主义的增长理论时，他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

从一个增长途径向另一增长途径过渡问题的第一个侧面，是从有必要通过把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力储备完全用掉，使增长加速化而产生的。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公开或隐蔽的形式上有过这种储备（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储备）。即使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如果以一定的资本效率为前提，那就要发生与此相适应的、资源分配上的某些变化。第一，就业的增长率（ β ），为了吸收失业人口，可以比同一时期的劳动力增长率提高得更高。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这就需要增加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i ）。从资源的利用观点来看，这个变化应该是尽可能迅速的，但是这件事情并不那样单纯。因为，即使撇开生产能力结构中的技术上的限制不说，它对当前消费来说也有某种影响。而这是现在和将来之间交替换位的政治问题，同时卡莱茨基也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引进了他的“政府决策曲线”概念。这个概念在选择长期战略的主观的（政治的优先）因素和客观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上是对准了焦点的巧妙的说明工具。显然，不管怎样，劳动力储备的吸收过程通常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对于下降到接近正常的就业增长率来说，也是需要时间的。当然，在其过程中，条件会有变化，于是又需要探索新的“均衡”。

以上所讲的过程，是用第2图（b）来表示的。从和第2图（a）上相同的最初的位置（增长率 $r = OF = OF'$ ，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i = OA = OA'$ ），同比现在的劳动力增长率还高的就业增长率相适应，首先向 $i = OD$ 移动。

假定 k 是一定的（即假定从点 C' 所划的直线的倾斜是相同的），那末就得出国民收入增长率 $OL = DE$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点 B' 向点 E 移动。很清楚，只有在可能利用积累起来的失业人口时，才有可能保持这样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其后，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必须削减到 OM 这样的点上，这时假定 k 是相同的，那就会使 $MN = OK$ 这个国民收入增长率成为可能。^⑨换句话说，也就是沿着 $C'E$ 线从 E 点向 N 点移动。当然，在这个说明中，并没有考虑在最初的位置和与正常就业增长率相适应的位置之间将会发生的一切变化。

随着这种变化，在资本效率或者设备的耐用年数上发生变化时，从一种增长途径向另一种增长途径的过渡问题，是更为复杂的。卡莱茨基对这个问题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利用他所特有的模式即最典型的“葡萄串”《Vintage》模式，非常彻底地进行了探讨。

我想他在增长率变化的这个事例上给予了特别注意，至少有三个主要理由。第一，在有劳动力储备的经济的情况下，增长的加速化本身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使选择的问题实际上被还原为速度的选择问题，也是如此；但在其他情况下，增长的加速化则需要资本效率增加，或者付出设备“翻新”的代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有一个是否应该提高增长率的更为根本的决策问题。

第二，相对性要素变得更为强有力的原因，只是由于在同一边际资本效率下的加速化，从长期来看的利益倒是确实的，使人采取慎重态度的是短期牺牲的规模。与此相反，卡莱茨基的最典型的模式，只有在满足了一定的严格规定的条件时，才能使长期的利益成为现实。在所有各种各样的“黄

金律”思路中培育起来的人们，也许不会全面地评价这一点的重要性；而在东欧所存在的状况下，这却给关于制定长期计划的变式的思考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dimension）。这里我谈到了“黄金律”，但是，希望不要从这里产生任何误解。卡莱茨基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现“黄金律”式的解决上面，只是因为，对他来说，在关于技术进步类型的某些假定下，可以表明有效的变式的上限。他写道：“选择资本集约度的中心问题，是设备更新过程中的生活水平问题”^⑩（“设备更新”是指资本设备从资本集约度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逐步转变）。如果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概要》一书的这一章比较注意的读者，将会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所有参数）能够从某个水平转到另一个水平上去，不限于只是在某个转换点上，事实上，在整个过渡期中都在发生变化。卡莱茨基为什么要把他的理解方式同传统的增长理论加以对比，在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增长理论》一文中明白指出“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微不足道的著作的大部分是在《比较静态学》的平面上写的”，其原因首先可以用这一点来加以说明。

卡莱茨基把注意力集中在“设备更新”以及“设备翻新”问题上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技术选择和计划方案的选择标准问题同它们有紧密的联系。他对莫里斯·多布和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所提出的在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情况下也支持提高资本效率（在一定的前提下）的议论做了批判的分析，也是同这一点联系起来进行的。卡莱茨基认为，当把过渡期间中技术进步的影响考虑进去时，多布—森的解决就不会有任务重大的实际意义了；但是，他承认他们在扩展这个主题的理论探讨的范围上

是有贡献的。他一贯赞成的是这样的看法，即在决定“边际回收期间”（为了选择计划方案的、宏观经济的参数）时，应该采取可以达到同劳动力的供求平衡以及（如果考虑到开放的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能够同时并存的最小限度投资的做法。^①

关于社会主义增长理论中的过渡期间问题的最根本的重要性就讲到这里，这可能是不够的。在关于第二个特殊问题（长期发展的瓶颈问题）的限度内，对扩展中的经济来说，供给决定型所具有的意义是很清楚的。

“当国民收入以高的比率增长时，一部分产业的扩大之所以落后于对它的产品的需要的扩大，是由于例如缺乏有相当训练的人员或者在适应技术改进上有困难（后者特别是农业的情形）的某种组织上或技术上的因素。由这种结果所产生的缺口必须由对外贸易来填补；而要保持对外贸易的平衡，就必须或者增加出口，或者由国内的生产来代替某些进口。这些业务通常都会带来资本和劳动的支出上升，因此使经济增长问题受到深刻的影响”。

卡莱茨基一贯把发展的瓶颈问题的影响穿插到理论分析的主流中去，并在分析的各个阶段上对自己的模式做相应的修正。

在他看来，对长期发展瓶颈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是现实主义的制定计划的条件，从而可以避免发展的中断，比按照“轻武器兵团突击”式的计划化，能保证更高的长期的增长。但是，正统派的批评家们却用失败主义者态度的罪名来攻击他。在1950年代末期，不折不扣地引用斯大林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没有攻不下的堡垒”，即使没有任何人想过这是符合潮流的，但其实际意义却是一样。卡莱茨基的1961—

1975年度远景计划被放弃了，在这个意义上攻击他的人是成功了。但对国民经济来说，成功的程度却是很小的，这是它的实践的归结。不过，这是题外话，就到这儿为止吧。

这次讲演的主题过于广泛了，所以我没有在中途穿插一些大家喜欢听的有关卡莱茨基的小故事。非常遗憾。因为卡莱茨基从严肃的经济问题会议的会场中不带回充满伤感的警句的场合是很少的，而且他以这些警句不亚于他的卓越的经济论文而自豪。不过，我自行规定的这条纪律却束缚了自己，例如，关于收入分配的变化和经济犯罪调查的短小精练的、他的为数很多的关于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我一个也没有来得及谈。就卡莱茨基的理论活动来说，我所介绍的，与其说是他的理论内容，不如说只是他对理论问题的分析方法而已。

如果我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卡莱茨基的分析方法是完美无缺的，那将是错误的。例如，在下面一点上就可以批评他。那就是，在他的增长模式上总是以已知的消费结构为前提的；同时，他在这一点上想要把选择的标准加以公式化的唯一一次尝试，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令人满意的。^⑫他广为利用的生产曲线^⑬同传统的新古典派的等量曲线之间的关系，也还是不清楚的。他完全当作外生的变数来处理技术进步的作法，漏掉了一些重要的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的反馈（feedback）。但是，总起来说，我认为卡莱茨基的分析方法是结出了丰硕成果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上，他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最根本的重要问题的上面了。

卡莱茨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并且总是想站在直接参预政治的圈子外面，尽管如此，他却那样再三地陷入政治争论的漩涡中，这是为什么呢？至少部分地可以用对于重

要问题的这种集中注意来加以说明。1964年，由于他对五年计划提出了若干修正意见而受到来自最上层的激烈攻击，不加修改而付诸执行的这个五年计划，结果成了1970年12月工人暴动的导火线。1968年，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波兰的三月事件的急流中，对卡莱茨基的理论和他的学派进行了打击。在这种攻击中，如果看不到某种逻辑或者本能的条件反射行动，那将是错误的；不过，有时这种攻击的背后却存在着非常卑鄙的可能有的各种动机。从全体主义的体制和既得利益的观点来看，这位人物是危险的，而且他的整个分析方法装着政治炮弹，他对相对主义、矛盾、制约条件和选择的强调，对于不合理的物神崇拜、恣意性和所谓唯一正确、没有选择余地的途径，对于顽石般的固执，是一种诅咒。这种反应的表现方式，应该理解为是对米哈尔·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力量的、特殊的但却是妥当的赞颂，并且尽管还有种种障碍，从历史的展望中来看，应该理解为乐观主义的源泉。

（本文最初载于《牛津大学经济学统计学通报》第39卷第1期，1977年2月，追悼卡莱茨基纪念讲演专集）

注 释

①《不同社会制度的增长理论》，《科学》V01.CV，1970年5—6月。

②《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决定》，《关于1933—1970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论文选集》，剑桥，1970年，第97页。

③《计量经济学模式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纪念奥斯卡·兰格论文集，华沙，1964年。

④《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和现代经济学》，《社会科学通报》（6），巴黎，1968年。

⑤《社会主义经济中投资和国民收入的动态论》（波兰文），《经济学者》，1956年第5期。

- ⑥《工人委员会和中央计划》，（波兰文），《新路》，1956年第12期。
- ⑦《制定长期发展计划的方法概要》，见《关于计划化和经济发展的论文》，《不发达国家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第1卷，华沙，1963年。
- ⑧《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理论概要》，牛津，1969年；《关于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增长理论论文选集》，剑桥，1972年。
- ⑨假定就业增加率现在比增长率向OL加速化以前还高，即假定 $B' > \beta$ 。
- ⑩参照注⑧所引论文选集。
- ⑪《投资计划和方案选择》，《关于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增长理论论文选集》第二部分，剑桥，1972年。
- ⑫《论消费的最优结构》（波兰文），《国家计划》，1963年第7期。
- ⑬参照注⑧的附录。

第七章

社会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和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在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关键要素在于强调作为现实世界进步的变革工具的、科学的积极作用。科学的积极作用要求批判地分析现实世界，揭露它的内在矛盾并指出克服矛盾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态度的最好例证。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保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是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为完成它的积极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条件？

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意味着 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完结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常常有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政治经济学也会走到一个尽头。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中间，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不开的一些人——希法亭、布哈林、罗莎·卢森堡。

责难这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否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从而又怀疑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过程中存

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性，（这种指责）大概过于天真过于简单化了。不过他们似乎也曾认为，社会主义的唯一问题可能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而产生的问题，即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科学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将是去发现今天——用奥斯卡·兰格的话说——叫做生产的技术平衡规律(technical—balance laws of production)。某种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那是生产的社会规律的理论，而非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位置将由上述某些著作家所说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的理论这门科学所取代。

这种观点中难道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吗？当然，它包含一系列重要的要素。为了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如何从一定的支出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或者如何从最小限度的支出取得一定的效果（目的函数的最大化或支出函数的最小化）——当然必须全力以赴。不过，建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这些问题已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高度。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它并不是资本主义下的合理的经济运行的科学。然而，在社会主义下，经济学就必须处理这些问题。它必须在关于互相协调的计算(calculations dealing with coordination)和特别是在最优计算——即选择最有效的解式——这两方面进行探讨并应用可能最好的制定计划的技术。这就为数学、控制论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在经济学上的利用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些知识既可以丰富制定计划的方法，又可以提供对经济活动的合理性进行评价时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但是，很清楚，在经济学者处理制定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并且他必须这样做）这个限度以内，他是和社会问题没有

直接关系的。制定计划的理论和技术在社会上是中立的。它从两个最一般的观点——确定已知目标能否达到，以及确定用尽可能最少的支出达到特定目标的种种条件——来考察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是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发生的问题，从而在一般的形式上构成人类行为学(praxiology)（合理活动的科学）——研究一般的合理活动的种种因素和有效运行的条件——的主题。只有在离开了关于目标和手段的一般考察，转到在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中去具体地规定目标和手段时，社会问题才会发生。这时，制定计划的理论就把作为已知的来处理的东西当作对象。

为了全面考虑客观情况和发展上的要求，正确地规定经济活动的手段和目标，在社会主义下，不仅是经济的技术方面，是不是还需要有处理社会、经济方面的、科学的独立部门呢？对这个问题的否定的回答，来源于如下的确信，即废除了资本主义将意味着排除了生产力发展中的一切社会的经济的障碍和一切矛盾。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社会的经济的问题，将是所谓明了的，所以关于揭露隐藏在物神化了的形态这块幕布后面的事物真相的科学，它的必要性也将会消失。特别是，社会主义曾经被认为是：通过克服经济发展的自发性，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重新结合，并且通过建立个人利益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直接关系，将一举而创造出克服异化——作为生产者的人，同他自己的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相分离——所必要的前提条件。

这种思想也包含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社会主义——特别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实际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进步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基本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意味着：私营经济中的合理的商业标准为社会经济的标

准所取代，同时，这件事情又带来经济过程中人的地位的根本变化。

以上这种想法的不精确、不完全和不正确，归根结蒂是从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的克服同矛盾一般的克服看作是同一的这个事实产生的。而这又导致认为社会主义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摆脱了矛盾，是完全协调的那种主张。当然这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虽然为克服异化创造前提条件，但是这种前提条件也仅仅是前提条件而已。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距离它的完全社会化，即具有我们常常叫做对于劳动和社会所有制的那种社会主义态度，还有很长一段道路。

如果是这样，那末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关于经济运行的技术理论，即“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的科学”，而且也还需要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这里的政治这个形容词包含着全部重要性。所需要的不是关于经济运行一般的理论，而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加以透彻的分析，提供克服矛盾的方向的批判性阐述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理论。

社会主义并不使社会的经济的矛盾消失

要表述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最概括的特征，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曾经在别处考察过它的若干侧面。^①在这里，为举例起见，将限于探讨一个问题。

据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支配着具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是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最大限度的消费（这是由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所决定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已经解决了资本主义所特

有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那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已经摆脱了一切矛盾。

第一，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作为“时间视野”的问题而被注意到的问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消费的增长决定性地取决于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又和创造适当的生产设备有关，并且这就需要有投资企业。在某种情况下，这会带来如下一种状况，即为了在长时期内增加消费的努力，会限制短期的消费增长。这会产生社会的政治的结果，不过，它反转来又可能具有非常具体的经济效果。现在对于消费的过分限制，对劳动生产率可能产生有害的影响，并且有可能危害生产的有计划增长。

第二，消费的增长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达到，与此相适应，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果。例如，主要是通过就业的增加而达到的消费增长，它与主要由于生产率增加的结果所达到的消费的增长是不相同的。可用于消费的商品同样的增加，前一种情况远比后一种情况在实际工资（每一就业者平均）的增长中反映得更微弱。

第三，消费的增长，可以采取个人消费的增加和社会消费的增加这两种形式。^②

第四，消费的增加，可以在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进行各种各样的分配，并且消费增长的分配方法本身，也有可能影响消费基金的规模。这个问题同收入差别问题有密切关系，因此又同通常作为“平等主义对收入差别”问题而受到注意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关。

社会的经济的可供选择方案的 选择机制的必要性

仅仅举出只是从一个领域所引出来的这少数的问题，就足以使人理解到，在看起来简单、一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的背后，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多样化的可能性。同时十分明显，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不是技术的可供选择的方法，而是社会的、经济的可供选择的方法。因此对于解决的选择，必须联系到当前和长期的利益及因素进行核算、预测。政治经济学在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上能够起它的不可缺少的——积极的——作用，仅仅限于当它能够揭露经济过程中现实出现的社会、经济矛盾，从而指明用以解决这些矛盾时所应采取的方向和机制时才如此。

这两个问题——应采取的方向和应采取的机制问题——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克服异化的过程，在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越来越一致。这首先意味着，必须去创造有助于揭露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辩证的矛盾的那种政治、经济形式。而这一点又和下文要讨论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有关。但是，即使在这个时点上，也可以有绝对的确信说，例如，由关于给定期间的**基本经济问题**——按一定顺序排列的——的决策的组合（**set of decisions**）所构成的具体经济计划，从任何观点都决不应认为是绝对的解决（一般说来绝对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而应看作是许多可能的选择当中的一个。如果这是对的，那末为了保证讨论计划时的真正的社会参预，就有必要简单明白地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分别指出它们的优缺点，这样才使得有可能把各种见解摆清楚并得到全面的分析。长期计划不应象过去那样仅仅准

备和讨论一种稿本 (versions)，而应准备和讨论几种稿本，产生这个要求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也产生同样的问题。通常把它们叫作“经济模式问题”。计划经济的组织原则——集权和分权的程度，直接的行政工具和市场工具的利用范围，经济刺激的作用——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特殊运动形式。幸而，现在关于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机制形式只有一个的观点已经成为过去。这就是产生了经济学的基本任务——选择符合于一定发展阶段下种种条件的形式——的根源。在欧洲社会主义各国正在进入内涵的发展因素占优势阶段的今天，这个任务尤其重大。要利用这些因素，就有必要大大提高经济领导的严密性和正确性，同时，要扩大群众参加管理——全面利用群众参加管理的潜在可能性，它存在于还不成熟的“工人自治”机构之中。

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 政治上的前提条件

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一门继承马克思的传统的、生命力充沛的社会科学，是不可缺少的。但这并不降低发展经济的规划的重要性；即去探索和完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更好地理解和发展合理的经济运行的技术和生产成为可能。

但是，要创建关于经济运行的社会理论，就需要有超过仅仅形式上承认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必要性的更多的东西。本文一开始所谈到的那种观点早已成为过去了。然而，尽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十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占有光荣的地位，但要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当前的作用，还

是很困难的。这可能是由于如下事实造成的，即在一个相对的长时期中，对它的职能的承认停留在形式上面，存在着失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根本的侧面之一这种情况。就是说，对政治的、经济的现象做批判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不是去揭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而是用全部协调的名义去掩盖那些矛盾的科学，失去了一切影响现实世界的希望，使它从科学堕落为辩护论。在过去，很不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它的灾难性后果，例如可以从一部分经济学家确信他们能够积极行动的唯一领域，只有编制计划、组织等等形式上的理论这种事实中看得出来。其结果，“经济运行的社会理论”这个术语，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还停留在一个命题上面。不难想象，这种事态对于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从而对于所采用的政策，带来了什么样消极的结果。

这种局面的改变与否，取决于许多因素——也取决于经济学家们自己对于社会参预的态度，以及他们所被给予的学术上的自由程度。但是毫无疑问，为了作为经济运行的社会理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首要条件是创造一种政治环境，即把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独立研究，作为有价值的活动来对待，而不是看作对一般路线的一种违犯。为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定的政治上的前提条件是不可少的。

社会主义下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改变

以上的讨论，对社会主义下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考察。当然，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对于这个关系的正确规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之一。

我们可以把问题公式化如下：无论是明确地还是含蓄地，如同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当作一般惯例的那样，社会主义下的经济基础与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至少在关于它的一般特征这个限度内——是否同在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中所看到的相同呢？

在波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论述历史发展的一般原理的著作中，都毫无保留地承认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本要素。奥斯卡·兰格的公式是很典型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可以说，是决定生产关系的总体的组织原理”。^③同时，国家——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马克思的有名公式——则被看作是耸立在“经济生活的基础”^④上，并且按照“上层建筑必然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规律”（即所谓第二个基本的、社会学的规律）^⑤，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两个要素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同国家（政治权力），都是今天单独的彻底分析的对象，关于社会主义下的它们的意义，都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不过，它们的相互关系的本质——即一方面作为“基础”从而作为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从而作为被决定的因素——一般是接受的，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适用。这种确信——如果我没有把它理解错——我看似乎是没有根据的。我的意见是，根据传统所接受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基础”，另一方面是“上层建筑”，从而“归根结蒂”被认为是决定的因素与被决定的因素——就社会主义而言，是需要做根本修正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与政治——特别是做动态的考察时——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古老的概

念越来越不适当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取决于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关系的发展——政治权力体制的变化——这特别在危机时期中会强烈地感觉到。

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这种变化，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定义本身来说是很明显的。一般认为，这种制度的基本标志是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占统治地位（这里不考虑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所有制的差别，假定以今天在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上所出现的社会所有制为考察对象）。

但是，什么是社会所有制呢？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要找到这个用语的全面、正确的定义，是出奇的困难。

约瑟夫·熊彼特^⑥曾经同其他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一起使用公共所有制这一用语，这至少是部分地从公共机关（国家、地方自治体等）的所有制与私人或私人组织的所有制之间的形式上的和法律上的差别引出来的一个概念。必须指出，即使是象这样下了定义，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的体制下，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同在典型的资本主义下的关系有很大不同了。因为，现在的政治因素直接影响着关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分配的经济决策。

然而，马克思主义文献决没有满足于作为公有制的社会所有制的定义。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如果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是不被看作社会所有制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承认公有制为社会所有制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要素的国家——的性质被看作是决定基本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因素。^⑦

当然，要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从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归根结蒂是由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决定的，这比较容易。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我的主张，并没有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命题失去有效性。通过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中必须包含国家的政治规定这件事情，我所要指出的仅仅是：在社会主义下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不理解这种真正辩证法的统一的性质，就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体制中所看到的种种过程，特别是——而这是经济学家所直接关心的——经济过程做出较深入的分析。

社会所有制的性质 作为一个过程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不可分离，当我们深入探讨“社会所有制”这个用语时就变得十分清楚了。

所谓所有制，意味着所有制的对象由所有者为了他的利益（广义的）而加以处置。因此，要使所有制是社会的，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标准：即对所有制的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并且，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

第一个标准不是足够了吗？家长制的体制——关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方法的决定、没有社会的参预而由少数先锋队来实现群众利益的家长制体制——是不可想象的吗？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时，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是“否”定的。如果没有民主机制的活跃和扩大——通过它使社会参预国家的统治（即参预决定如何分配资源）成为可能——则社会主义社会离它的起点即革命的开端越远，决定什么是社会利益，什么不是社会利益就变得越困难。资源总是有限度的，

而竞争的目标（单个地来看，其中没有一个乍看起来是反对社会利益的）是非常之多的。在这些可供选择的办法中间进行选择，按照规模、时间等等来决定它们的顺序，这件事情除非有一个在核实和控制中有利于发挥社会的积极性的适当机制，否则就很有可能导致任意武断。这又可能导致如下情况：

1. 客观的错误，即同社会利益不一致的决定。

2. 即使社会利益是实现了，但关于实现的方式却带来了不合需要的主观结果。

因此，这就有了相信两个标准不可分离的更多的理由。从而，在没有把两个标准统一加以运用的情况下，在克服劳动者同劳动手段和劳动目的的异化上，不能期待任何进步。而克服异化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是实际发展到“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③那末，它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发展的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同意这样的命题，即建立在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会带来上述两个标准的实现，以及这个事实在人们意识当中相应的反映，那末尽管仅仅根据这个理由（例如除掉象物质技术基础问题等其他问题），为了首尾一贯，我们就必须承认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次就能完成的行为。因为很清楚，决定所有制的社会性的这两个标准，都不是可以一举而完全实现的。革命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无疑是克服异化进程的决定性的步骤。但是，尽管如此，那仅仅是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社会对国有化生产资料的利用方式越来越全面的影响力在其中起基本作用的那样一种过程——的最初一步，而不是最后的

一步。

作为一个过程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个概念，也包含着这一过程不能被理解为会自动走向特定方向的意思。如同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倒退。我们所加工的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提供构成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不可分的一部分思想，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思想的合理解释。^④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我们通常停留在这样的主张上，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英文版作“生产资料”——中译者）的扩大再生产在于国家所有制的（或者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的）范围的扩大，在于它的特殊比重的增加。但是，这有些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不仅在于国家所有制的范围（无论如何这是有绝对限度的）的扩大，而且也在于首先是它的社会性的深化，这是和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整体有关的发展。

否定社会化是一个过程的两种议论

社会化是一个过程这个命题，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的某些要素，在列宁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就在剥夺资本家所有制及其真正的社会化之间做了区别。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的开头，这个问题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屡次出现，只是后来——如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才销声匿迹。最近，在波兰的文献中，作为一个过程的社会化的思想，虽然主要是在哲学和社会学联系异化论中再次出现，同样也在同经济学的关系中涌现出来。

但是很明显，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过程的分析，还处于开始起步的阶段。那种否认社会化是一个过程的观点之所以

顽强地留存下来，原因之一——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在这里。可以把那些观点归结为基于互相对立的前提，导致极端不同的结论的两种议论。

第一种议论，在于把目前条件下的国家所有制基本上当作社会所有制的成熟形态来对待。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从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是资本家所有制的对立物这个正确的信念出发，强调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是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中产生的这个事实。这种议论基本上持这样的观点，即社会化问题是用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组织来解决的。他们对于实现社会利益和对经济决策行使社会影响力所必需的政治形态问题，或者完全忽视，或者认为根据定义，当然是由政治制度的现存体制来加以处理的。他们把发展仅仅理解为所有制形式的进化（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所有制的接近，国家所有制的组织中的变化，等等）。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一旦达到，也就完结了的这种议论，是一种生产关系物神化。这种物神化，当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的体制，周期性的进行尖锐批判时，才会显露出来。到目前为止，这种批判总是在事后，在政治结构的最上层发生某种重大变化之后才进行。在这种时候，否认——或者看不到——推进社会化过程的客观必要性的令人不快的结果，就会变得非常明显。这些结果在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在经济领域里最为强烈——都可以感觉得到。特别是采取一方面是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另一方面是参与生产资料利用之间的结合是不够的这种感情而出现。这些现象太明显了，以致不能忽略。然而，即使是经过了探讨，也一再被说成是它们是主观上的错误，是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的残余。这种解释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那些令人失望的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减少，因此对于尽管有完全新的社会组织而仍然发生的这种社会经济冲突的不断再出现，没有必要提供解决对策。这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议论，正如《圣经》中的耶和华神对待摩西一样——摩西受耶和华之命在荒野中徬徨了四十年，结果“从奴隶的家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曾经来到约定的土地（根据《旧约全书》中的《出埃及记》所做的比喻——日译者）。不过，圣经的例子是否确切，是可疑的，因为，一部分人顽固地称之为“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其中很多都是现在的社会经验的结果。不仅如此，这种令人失望的现象，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我想出现这种危险的原因有两个：

1. 以舆论所给予的一定的信任为基础的、行政压力和政治号召的结合，只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在长时期中，就有必要树立对于劳动和国有化生产资料的持续的系统的并且积极的态度；就会日益强烈地感觉到，在建立真正参预经济管理的意识上的进步是不充分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发生社会冲突的新的机会。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之后，立即会发生广泛而又迅速的结构变动。新的社会结构还是不稳定的，社会的变动性——主要是由于人们从迄今为止被压迫的阶级和阶层中大大解放出来——是很大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新的社会分化和阶层化会开始固定下来，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刺激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开始威胁我们所叫做的“机会均等”。在这种情况下，自觉的和广泛的参预经济计划的制定——包括对它的社会结果的探讨——的必要性，围绕种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彻底的公开讨论的必要性，会变得特别紧迫。如果这种必要得不到满足，那末社会广大群众特别是工

人阶级，不仅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水平，反而会丧失理解困难的真正原因的能力，趋向把失败的责任不是归之于制度的职能工具的不完备，而是归之于制度本身。很清楚，这会引引起一个渐进的过程，削弱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意识。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作为一个过程的社会化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闭眼不看它的危险。

第二种反对承认作为一个过程的社会化的议论，在于否认现存国家所有制的制度显示了社会所有制的某些特征。为了支持这种议论，他们引证了那些最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的不完全性的、社会经济现实当中的种种要素（从短期或长期来看，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缺少充分发展的政治体制来保证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利用方式的真正影响，而是存在着用社会名义来利用生产资料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国家机构；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比合理的刺激体制所需要的更大的或多或少被伪装了的特权；等等）。因此，同第一种议论一样，第二种观点与其说是基于对现实的伪造（虽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如说是根据断片的、片面的理解，排除了其他所有侧面而仅仅考察一部分侧面，并且是以静态性质的前提和结论为基础的。

否认社会主义各国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最极端的例子，可以在德热拉斯的《新阶级》（1957年，纽约，英文版）一书的思想中找到。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各国没有实行任何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仅仅是代替一个剥削阶级，出现了另一个剥削阶级（“中央政治官僚阶层”）。这决不是德热拉斯所独创的，而仅仅是把由于推翻了资本主义并没有一举产生全部建立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上面的新社会，而感到幻灭的革命

运动的参加者过去所公式化了的思想加以重复而已，并且一般地说，重复得很拙劣。尽管如此，并不是没有同德热拉斯的观点共鸣的人，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这一点大概可以表明他们不是完全缺乏根据的。对这种观点的支持，可能部分地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青年们对于现实生活所投给他们的一系列问题找不到满意的回答。“新阶级”的思想恰恰在年轻人——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被培育起来的，并且把社会主义思想当作他们自己的东西来接受——中间找到响应，决不是偶然的。这里存在着的是作为一种对社会主义下生产关系的不适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结果而产生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长期以来，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社会主义被描写成没有冲突的社会。今天，虽然情况有了相当的变化，但是承认冲突的存在，往往照旧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否则就是把它限定在次要问题的范围内。但是，现实提供了非常多的既尖锐又深刻的有关冲突的例子。由于没有其他分析工具，熟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们便常常试图用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建立的范畴，来分析这些冲突。我想这就是否认社会化是一个过程，并且提供一种认为国有化生产资料无非就是“中央政治官僚阶层”——他们被想象为是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去剥削社会——所有制这个幼稚的说明的、考虑不足的观点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原因之一。

这里不是对这种态度进行全面批判的适当场所。但是，我想仅仅指出一点，即如果“新阶级”的概念是应该确实加以接受的，那末这个“中央政治官僚阶层”阶级就可能是历史上最小的剥削阶级，而且是一个在短短几年之间以闪电般速度成长起来的阶级。同时，这个以那样的速度成长起来的小的统治阶级，也就把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集中起来的巨大

生产力，由它来自由支配了。如果我们接受德热拉斯的命题，即这个“新阶级”的目的是自身的物质利益，那末人们就可以预期，这个阶级的成员的收入，将是异乎寻常的高水平，并且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会有一个巨大的收入差别。即使考虑到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所有因素的收入，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过或者没有统治集团的成员获得过多有特权的物质地位。但是，这件事情同“新阶级”——如果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阶级这个词——即利用巨大的生产设备、为它自身的经济利益去占有剩余价值的阶级之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这个概念，它本身或者作为非常一般的一种假说，在科学上都是贫瘠不毛的。这个概念没有给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过程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因为：

1.它是违反历史的——它完全忽视了一方面是体制的起源、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前提条件以及使它们产生的动力，同另一方面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

2.它是主观主义的——完全没有试图举出昨天的革命家转变为今天的剥削者的客观原因，同样也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根据——除了信念以外——来证明一切冲突都可以通过打倒“新阶级”得到解决的、这种投机的见解是正确的。

因此，否认社会化是一个过程的第一种议论，不外是把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统治物神化了。这样他们就看不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不仅取决于物质基础的创造，也取决于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必要的、社会的政治的种种因素的发展，这种困难而又复杂的——并且可能是首要的——任务。

反对把社会化看作是一个过程的第二种议论，他们忽略了这种事实，即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结构的革命的变革，原则上是要为社会化创造客观的前提条件并使之发生质的变化。所有制的完全社会化和异化的克服，不是通过“第二次社会经济革命”达到的，而是将通过努力使已经发生的革命进一步发展来达到。

很难承认这些概念中的任何一个，能有助于提供一个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社会所有制的较为深刻的分析。

社会化过程中的困难的客观性

到这里为止，我们的议论有助于表明所有制的社会化是不能一举完成的，并且也不是单纯的时间的经过函数。这个领域中的进步，需要克服整个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客观地产生着，尽管在某些国家（因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缺乏民主的传统，等等）中，这些困难可能构成所有制社会化的特别难于克服的障碍。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正确理解，必须是从承认这种障碍的客观性出发，来研究它们，说明排除障碍的方法。

这种理解的萌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找到。最早的一次尝试是，由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中所收的论文做了概略的叙述。罗莎·卢森堡与“新阶级”的理论家们不同。她没有认为推动进行统治的上层人物的动机是利己主义，或者他们的目的是为他们自身去占有社会的剩余价值。相反，她承认客观地推动着政治领袖们的是几乎无限的利他主义和伟大理想。不过，尽管她立足于这种正确的假说，但她并没有排除在进行统治的上层人物的这种活动，同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之间发生分歧的可能性。她看到了，

如果不同创立特定的政府和经济机构的客观必然过程相并行地、为了扩大社会的真正参预处理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结果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有效的斗争，那就有发生官僚主义和深刻的社会冲突并削弱革命动力的现实危险。

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列宁没有把这些看作是如此重要的问题。这个事实可以用革命成果的性质和伟大变革时代所特有的自发的民主精神的普及来说明。但是，如同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的论文和笔记中所清楚表明的，仅仅在相对稳定的一个短时期内，列宁就明白地察觉到官僚主义的危险。虽然在这些著作里找不到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会给每个人以很深的印象，即列宁关于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成功发展所需要的是人民群众全面参预国家的管理这种认识正在高涨。如果有可以叫作列宁遗嘱的东西，那它应该在这些与逝世很接近、仓促写成的论文和笔记——列宁在其中强调了同官僚主义的客观威胁作斗争的必要性，对政府机构的异化，它从人民的工具转化为站在人民之上的权力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当中去寻找。

在经过了一个时代的今天，我们的经验远比过去更为丰富了。现在，我们理解如下一点，是更加容易了，即经济管理机构的庞大（普通意义上的官僚主义化），不仅是由于没有能力的结果——何况主要的决不是那样——而且也是由于生产力的现代组织的特殊结果，就是说也是为了控制迄今曾是自发的种种过程，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种认为由于经济管理将变得极为简单，以致没有固定的分工也可能进行直接管理的预言，没有实现。相反，管理的机制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经济生活的各种部门中，专家的重要性提高了。和社会分工中的地位相联系的收入差别以及上层的政治机构

和经济机构的合并，产生了社会对于经济决策施加有效影响以及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同等对待的进展。所有这些，按照定义来说，当然不能认为是有了保障的这样一种状况。

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在我们的用词法的含义上——遇到客观困难这个事实，并不使社会主义革命为克服异化创造前提条件的命题失效。它所否定的只是我们已经多次批判的、认为在这个方向上的进步是自动的那种观点的正确性。对于障碍必须有效地加以反对，而反掉障碍的主要手段之一，无疑是应该到政治体制的适当发展中去发现。如果不采取某种行动，则社会化过程将要缓慢下来，或者停滞不前，或者甚至倒退。在经济领域里，这种情况将会在表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素没有被完全利用的种种形态上反映出来。不仅如此，从这里所产生的损失，又将影响到国民收入的增长。然后还要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感发生有害的影响，并且也对形成管理国有化生产资料的集体观念（attitude）发生有害影响。这样，我们就可能面对一种逐渐积累起来的恶化局面。

要从所有这一切中引出积极的结论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总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必须在这种方向上求得发展，即不断地现实地去扩大社会对于一切级别上的政治、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并且发展一切生活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社会自治。作为一种同社会异化了的强制机构的国家将逐渐消亡的这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其根本意义就在这里。⑩

这种思想，依我看，是从如下分析中，即从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与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民主化发展之间的联系的

分析中，始终如一地产生的。这个概念显然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概念。要研究上述进化的种种具体阶段，就需要利用从社会科学的一切部门（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汲取来的种种技术和方法。

我想，为使这种研究能够成功地进行，它应采取的一般方向，可以通过列举或多或少决定应该走的道路的一系列因素，更明确地加以规定。

我认为，这些因素的第一个，是对问题本身的意义做出适当的评价。很明显，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否认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的必要。可是，这种主张除非伴随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批判性评价，否则就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政治体制不应物神化，不能允许它停留在宗教的禁忌上——一旦专家们的探讨有超出形式的注释学范围的危险时，便不允许探讨；而且必须允许那些比关心自己的私事更加关心的普通的凡人们去讨论它。为了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作为国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社会权利，有必要承认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定形式的适用是有限度的。即使那些形式在一定时期里恰恰由于它们是例外的而曾经是必要的。尤里安·霍赫费尔德 (Julian Hochfeld) 在关于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俄国的革命》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布尔什维克曾经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们如果想要抢在反革命的前面行动，那末他们只有为权力而战斗并掌握权力”。^④ 十月革命孤立的责任，正象罗莎·卢森堡所强调的那样，不在于布尔什维克，而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者。罗莎指出，在那种条件下，要求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象使用魔术那样来建立美好的民主，典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把非做不可的事情当成功绩，试图

从由于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术成果中创造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把这种体系当作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神圣原理出示给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运动时，那危险就开始了。因此，在我们能够做出某种进步以前，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前提要抛开对于现有事态的满足，不仅已经积累起来的现实成果是大量的，而且在我们现在开始踏上的道路上也有着为数庞大的、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正确地反击了那种作为革命的社会变革的代替物而把政治民主加以物神化的企图。但是，这件事情并不能证明在革命结束后，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扎了根的时候，忽视政治民主是正当的。

第二个任务将是关于经济的运行模式中的变化对政治和经济民主化所起的作用进行全面评价。从“分权模式”所带来的变化产生的、企业或地方管理单位的独立性的增加，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些变化为经济基层中工人自治的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并且一般说来，如同经验告诉我们的，使专用于“事物的管理”——可以很容易导致对人的无情管理的“事物的管理”——的权力集中减少。尽管如此，在正确评价这种发展的潜在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铭记：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并且这不会自动地保证社会化过程所需要的速度和规模。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模式，在部分的最优（optima）必须从属于经济整体的最优的计划经济中，个别企业和地区的行动必须由经济整体的情况来决定，必须从属于宏观经济的决策。如果生产资料使用的民主化只限于企业或地方管理单位，那是不够的。甚至，用这种办法限制民主化，从长远来看，会导致特定集团的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激化。

因此，经济管理的分权模式的种种要求的实现，为了无

论从纯经济观点或社会的经济观点来看都是有效的，就需要社会对总的决策具有真正的影响力。社会必须能够对关于种种基本问题——宏观经济水平上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以及特别是长期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它们的社会结果等——的选择施加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必须事先准备好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的扩大和加深会带来一切困难。例如，如果积累（英文版作“投资”——中译者）与消费的分配、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的分配、收入差别等等问题的讨论被公开了，那末就有可能在围绕这种讨论的种种意见对立中，产生要求果断行动的情况。独断独行的决策并非没有它的优点。但是一般说来，那仅仅是短时期的优点，从长期来看，它会带来很大的不利之处。斯塔尼斯劳·欧苏斯基（Stanislaw Ossowski）——社会学家，也是社会思想家——在他的《社会科学的特质》^④一书中把社会秩序（social order）进行了分类，他认为最好的是“以合理的计划来调和社会生活的多中心主义的性质为目的的……社会秩序的概念”，因为“应该解决的是，单一的中央领导（authority）的有效性^⑤与多中心主义的人的价值之间的冲突”。我虽然赞成这个意见，但我认为需要补充指出一点，即尽管有一切短期的困难，但从长期看来，在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人性化（humanization），另一方面是经济的进步，二者处于互相依存关系中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冲突是不应有的。

在这篇论文中，只是初步概述了社会主义下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没有试图使它体系化，并且我所采取的讨论方式可能会引起各方面的议论和反驳。但是，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说，如果没有批判地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适用于社会主义体制，那末希望运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纲领也是无益的。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即使在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的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力量，尽管要从这种规律为人们自身的社会引出教训，通常是困难的，但为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这样做。

（此文最早发表于《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期，1966年，罗马）

注 释

①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1972年，伦敦和波士顿。

② “社会消费”指以教育、社会服务、年金等形式，由国家提供给全体居民的商品和劳务的消费。

③ 奥斯卡·兰格《政治经济学》，1963年，牛津，第1卷第72页。顺便应该指出，作为决定生产关系的其他一切侧面的基本范畴的所有制概念，也常常成为提倡所谓所有制的职能概念的那些人们的批判对象。根据这种观点，所有制不是一个单独的、基本的范畴，而是分配、协作、各个社会阶级和集团的相对地位等等关系的总体的表现。参考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Šik）的著作《经济、利益、政策》，1962年，布拉格。该书1964年在莫斯科出俄文版，1966年在柏林出德文版。

④ 参见Z·鲍曼（Zygmunt Bauman）著《社会学概论》，1962年，华沙，第184页。又参见M·希尔斯佐维茨（Maria Hirssovicz）著《社会学的对抗》，1964年，华沙，第四章。

⑤ 奥斯卡·兰格《政治经济学》，第30页。

⑥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七版，1957年，伦敦。在这里，没有全面分析他的观点的余地。但是熊彼特（他是关于广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少数理论家之一）持这样的观点，即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特征。他的概念，虽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所能接受的思想，但特别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各国经验来看，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⑦ 为了强调关于从社会主义下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所产生的变化的我的论点，我有意略去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有的方式和形式的议论。

⑧ 《资本论》中文本第1卷第95页——中译者。

⑨ “不仅生产过程的对象的种种条件表现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这种种条件所特有的社会的性质也是一样。生产当事人相互间的社会关系，从而

他们的社会地位——即生产关系本身被生产着，它们都是这个过程不断更新的结果。”（参见田光译《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4页。）

⑩ “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1页。

⑪ 《从被忘记了的争论说起》，载《坦率》杂志，华沙，1957年第2期。

⑫ 《社会科学的特质》，华沙，1962年。

第八章

矛盾和它的解决方向

自从“波兰十二月事件”问题不再占据国际新闻报道的第一版以来，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但是，如果应该从波兰最近的一些事件中学习的重要教训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再为人所知或者被遗忘了，对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来说，那将是有害的。这个危险不单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冲击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消失这种冷酷而又普遍的规律，并且也是由于想把事情——对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各国共产党来说是令人不快的、困难的那些事情（波兰的事件是两者兼而有之）——忘掉的那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因此，我们仍然必须试图用一种坦率的方式来分析这些事件，因为已经摆脱了当时那种激动情绪的影响，这种分析不能不更加深入、大胆。

工人阶级示威运动的意义

1970年12月波兰事件的本质的、长期的意义，是由一些简单事实产生的。

1. 示威运动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因为举行示威的是主要产业的工人。党的前领导和政府硬要坚持他们是流氓坏蛋和反社会分子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从事件发生以来，再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否认示威运动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性质。不仅如

此，从那时以来，再没有人试图把事件同国内或国外敌对分子中心的活动连在一起，也没有任何深刻的修正主义攻击。暂且撇开1970年十二月事件的一般背景不谈，虽然运动本身（不顾当时的情况）显示了迅速和有效的组织力的非凡能力——这是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最好传统相称的能力——但是，可以说运动的自发性性质是公认的。

2. 工人的示威运动和流血悲剧的直接结果，是国家更换了政治领导。哥穆尔卡及其最亲密的同事们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正是这些政治家们，对过去十五年左右的国家政治负有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象征着这个时期的一些人。

3. 作为十二月的示威运动和其后几个月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取消了涨价——虽然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企图证明涨价是正当的。放弃了以所谓经济刺激制度为借口而采取的冻结工资薪俸的政策，并且为了在1971年经济计划中把消费品的增加考虑进去而进行了根本性的变更，等等。

总起来看，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折磨着波兰的社会对立和矛盾的深度和广度。它已经不再是在抽象意义上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存在矛盾的理论问题，而是这种矛盾的具体的、可以触摸得到的结构问题，即提供不可避免的若干一般结论的那种结构问题。不仅如此，如果马克思主义方法可以有效地运用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分析，那末从波兰事件中引出来的结论，就决不能当作仅仅是和个人崇拜或一时过错有关的东西把它打发掉。它证明：即使怀着最大的善意，仅仅是谴责和弹劾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和歪曲”是不够的，或者即使是进行了变革，如果这些变革只是表面的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或者不能为连续的调整过程创造条件，那也是不够的。1970年12月不得不放弃掌握政权的政治家们，

他们在纳粹占领波兰期间，都是在共产党的抵抗运动中积极活动过的人。其中三个人——哥穆尔卡（Gomulka）、克利什科（Kliszko）、特别是斯彼哈尔斯基（Spychalski）——在斯大林时代还受过迫害。1956年10月，以“不许重演波兹南悲剧”为口号，哥穆尔卡象凯旋将军一样回到了政治舞台，如果人们记得他在掌权十五年之后的不光彩引退，是再一次在来自工人的更加强大的压力之下，而且是以较多的牺牲者为代价进行的，那末现在想起来几乎好象是古典悲剧或者是象征性的事件一样。尽管毫无疑问哥穆尔卡是希望避免重复波兹南的经验的，并且人们也确信他为此而竭尽了全力，不过车轮还是完全倒转了。

结论是如此明显的，以至没有必要特别提出来。在现在的波兰统治体制（不能认为它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似乎有实质上的不同）中，一定有妨碍了解决社会和经济矛盾的种种因素。正相反，这些因素被掩盖起来，因此它们最后才以更大的威力爆发出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悲剧性事件的原因和波兰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某些杰出人物自相矛盾的命运，只能用这种思想方法来对自己和对别人进行说明。

确定危机原因的一个尝试

为什么这些被压制住的矛盾会发展到爆发的地步，对这个问题的详尽回答，无疑需要进行许多分析。并且进行可靠研究的环境越是自由，得出来的分析就越有效——正统派的思考和说明的体系将不再有用。以下的尝试，从它的性质来说，是有讨论余地的。

1970年12月波兰工人示威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困难和想要用牺牲无产阶级来克服困难的企图。但是，这些经济

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并且不选择其他克服困难的手段而积极地选择了这种方法的理由是什么？

笔者认为困难的基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不应该把这个主张看作是令人奇怪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大部分生产资料国有化了，国家以中央经济计划为基础控制着整个经济——中，政治权力的体系和统治方法成了生产关系网络的不可分的并且可能是中心的特征。不分析这些特征以及工人阶级实际上参加行使权力的程度，是不可能给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真实性质下定义的，而且决定每一种体系的生产关系的性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只能预期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即通过揭露和克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生产关系的性质之间的矛盾而发展的规律——应该表现在经济的要求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上面。要检验这个理论，似乎并不那样困难。让我们只限于谈谈过去几年波兰的经验吧。

众所周知，现代的决策理论极为重视迅速、自由，并且——这是最重要的——使情报的流动（flow）尽可能没有被歪曲的、前提条件的存在。决策的重要性和它的结果的影响越大，这件事情就越重要。从这个观点来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70年12月恰恰是圣诞节以前决定提高食品价格时，它所能够利用的情报的范围有限和歪曲的程度实在惊人。从十二月事件后所发表的公告来判断，党的领导不仅对经济形势缺乏了解，而且对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以及党和政府的上层中的当时的政治见解也是不清楚的。暴露了对决策负有责任的那些人没有跟上现实的形势。从十二月事件后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很清楚，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政府和工会的干部，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对于正在准备中的行动是

采取严格批判的——一部分人是戏剧性地表态。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证明为了收回决策进行过任何尝试，也没有证据证明进行过任何有力的反对。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地去反对而要对政治家们做出个人评价或做出判断的问题。问题在于不向上级报告真实情况，而提供同上级的观点——不管是明白表示的也好或推测的也好——相一致的那种情报的这件事情已经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体制。

在波兰，1970年12月所发生的情报流动的全面封锁——对局外人来说更加不能理解——是多年来正在发生的事情达到了顶点。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经验不可避免地教给人们，服从党的路线——不顾现实的社会结果——会得到利益，而批评党的路线则会给个人带来麻烦。就经济领域来看，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是，要把1966—1970年的五年经济计划方案——它的执行带来了特别是1970年12月的悲剧结果——付诸讨论的尝试流产了。计划所包含的概念——在有关农业政策特别是农产品对外贸易这个限度内——由于担心有可能降低肉食生产从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引起了某些经济学家的重大关心和反对。这是在1964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四次大会前正式发表的公开讨论期间发生的。有人做了公开表示保留意见的尝试——没有任何一点是关系到根本的社会主义原理的，而全部是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具体解答。一位最知名的、在国际上受尊敬的波兰经济学家（指卡莱茨基——日译者）用论文发表了他的意见；并且他没有停留在只是批评上，而是更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党的领导立即对他采取了异常激烈的行动。所有实际上的讨论尝试马上都被压垮了，而且党在任何时候（包括大会）甚至连探讨已经提出的代替方案的可能性都不考虑。在这个经验之后，有主见

的经济评价或分析的余地的任何希望都不存在了。

在某种意义上，过去十五年波兰实行经济改革的尝试总是流产的全部历史，可以作为现存政治体制对经济过程发生破坏作用的一个实例。当然，不能说可以把经济改革看作是一切经济困难的万灵药；但是，即使在这种范围以内来实行经济改革，无疑也将是很有好处的。对于象波兰这样一个首先必须依靠内涵的发展源泉——生产率的提高，“产品构成”类型对于需要的适应，资源的更有效的利用，投资过程的改进，等等——的国家来说，这件事情就更加适用了。波兰是最早制订出进步的经济改革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因为在1956年十月事件后不久就迈出了实行经济改革的第一步。这些改革方案得到了最高政治当局的承认，他们——在他们所发表的纲领中——反复声称想要实行那些改革方案的愿望。但是，事实仍然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原因主要是害怕改革有可能对专制政治和最高当局的专横施加某些限制。要使经济制度中的变化同工人自治的成长相互联系起来的尝试招致了特别的冷遇。“波兰的十月”期间在工厂里自发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变为差不多是纯粹形式上的作用，完全丧失了它作为经济管理中工人的真正代表机构的特征。197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前领导为了掩盖目的在于事实上冻结工资和薪俸最少达二年之久的严酷通货紧缩政策，曾经想要利用改革的思想。应该在1971年初生效的——1970年12月20日后取消了的——所谓经济刺激的新制度，因此，仅仅是在舆论面前使经济改革的思想丧失信用方面取得了成功而已。

上面的举例都是直接间接和1970年12月以前几个月的事件的经济原因问题有联系的。但是，它们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它们清楚地表明错误的政治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

关系所发生的阻碍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所谓情报革命的时代，要建立一种广义上的包罗万象的情报体系，不仅需要现代技术，而且也需要有充分的政治条件，这点是值得铭记的。

工人的示威运动与知识分子的状况

经济发展的要求与不适当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性质的，它只能通过体制的调整和民主化来解决。因此，涉及1968年三月事件，将有助于理解1970年的十二月事件。

但是第一，我想告诫读者，不要在西方和波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的示威运动之间去寻找表面上的类似，因为这种类似是不存在的。波兰和西方的示威运动的原因，来源于占优势的特有条件，从而不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在1968年的波兰，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议，是他们对政治体制发展过程的自我阻碍（self-retarding）性质提高了一种自觉的表现。他们把这种过程看作是同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上述社会、经济发展的十足实用主义要求都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抗议的核心问题是这样的一些要求：重建根本的市民自由以及（这是最重要的）抛弃歪曲和隐瞒情报的惯例。同时很明显，不存在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问题。相反地，其意图是从政治的落后性所必然要带来的骚动中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1968年3月的学生们的口号“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表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基本联系。1970年12月，提供了这件事情很紧迫的证据，虽然是用一种使人极为痛苦的方式。

当时的波兰领导人用带来最不幸结果的决定做了回答。

他们决定利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示威运动，一劳永逸地消灭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不受约束的批评的一切根源。如同在这种情况下所常常发生的那样，他们显然相信，麻烦不产生于现实的矛盾，而不如说产生于（尽管是最少的）想把不加掩饰的真相大声讲出来的那种企图。

这项策划是使用广泛的手段进行的，即从异常野蛮的和高压的警察措施，到利用对宣传工具（报纸、广播、电视等）的垄断完全歪曲学生和知识分子示威运动的真实性质和意图。在这里，我不打算对当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但是必须指出，当时的意识形态运动的调子，无论从它的规模之大或者从它的公开程度来说，即使在斯大林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也都是前所未闻的（在这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所谓反犹太人的运动，这在波兰一般是这样解释的，即它是有意地指向比较少数政治上积极的犹太血统的波兰人的）。其结果，他们不仅在把所有被直接指控对批判现状负有罪责的人从公共场所赶走方面成功了，而且在恫吓一切知识分子团体方面也成功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个意识形态的镇压运动，他们甚至在工人阶级和大声抗议的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中间打进楔子方面也成功了。

从随后所发生的事件来看，在1970年12月知识分子——并且特别是他们的正式代表——在最戏剧性的时刻都保持了沉默这一点上，也许可以说他们在获得符合他们所希望的结果方面又成功了。但愿这种事实不是似乎注定要构成社会主义光辉遗产的一部分。不过另一个事实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即如同今天普遍和正式承认的那样，尽管政策上的决定常常是不正确的、专横的，但自从1968年3月以后，完全听不到对当时国家领导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的指责和批评

的声音了。这种缺乏批评同错误的、专横的决策的程度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1968年12月所采取的措施的成功，给了策划那些措施并从中得到好处的人们有了独断独行地行动的绝对自由的一种感觉，结果终于导致了1970年十二月事件。1968年3月同1970年12月之间的真正联系就在这里。这种联系——即使是否定的——可以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质的典型例子：即在沒有有效地克服原因的情况下去抑制矛盾的表面表现，它本身就创造了更尖锐的矛盾源泉，并且只能增加被延缓了的爆发力的范围和危险的结果。实际上，从社会和政治的危险这个观点来看，1968年3月的青年学生、少数作家和学者的示威运动，同1970年12月一系列重要的波兰经济中心的大规模工业无产者的示威运动相比，究竟算得了什么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这个教训的意义，确实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评价过高的。

常常有人企图否认在最近的种种事件发展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且简单地把工人的要求说成明显地是纯经济性的。这个推论看来不能证明是正确的。第一，即使工人的要求是纯经济性的，产生引起示威运动的那种局面的，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一理论依然是没有争论余地的。第二，工人的要求，虽然他们没有采取充分的、一般的表现形式，但直接或间接都是和重要的政治问题有关的（我认为，这是由于工人和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之间的缺乏合作；尽管另一方面，在现实形势当中，这个事实是否没有带来有利的结果，是不能不使人怀疑的）。作为要求首先提出的是：工业内部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党的组织在内，改变某些组织的选举的性质，工会的真正自主性和对工会的新的认识，公布没有歪曲的情报，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斗

争，取消随地位而来的特权（非公开组织的那种类型），等等。在经济领域中，有相当多的要求是提高企业的自主性。这些要求，有两层重要意义：作为更广泛更有效的利用生产能力的基础，以及作为真正（不是虚假的）工人自治的基础。如果仔细地探讨这些要求，人们就不能回避它的巨大政治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正是波兰工人阶级——在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在关于提出它的要求的程度和方法所表现出的卓越的现实感上——证明了它自己的成熟性。

从经验中来全面学习

如果正确地来解释，那末工人示威运动导致了波兰政治领导的更换这个事实，是有它本身的价值。问题在于，必须把政治家们的更换看作是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终结，是当时机成熟了的时候为解决矛盾开辟了可能性，而不是解决本身。现时的政府所即时采取的一系列对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似乎是在向正确方向上移动。但是，很明显，要医治根本原因（而不是医治症状），是一个长时期的行动问题，而不是眼前的行动问题。关于将把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性的、广泛而又有胆量的纲领的那些要素，这里不是详细分析它们的适当场所。那样一种纲领，相反地是作为对危机的原因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结果来制订的。

为了制订出适当的纲领，当然必须考虑到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的性格，他们对事件的原因理解到什么程度，以及他们对于实行必要的改革有多大程度的准备和决心。但是，不要抱幻想。要把改革付诸实行，与其说用适合现在的政治形势的方式来行动，即与其说保证工人更广泛地参加主要问题——现

在的和将来的——的解决，倒不如说将会引起那些习惯于用压制方式来行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消除近几年来使得对有关整个社会的、并且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应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采取批判态度和自由地表明批判态度成为不可能的一切障碍，之所以非常重要，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否则，人们将会继续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不可能对以他们的名义所做出的决策发挥影响。

从1970年12月的经验和事后一个时期所引出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是理解即使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也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在能动的社会过程中进行的。并且，其结果与其说取决于个人的善意（尽管象前面已经强调过的，这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侧面），不如说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适当平衡。波兰的社会压力——我们已经说过，首先是由工人阶级所施加的压力——的重要性，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判断。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现象，看做是应该付出一切代价、用一切手段加以消除的可悲的现象，并且已经习惯于认为，如果不可能消除原因，至少也要消除后果，把它们尽可能深深地埋葬起来。我想现在是结束基本上仅仅是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智慧缺乏信任的那种气量狭窄的态度的时候了。这些态度表明一种观点，即实际上对工人阶级否认教科书里所断言的先锋队的政治作用。在1970年12月的示威运动中，波兰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积极的例子，即不仅在例外的情况下而且要在平日，通过对统治者施加强有力的、坚定的压力，它正在发挥并且必须发挥的作用。只有这样，那些确实想要采取真正改革的党内势力，才会赢得设计和实行符合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可能性的行动计划所必要的社会支持。没有必要再去强调，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用不仅不排除来自其他社会集团，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而且相反，是以这种支持为先决条件的。

最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从波兰事件引出的结论，讲几点意见。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是这样：即非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态负有责任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着、或者不如说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活动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负有进行独立分析的义务。这就把他们应该在这种联系中承担积极作用的政治需要加给了他们。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经验引出来的多方面的结论，将有助于他们制订他们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战略、自己的社会主义观，从这点来说，这件事情似乎越来越必要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具有批判社会主义世界的垄断权的说法，是既不正确也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由于种种情况的力量——有偏见地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经验的批判性的——但却是共产主义式的——分析，要放弃那种只求阿谀奉迎的分析这一点，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最初刊载于《再生》（意大利共产党刊物），
罗马，1971年第6期〕

第九章

波兰的物价问题和政治

1976年6月在波兰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件，似乎在西欧的报纸上广泛地引起了人们对于1970年十二月事件——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使哥穆尔卡体制垮台——的回忆。《世界报》还进一步向后回溯，指出新的价格在1976年6月28日，也就是在波兹南暴动二十周年纪念日开始实行这种象征性的一致。

不管这种历史的类推是如何吸引人，但那特别在经济的联系上是不能完全同意的。1970年的物价上涨，是在差不多长达十年之久实际工资事实上停滞未动（即使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也如此），而名义工资又被严格控制了五年的刺激制度之后实施的。这种在圣诞节前夕来提高物价，完全是出自领导者们的骄傲自满和盲目状态的一种行为，它起了给积累起来的火药点火的雷管作用。1976年的情况与此相反，物价的上涨带来了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即使是没有官方所声称的那样大），并且是在投资显著增加了五年之后实行的。在波兰，消费和投资这两条战线至今没有看到过的巨大进步，尽管它大部分都是用外国借款^①来维持的，但这并不能降低物质进步的好评。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应该强调政府的诚实，并且应该对政府关于要理解评价不高的措施的呼吁给予支持。其次，政府（这里所说的是实质上的政府即党

的领导) 不仅就时期的选择这个因素(不是圣诞节而是仲夏), 并且也从1970年事件吸取了其他教训。就是说, 早在六个月以前就预告了提高物价的意图, 在预定涨价的几周以前就进行关于价格的政治宣传运动, 对这一措施做了经济上的说明(从价格体系的紊乱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愈来愈大这点来看, 采取这一措施本身并不是多么困难的)。最后并且也是同样重要的, 还选择了补偿的办法, 而这又比注定要降低一部分工业品价格更容易被接受。那就是, 这次可以依靠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家属补助费。

对所有这些措施和准备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不是本文的目的。不过我只是想强调一点, 同1956年相比当然不要说了, 同1970年相比也有很大区别。尽管如此, 政府的政策却和1970年一样遭到了断然拒绝, 从而不得不退了回去。乍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 尽管这次没有发生直接的戏剧性结果(领导的下台——日译者), 但是从围绕事件的情况的不同来看, 我认为政府的政治失败的深刻程度似乎是这一次更大。虽然有相对成功了的经济政策以及尽了极大努力想使党的领导特别是爱德华·盖莱克给人以新的印象(这种努力一开始似乎是很吸引人的), 但是, 整个政治基础的薄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也许有人要反驳说, 公然的拒绝行动是由象牛肉几乎上涨70%、白糖上涨100%这种非常高的上涨率引起的。但那是无可奈何的错误, 而且是政治上无可奈何的错误。使食品价格不可避免地提高的相对价格的变更, 已经长期地失去了时机, 之所以延缓下来, 是由缺乏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力决定的, 也就是由缺乏来自群众的真正支持决定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种官方的美妙说明相

反，实际上（这种信任）只不过是通過一定的容忍、而且主要是通过一定的物质上的让步收买来的而已，冻结物价就曾经是这种让步的重要因素。显然，愈是延期提价，则改订价格的幅度也就愈大，尽管如此，无论断然地实行提价是如何有诱惑力的，这不等于说实行提价的方法只有一个。

这里，我们碰到了根本问题。就是说，为采取合理的经济措施创造政治上的前提条件，为了正确地观测这种行动的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归结，政府必须能够从正面来同人民的利益和他们所独立表明的见解进行对证，辨明谁是谁非。如果政府同真正的工会或其他真正有代表性的组织取得了协议，那末在波兰实行不得人心的措施将会是很容易的（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其他东欧国家）。毫无疑问，某种妥协曾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经过某种妥协而达到的意见一致和互相信任，不是远比假的御用工会和议会全场一致通过的支持（它会带来可耻的否定结果）的方法更能使远为更好的解决成为可能吗。对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职能的许多方面，有很多正当的批判，这种制度迫切需要改善，这是事实。然而必须认识的是一——波兰事件曾经是关于这一点的新的有益证明——专制体制在某个一定的时候，就开始丧失曾经被认为是它的最大优点的东西，也就是开始丧失追求始终一贯的政策的能力。

最近几个月，很多波兰知识分子举行了反对修改波兰宪法的抗议，按照他们的意见，这种修改会加强体制的专制性。他们的要求是，¹要使政治民主化，为了承认个人的自由，要采取慎重的方法；但被盖莱克个人严厉地拒绝了²。把这种态度同六月末的事件联系起来，看起来可能是牵强附会的，并且也不会有人认为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但是，毫

无疑问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总的联系，在实践上不想承认这个联系的错误，加强着政治体制的自行崩溃的因素。

这次政府没有调动权力机关，而是急忙地后退了。如果采取另外的行动，那就会重演1970年的流血事件。可是，掩盖事件的经过，公然试图通过众所周知的反对“流氓恶棍”——用这样的语言对工人进行教唆——的斗争来获得舆论的支持，使我们深感不安。这对于为现实的经济困难寻找适当解决不会有任何用处，而无疑地只能妨碍进行根本性的审查研究。如果它不能给政治体制带来根本的变化，那末即使能够勉强把危机堵住了、延缓了、掩盖起来了，这不仅对每个国家乃至人民，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都将作为一个沉重的欠债，不断地反复和表面化。

(《维也纳日记》，1976年第9期，原标题为“波兰的经济和政治”。)

注 释

① 波兰的贸易收支在六十年代是平衡的，在七十年代，赤字不断扩大，1971—1975年期间总计达七十亿美元。这种赤字集中在同西欧各工业国之间的贸易上(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收支事实上是平衡的，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甚至存在若干顺差)。仅1975年同西欧之间的赤字即达二十九亿美元，进口额中只有52%是用出口抵偿的(以上数字全部根据《波兰统计年鉴》1976年版第十三章)。此外，需要补充一下，象波兰这样的国家，和匈牙利不同，即使是发生了“交易条件”的变坏，也是微不足道的。

② 参考爱德华·利匹尼斯基教授的《致爱德华·盖莱克同志的公开信》。

第十章

波兰十月事件发生二十年后

——接受爱扎克·多伊察奖纪念讲演

不管你们怎样想这个讲演的内容，总之，所选择的题目将是适合赞扬爱扎克·多伊察的这个思想的。并且，那不仅是为了无疑在多伊察看来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在波兰的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同波兰革命经常保持了特殊关系——波兰问题方面。这个题目之所以被认为是适当的，首先是因为“波兰的十月”曾经成了目的的原故。那就是，把“未完成的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从一切斯大林主义的歪曲中把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基础洗刷干净，这样来发展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实际掌握在劳动大众手中的那种社会。理所当然，这个概念的生命力问题经常使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实践者的多伊察忧心忡忡，并且也使我们自觉地把这个概念同社会主义观念结合起来的所有的人担心不已。因为遗憾得很，到现在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所说的“波兰的十月”这个概念，很明显，不是指哥穆尔卡重新掌权的1956年10月19日至20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中最高领导人员的人事变动，而是指斯大林死后的几年中不断加强的冲击力量，在1956年达到了顶点的广泛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决不是具有成熟的

纲领和坚定的行动方法、始终是同一性质、可以下严密定义的运动。十月运动是在种种事件的强烈影响下，并且是被打上了缺乏独立的政治活动的正式途径（Channel）烙印的，在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到某个时点为止，无疑包括了不属于运动的主流两个集团。一个是对社会主义感到完全幻灭、在反斯大林主义浪潮中发现可以把社会主义同斯大林主义一道抛掉的可能性的一些人；另一个是，在根本性变化面前后退了，希望首先让风暴刮过去而后回到仅仅消除了极端滥用权力的旧体制去的一些人。尽管性质不同，波兰的十月在它的基本思想上是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这也是同一般关于它所抱的印象相一致的。它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从社会主义除掉政治的全体主义枷锁和腐败的特权，把社会主义从外国支配的烙印、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主义和强制集体化下面解放出来。以前的作法被有力地拒绝了，那不仅是因为它同以真正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人们的社会主义展望相矛盾，而且因为它伴随着只有通过居民极为穷困这种高昂的牺牲才能使迅速的经济成长成为可能这种日益严重的经济弊病。其目的不仅是国家体制的民主化——严格维护市民权利，政治的多数主义（这当然不能限于党内的多数主义）——而且在劳动世界也要实现制度民主化。这里，作为代表机构的工人委员会和工会的任务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经济改革的纲领，我想也是和政治改革的纲领相一致的。就是说，用我自己的用语来说，就是导入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我想这样的计划经济可以为宏观经济的计划化提供有效的基础，同时又可以为工人委员会的真正参预经济决策提供充分的余地。

即使不想去弄清楚这些目的实际上的价值，十月运动已

经打破了东欧社会主义的框框——不仅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存在了的形态上，而且在苏联和其他国家公开走向非斯大林化的那种形态上也打破了社会主义的框框——这是完全没有怀疑余地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召开，赫鲁晓夫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日译者），虽然对波兰的形势发展给予了强烈刺激，但是那仅仅限于削弱既成体制，对运动的压力增加勇气，而不是在意识形态的鼓舞的意义上。复兴运动越出了一切官方的意图远远走在前头，因此被打上了修正主义的烙印。从这一点来看，同发生动乱以前的匈牙利的发展有明显的类似之处。

波兰（以及匈牙利）的运动和公开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并且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1961年10月召开，再度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日译者）这个运动达到了顶点时）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在于：波兰的运动无论如何是具有作为来自下面的群众运动的很多特征的。大部分是由党内知识分子带头——或者是由知识分子所明白表现的，这样说可能更好些——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获得工人的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那不仅是在1956年6月的波兹南暴动的破坏性影响这个意义上的支持，他们支持全面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改革努力，并且也是在很多工业企业里自发地成立工人委员会这种直接形式上的支持。当然，必须自己警惕事后的赞美。在运动最强有力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华沙和许多新工业中心地），尽管有反对知识分子和改革派的保守宣传，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合却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在缺少“政治文化”传统的其他地方，例如在上西里西亚，工人的反应是很好的。至于农民，虽然对反对集体化的潮流和1956年十月事件的民族因素的支持（和

其他社会集团的情形一样) 曾经是强有力的, 但却很难证实有什么直接的政治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 波兰的“十月”曾是来自下面的运动, 而它又有区别于在时间上曾经是并行的匈牙利的运动的某些特征, 这些特征在今天也被看作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其后的发展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就是说, 波兰的运动, 在党的机构、军队并且直到保卫部门为止的等级制的上层中得到了支持。哥穆尔卡成了过去的悲惨局面和社会主义复兴的象征——这意味着向现在或将来的党的领导内部的“进步的”、“民主的”一派发出呼吁, 做了一切努力来取得居民大众的支持以确保他们的胜利。因此, 没有为真正的社会化过程创造出政治前提, 与其说是由于对党的领导作用提出了不同意见, 不如说是由于党本身或党的存在理由发生了变化。这样看来, 波兰的运动无疑是十年后在捷克所发生的远为广泛、更加成功的运动的前驱。这种特征, 许多研究家〔例如立塞克·科瓦考夫斯基 (Leszek Kowakowski)〕都看作是东欧“修正主义”潮流的最重要的特征。为了内部的变革过程而获得党的领导权现在是否还有可能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 这将决定上述定义的“修正主义”的未来。今天, 当他们否认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也就是把东欧“修正主义”看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一九五六年以幻想破灭而告终的期待

无论对以上结论采取什么样态度, 1956年想通过党的变化来达到东欧社会主义的真正改革的波兰的尝试, 它终于以失败而告结束, 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匈牙利革命是由于苏联军队的野蛮干涉, 在流血中被窒息了, 那末波兰的十月事件首先是当它在做正常化努力之际, 得到

苏联及其集团其他各国领导支持的内部保守势力进行了煞费苦心，紧接着就被迫发生了形势的倒转。哥穆尔卡的掌权曾经被认为好象是一个胜利，并且绝大多数居民和大部分复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曾祝贺了这一胜利。但是实际上，这是寿终正寝的开始。运动逐渐地而且持续地开始倒转，那就是要使波兰的制度在本质的方面（即使不是在所有的方面）同其他东欧各国相调和。

这里，几乎不可能深入讨论这种失败的原因。一般的通例是举出两个互相联系的因素。那就是外部的情况，首先是苏联的看法；第二是国内的抵抗（这在社会学上是用权力的杰出人物、党和国家机构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来加以说明的）。但是，这里我想举出一个从来很少讨论过的对群众的过多的乐观主义的因素。这种乐观主义是扎根于如下信念的，即只要认识斯大林主义的“变质”，解决这种“变质”，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的纲领（或者展望）只要获得群众的支持就足够了。不仅是由极少数人在外国的影响占优势情况下所强加的、再加上在最初的十年中间，证实了最粗暴的反共主义的预言和警告的一种社会主义的抉择，没有得到民主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提倡者们的正确评价。实际上“修正主义者”遭到了来自上面所说两个集团的追随者们的十字炮火的攻击。为了实行真正的改革，他们曾经是需要群众的支持的，但是，也由于这一点而不能不害怕陷入那些往往是极端野蛮的、抱有排外主义观念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手中。这件事情使得他们选择了同“党的统一”的代表者们进行妥协，而后者由于这一点就消除了若干压力，并且找到了把一部分叛逆的活动家统到现有体制中来的较好的可能性。匈牙利的经验，使得人们觉悟到若干重要真理。它不仅使人想起苏联的铁

拳，而且也表明：当一向以合乎人性的、合理的而自负的体制长期暴露了犯罪和违背道理时，人们是如何地不愿接受“好的”社会主义和“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微妙区别。

这并不意味着东欧的民主改革从一开始和从定义来说就必然要遇到挫折的命运。毋宁可以说，波兰的尝试在很多点上成功的。相反，捷克的运动——从波兰和匈牙利的失败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被它的敌人评价为在其内部是很难克服的，正因为这样，他们退而依靠了军事入侵（当然，勃列日涅夫等人所做出的这种估计决不意味着布拉格之春的最后成功）。即使不把事态看作是结束了，无论如何也必须考虑到东欧过去的经验对人的意识的作用所产生的巨大困难。当我们慎重地推测东欧变化的可能性、探索西欧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就是这件事情。

连续性和变化

这里，我首先想要加以探讨的是，1956年的要求和压力，对于波兰和其他东欧各国今天的问题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了要完全彻底地考察这个问题，不必说有必要对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变化进行分析。可是，这将会超出我的这个讲演的范围。我是以大家都已充分知道经济增长所达到的水平和它给社会结构带来的结果为前提的，那就是都市化，许多落后地区的工业的进步，农村居民的相对比重不断减少，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今天的波兰（对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可以这样说）同二十年前在历史上虽是暂短的、但却是多灾多难的斯大林主义时代勉强摆脱出来的波兰，是极不相同的。按照爱扎克·多伊察在他的《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所叙述的某

些主张来看，在这里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波兰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脱离了它的大部分曾经是农村出身的第一代这个阶段。城市居民的增加，已不再能完全归之于人们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结果了。尽管如此，对这种进步同体制的民主化之间期待有直接的、差不多是自动的相互关系——即使决不能否认它们的间接的长期的相互作用——它的根据还非常不足，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

在谈到民主化的失败时，我并没有放过1956年以后，大部分是在当时的事件影响之下所发生的变化。大量的预防性恐怖换成有选择的恐怖这件事情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分。在对外政治方面，首先对苏联，一定的条件已经制度化了，这很重要；因此，苏联（尽管它的领导地位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也就必须遵守一定的准则。就经济方面来看，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无疑在制订计划或执行计划上都远比过去增加了。消费在很长时期里，每当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时候，那末首先牺牲的只不过是手头的储备而已；现在则成了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那就如同1970—1971年以及1976年六月事件所表明的，要发生毁灭性的结果。

这种表格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但是我的意见是，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如下的事实，即如果丝毫不触动体制原理的种种前提，权力就照旧集中在处于统治地位的寡头统治者手里。由于我把东欧的政治体制叫做全体主义，我常常碰到矛盾。这个概念被许多人认为不确切，他们想要使它仅仅适用于实际上一切都是通过由等级制的秩序统制和命令来推动、避免一切内部纠纷、连基础的反应也不在乎的那种纯粹模式。我所用的概念，可能也不是那样纯粹和正确的，但是，在我的著作《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体制》（英文版第141

页)中,如同下面那样,我想是完全适用于富有特征的现实状况的。

a. 相对于正式选举所选出的国家行政、工会、党等等机关来说,机构(apparatus)和执行机关处于优势地位。

b. 同指定候选人和选举手续的纯粹形式化相通的、由上级机关来分别任命党、国家、工会和其他组织的机关。

c. “党的领导作用”意味着通过完全控制人事政策,禁止一切独立的政治活动和未经许可的结社等等,使其他一切制度上的机关从属于党的机构。

d. 通过“人事”的控制和全面的事前检查这两方面,对宣传工具的垄断。

因此,社会的每个成员就处于如下的问题状态中,就是说作为原子化了的个人(完全没有明确的自我表现,不具有组织,不行使统制力,完全没有政治的或者合法的可能性的个人)与领导阶层看作对体制的职能来说是本质的东西、即实质上在生活的一切方面行使权力的国家成为鲜明的对立。我把这种状况叫做全体主义。并且我认为,过去二十年间在东欧,这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地区”——不是制度原理本身——似乎发生了变化。从1956年的地点的后退,并不意味着当时所建立的制度到了瓦解的地步——倒不如说它被剥去了真正的内容,才比较确切。在波兰,法律上仍然规定可以比按选区指定名额的办法提名更多的候选人——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实际上有选择的余地。工人委员会虽然照旧存在,但是,没有人把它看作是共同管理的机构或者是代表工人利益的东西。同样的,就统一工人党同其他政党的关系,工会的地位,听取居民的意见等等来看,也可以这样说。在这一点上,唯一的例外——在政治上有非常大的重要性的——是

天主教教会。一般只是正面的表面上的利用（或者保存）。就经济管理来说也是一样，在这里，正式宣布的改革同实现了的改革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就关系到决定权的再分配和刺激体系的变更等等来看，距离仍然是非常大的。

意识形态和现实

今天这种形式的体制，根本没有变化，1956年10月的要求和希望还没有实现。但那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那实际上是否会引起和扩大适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一致的范畴的那种冲突呢？我曾经努力用这个概念来阐述东欧的状况，当时我所坚持的论点有如下两点：第一，在那里，公有制并没有成为社会所有制，因为，在统治的状况下，国家决没有代表社会、社会利益和社会意志。第二，这个事实，对切合实际地利用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可能性来说，成了最大障碍。在这里，虽然不能详细叙述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可以对照波兰最近的事件，仅仅列举出若干明显的结果。

扼杀自由——同斯大林主义相比，即使在“软的”今天的形式上——从根本上断送了人的创造力、创见、做出理智的决定的可能性、对共同努力的思想准备等等。其结果，“我的东西”和“他们的东西”之间的深刻矛盾照旧遗留下来，这时候共同所有制（公有制）就意味着第二位的概念。尽管如此，以“一切权力归人民”、群众参预决策过程等等为基础的社会联合，仍然是正式的意识形态，并通过一切途径对此进行说教。这种意识形态是不能放弃的——归根结蒂它也是体制的合法性的根源——但是，它却作为同社会主义的道德崩溃这一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出现在人们眼前，产生着需求不能满足和犬儒主义。不仅是这样，显然引起了对资产阶

级的成功和消费模式的赞美的这种倾向，实际上（虽然不是写在纸上正式公布的）这可能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是由于对领导阶层来说只意味着是一种威胁的那种活动，而却是由于政府的奖励。从统治阶层人们的观点来看，这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首先会把人们置于这样的状态中，即努力想要实现根本性政治变化的人们，在重复了空无所获的尝试经验之后，他们具有比丢掉锁链更多的东西。

这种政策，如同在东德、在被当作“启蒙的共产主义”模范的卡达尔政权下的匈牙利那样，虽然部分地暂时得到成功，这在1970年以后时期的波兰也是一样。但是，将紧接着正在遇到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对许多人来说，自由本身是好事情。同苏联相反——或者说同苏联的大俄罗斯人的部分相反，也许更好——在其他东欧国家，自由的丧失，是不能由大国的地位得到补偿的，在大部分情况下，甚至民族压迫感还继续存在。即使把这种情况撇开不说，但是在到这里为止所叙述的那种条件下，对于物质福利的朴素的信赖，带来了加速社会瓦解的结果。它首先作为限制个人向上的可能性的结果，使个人与社会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冲突尖锐化。但是，最重要的是，要使这种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就要有经济成就的不断上升为前提，不过，这——如果我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分析是正确的——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范围内是不可能的。把哥穆尔卡从宝座上赶走，使他深切感到工人阶级潜在压力的、1970—1971年波兰的风暴，使得以盖莱克为首的新领导者们，采取了突然增加投资同时又扩大消费的政策。当然，这并不是通过根本性改革、而是通过大量吸进外国资源（西方的信贷）

来达到的。这曾经被认为是暂时争取时间以及也许是一瞬间的冲击，但是过了三、四年之后，经济本身的势头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上升。结果是计划的量的差距明显地愈来愈严重，是表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意见交流全面崩溃的一系列手忙脚乱的措施，是从提心吊胆引进的、零零星星搞的经济改革后退的征兆，等等。仔细地看看最近波兰的事态，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全体主义的体制是它最大的长处，就是说，甚至可能失去了追求始终一贯的政策的能力。

这里，我不想给人一种印象，即在目前的统治状况下，摆脱目前的危机（以及同样的将来的危机）的一切出路都被堵塞了的这种印象。因为，事态是可以改变的，体制的若干要素也是可以修补的（例如，就纯粹经济上的改革来说，也是可以期待有某些进展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紧张，也可以长期或短期地至少缓和到不至于达到爆炸的程度。此外，再考虑到国际形势，那末，如果有谁预料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崩溃或者生活水平和社会的、文化的进步全面停滞不前，那将是错误的。但是，我不想改变我的意见，就是说，如果必须打破现有的循环论证（*circulus vitiosus*），达到可以满足扩大的居民需求的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那末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就是必要的。这种变化必须是能够为了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成真正的社会所有制创造条件。否则，现有的矛盾将会增长，将会对生活的一切方面日益发生消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前所叙述过的问题，就仍然是现实的，十月运动所提倡过的解决办法，仍然没有失去重要性。

展 望

最后的问题是这样：假定变化的必要性已经得到证明，

那末存在着什么样的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即使仅仅为了对这个问题做初步的回答，只是进行经济的、社会学的或者一般政治的分析也是不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不是通过理论的考察，而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的、关于很多难于掌握的因素的精确知识。我不具备这种知识，当我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做两三点发言的时候，我的意见特别是以1976年在巴黎共同讨论“1956年”时所听到的、有这种资格的人的意见为依据的。

1956年在波兰所追求的、又于1968年在捷克所追求的那种政治体制的或多或少急剧改变的展望，由于内部形势和苏联干涉的威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已经不存在了。看来所能采取的唯一道路存在于为争取改革而逐渐发展市民的自由和为了争取保障人权而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同1956年的尝试的基本性质（前面已经概略地讲过）不同，这个进化，将不是通过诉诸党的最高领导的一定集团，同他们结成联盟来促进，而是通过诉诸舆论，从外部对党的最高领导施加压力来促进的。这并不意味着不会从党内涌现出具有往往从纯粹实用主义的根据来接受改革的必要性的倾向的个别人物或集团。但是，这也将取决于以传统的联合几乎不可能有的行动自由和确定目标为前提的、从外部来的压力的强度和效果如何。这种“新的进化论”的最重要的要素，显然是对表明了有从最高领导取得重要让步的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承认。要使过程开始动起来，这种力量必须同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声音相结合。不能不提到波兰的一切反对派势力都强调天主教会的重要性这件事情。很明显，这个天主教会把反对社会主义改变为反对全体主义，在今天，不仅是在为争取良心自由的斗争中，作为工人的罢工权、真正的代表权等等的捍

卫者，它也发挥着很大作用。

这个简短的总结，与其说它回答了什么问题，不如说它引起了更多的疑问，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作为问题之一，应该保持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致性这个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新的“进化论者”促请人们注意如下事实：向着削弱全体主义体制、给自由思考和自由行动的人们增加勇气的方向所迈出的任何一步，都是向着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创造必要前提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在这里，这种前提是否就足够了，那是另外的问题。

这个讲演，决不是想要唤起轻率的乐观主义的。相反，对于1956年的希望同今天的现实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的比较对照（confrontation），倒是沮丧人们的意志的。尽管如此，也存在着可以达观一些的原因。当然，波兰就不用说了，即使在东欧，正在缜密考虑改革的思想并向着改革努力的人们并未绝迹。我认为，理解这一点，并从这里引出结论，这对于西方的左派、工会和政治运动来说，并不次于对于智利或者南非的态度的重要。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对发源于苏联的东欧（社会主义）的变质，至今还在付出很高的代价。现在，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对于欧洲共产主义也同样可以这样说——正在试图通过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从这种高昂的代价下解脱出来。我的意见是，仅仅那样做是不够的。必须积极支持可能对改革的要求成为重要的那些构成要素。

（1976年12月7日拙著《社会主义所有制与政治体制》一书接受爱扎克·多伊察纪念奖时，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做讲演的原文。1977年以《从哥穆尔卡到盖莱克的波兰》为题发表在《维也纳日记》1977年第6期上。）

第十一章

实行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可能性

——对二十一世纪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

《二〇〇〇年的恐惧》这个题目，是在经济以及同经济密切相关的人口学的领域里，以明白易懂的形式提出来的。即使站在梅多斯（Dennis Meadows）的《增长的限度》（纽约，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日译者）中所描绘的那种命运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观点上，也同样必须承认该报告在环境、地下资源枯竭、粮食不足等问题上提出了非常重大的问题。其中最后列举的粮食问题，特别在本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将会成为对人类的最强大的压力。当我们以第三世界的很多（即使不是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学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为背景来考察这个问题时，尤其是那样。至于通货膨胀问题，在我看来，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直接的人为的问题），不过它也在以下两点上有关系。即第一，它反映了起因于滥用资源的一种恐惧；第二，它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所感到的沉重负担，特别是起着使国际经济关系瓦解的作用。

对于所预见的恐惧的回答，不可能是使经济增长停止下来，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相当明确的。很明显，“零增长”这个概念，即使被狭窄地理解为增长是国民总产量（GNP）

的量的增加，对于贫穷的国家来说也是难于接受的。在这些国家里，即使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消极的副作用，经济增长也是改善生活的质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对于先进国家来说，零增长的要求也是难以接受的。一是由于零增长会带来爆炸性的内部结果；二是由于仍然存在着促使人类生产潜力一般发展的余地（在这里首先考虑到的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与其说在今天不如说在未来将成为克服上述种种问题的主要前提。因此，对于同二〇〇〇年的恐惧作斗争来说，合乎目的的不是零增长，而是有选择的[·]增长。这里所说“有选择的”，有多方面的意义，即规定每个部门（农业、工业、工业内部、其他）不同的增长率，把重点放在对各种可能满足需求的形态（原有类型的物资和服务的消费，削减劳动时间和减轻劳动场所的紧张程度，改善环境，等等）上进行多种多样的改变，而这一点可以按照世界各地区和各个国家内部的需要，采取地区的模式和解决办法；以及其他等等。同有选择的成长以及同它的实现方法有密切联系的是，收入和福利的分配问题（不仅是同一代人内部，也包括不同几代人之间）。

研究为了导致上述意义的有选择的[·]增长而采取“自由主义的解决”方式的有效性，并不是我的课题。尽管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的背景，这里指出若干问题，也是符合我们的目的的。在经济领域里，采取自由主义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信任产生的，这种市场经济已不再是完全自由地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发挥职能的，即使这样，也要尽可能减少政府的指示，并且政府的干预要大体上限于紧急事态和同垄断的习惯进行斗争（一般地说，成效是很可疑的）上面。始终一

贯地采取“自由主义的解决”方式，即使从过去的经济活动的要求来看，也几乎是不能想象的。扩大投资决定的目标和远大的时间视野，以及与此相关的不确实性因素的增加，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必要性（这一点，即使是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的场合也越出了个别企业的范围），包含“人的资本”（这在多数情况下不如说要被列为第一位）在内，对社会资本的发展的依赖程度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越出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范围。因为市场经济主要是作为对把过去和现在当作对象而决定的，并不是面向未来所设定的信号（Signal）来反应，并且发展过程是把短期当作对象不断进行“试误”，它被看作是多数个别决策的一种结果。收入不平等和“扩大倾向”象网眼一样交织着，使得自由的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形态被认为好象特别不适应大胆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因此，过去五十年的世界经济史，特别是1945年以后的经济史，在西方表现了国家干预的相当明显的倾向，这决不是奇怪的，这种倾向差不多已经成了偏爱“自由企业制”的保守政府也不可能使之倒转的一种趋势。虽然如此，并不应由于这一点而否认“自由市场经济”在今天的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个问题留待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的讨论中，再简单回顾一下）。但是，必须否定“自由经济”原理在今天还有资格自称是分配自然资源的最好模式。如果以“有选择的增长”的严格要求作为尺度，那末这就更加如此了。不过，这种观念并不是建立在现在的市场信号的外来的基础上，而是以大规模的长期的远大目标为依据的。这种决策，很多是以完全不同于市场情报的情报为根据而做出的（例如技术和社会的变化或变动，对社会的、经济的可能性的判断，等等），当然，这时这些情报，哪些是符合愿望的，

哪些是不符合愿望的，必须通过明确的概念加以澄清。

正是这一点，有目的意识的行动的必要性，在同二〇〇〇年的恐惧的斗争中，使得“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被认为是非常有魅力的。不用说，这同那种预言由于社会主义的变革而充满了一切矛盾和痛苦的困境的结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末论的方面，是没有任何联系的。这种观念的非逻辑性，如果自觉到归根结蒂是站在假定排除了资本主义的阻碍发展的因素，则本来是容易达到（如此错误地想象）的饱和状态的前提上，那末就越发清楚了。虽然是一种反话，现在的社会主义的魅力是从正相反的根据来看的。因为社会主义证明了更适合于克服产生全面贫困的问题……。

因此，社会主义之所以有魅力的是，它被认为好象创造控制增长过程的前提条件；因为这样就被认为好象可以把增长过程同使经济有活力的希望以及选择性的要求调和起来似的。如果我们采用最一般的、而且争论最少的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即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的管理责任属于中央当局那样一种制度模式，或者用另一个表述方式，那就是，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不是属于私有领域而是属于公有领域（按照熊彼特的说法）那样一种制度模式，那末也可以假定，这样的制度倒是使合理的经济管理成为可能。而且其理由是：（a）按照总的利益标准来分配资源；（b）因为有可能选择适当的增长率，并使随后的实现以及排除周期变动成为可能。后面这一点是以使总需求适应总供给（特别是作为合乎目的的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的可能性为根据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制订有效的宏观经济计划的可能性，从而排除不确实性因素（或者显著地减少这种因素），并且，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达到“外部性的内部化”，也

就是，根据社会的利益和社会的成本计算做出决策。同这一点相联系，不仅要谈到存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管理，而且也要涉及到有控制的收入分配的可能性，这是很重要的。凭借这种可能性的帮助（通过把个人收入同个人的地位分开，广泛地推进收入差距的拉平），可以成为促进必要时的自发献身精神，使社会的消费行动同个人的消费行动的分裂缩小的条件。当需要把资源置于控制之下，制止浪费资源的时候，这件事情将具有特别大的价值。

关于对未来的预测（不是终末论的，而是实用主义性质的），就讲到这里。如果同它比较起来，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可以在世界各地十分宽广地来追寻这种经验的迹象，从这里引出结论——怎么样呢？毫无疑问，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一种概括的回答。因此，我们必须简单探讨一下非常复杂的形象的两三个构成要素。

一方面，首先，社会主义经济的能动的潜力是必须承认的。不过，这对于证明目前所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绝对优越性的主张，还是过于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不管它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如何，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它动员经济发展的潜在因素的能力。就是说，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1945年以后的东欧，以及中国和古巴，都是如此。当然，也可以看到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同样（或者比较出色的）经济增长成功的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子；但是，一般地说，作为整个制度的形象（虽然在以前的经济史方面以及在资源分布上各有若干差异），社会主义制度却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并且也是独一无二的。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常常带来应该叫做平均主义的（特别是同以前的收入分配制度相比，或者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当作标准的東西相比）收入分配

制度；不过革命后初期的极端平均主义，已经开始不得不让位于有等级差别的工资和收入制度。最具有特征的是（这大概与其说是指苏联，不如说是指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消除了下层的可怕的贫困和上层的个人的奢侈消费这种收入分配的两个极端。与此有关的是，由于教育上措施的大幅度的集中而扩大了“人的资本”，这也是值得提一下的。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农业的发展，至少到五十年代末期为止，是不成功的，在苏联，甚至是灾难性的。因此，在同饥饿进行的斗争中，社会主义长时期地几乎毫无贡献。不过，中国的经验证明，那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社会主义可以有助于有效地解决不发达而又人口过剩的国家的饥饿问题。斯大林死后，东欧各国的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左证，证明社会主义作为整体有能力处理复杂的重担，就是说，要同时实现相对高的增长率，比较保守但却踏踏实实地提高生活水平，以及最终消费物资价格的缓慢（一般地来看时）上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也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提供了证据，证明它有助于扩大世界可能利用的资源，并且有可能实现有计划地分配资源，以及对特定部门和领域进行有控制的投放资源。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那些形态的社会主义，恐怕只有在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以导致新型的“产业革命”为任务时，才获得了最大成功。

在这种形象中，还有另一个侧面，这是不说自明的。首先必须指出的就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实际成绩和成果是花了很高的代价的，而且这不仅是就物质耗费来说是这样，就人们的生活条件来说也是如此。就第一点来说，三十年代在苏联建立的、后来又被引进“人民民主国家”中的“中央集权模式”的极端集权的等级制的管理制度，总是追求单纯量上的

目标，而对于节约劳动力、物质耗费和资本耗费以及改善产品质量和符合消费者需求等目的生产结构则不去作相应的考虑。即使把这种直接的浪费撇开不说，那种制度所带来的间接浪费，即在技术革新和机构革新方面的可能性因没有被利用而产生的浪费，也是不能忽视的。社会主义各国固然没有一个国家是站在工业化的最前列的，但是，不能不使人吃惊的是这些国家对于技术进步和机构的进步的内生的（endogenous）贡献是多么微不足道。就是说，甚至其中最发达的国家，竟然也以完全模仿为方针。要说明它的理由，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我认为，主要原因应该在（没有形成进取精神和完全缺乏有利于实现研究成果的制度上的前提（经济的和政治的））。这最后一点，在军事部门得到证明，在那里保守主义是“当然”倾向，由于巨大权力的集中，使其进步被削弱，利用技术的进步和结构的进步，何其惊人之少。

这里所出现的低效率，和它为军事扩张目的从国民所得中所占的高比率，相形之下，它给人民所带来的成果是多么贫乏而不相适应。由于人民在经济上的失望——特别是用那幻想的美好的诺言来衡量时，不得不使人民丧失对政府的支持的信心，因此这也使政府方面陷入更多地采取加紧控制和对抗措施的手段。这种事情固然并不意味着从经济上的不成功而推导出共产主义制度极权主义本质来，但是，它却表现了对于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许多方面之一。不仅是斯大林时代的强力的大肆镇压，即使是今天所使用的“柔和”形式的剥夺自由，如果长期继续下去，也会对经济活动能力发生深刻的持续的影响。因为它会把人的创造力、创见和慎重选择的可能性，以及共同努力的决心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研究题

目，但是很明显，今天所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损害了生产资料真正社会化的道路。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意味着通过把生产资料的管理交给人民来保护人民的利益。因此，在“我”的东西和“他们”的东西之间便被深刻的矛盾所支配着，在这里后者是指所谓“社会的所有（制）”。

这种矛盾，不仅对使国民经济的利益从属于自己利益的个人（家庭经济）行动发生影响，而且也影响掌握国民经济的人们的行动。他们常常过分地把家庭经济当作“外部的”东西来对待。这往往又带来关于环境问题特别令人吃惊的副作用。因为为了国民经济，以环境的恶化为牺牲而实行节约固然不是很少见的，不过那也是因为“外部性的内部化”终止在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之间的分界线上。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使自己所特有的消费行动（如果用更好的表述）、自己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有所发展这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至少是部分的），如果溯本追源也会通向这个矛盾。相反地，社会主义各国（虽然总是多少有些迟缓）却模仿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作为典型的事例可以举出：非常奇怪，在私人生活使用汽车上所发生的几乎一切缺点原封不动地重复着。这看起来也许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但是如果在比较更广的展望中来理解，则决不是那样。通过一切教育手段不断被灌输的公式的意识形态，是以“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口号和广泛参预经济决策等等为基础的社会联合。这种意识形态是不能放弃的——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它同现实之间的矛盾，就产生社会道德的崩溃和幻想的破灭，而这又想在私有形态中保持于自身无害的努力上找到当然的出路。对资产阶级的成功模式的赞颂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的向往，也是政府（特别是在发展阶段较高的

国家)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总比对制度来说会成为危险的其他很多活动要强,从而常常乐于接受(尽管如此,与其说是口头上,不如说是在实践上!)的结果。

由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所付诸实行的社会主义远远没有回答期待的另一个领域,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从对二〇〇〇年的恐惧的斗争观点来看,这种关系会起重要作用。因为在这种关系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资源转让和增长率的差别安排等问题成了需要加以解决的课题。特别是象在苏联、中国、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它们都是可以以在自主基础上进行了革命而自负的国家——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废除了资本主义并没有能够消除尖锐的矛盾。在属于“经互会”国家集团的内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间的初期的不平等关系,(例如价格的不平等),留下了长期不断发生互不信任和互相怨恨的气氛;即使到了今天,它也是互相合理调整经济政策和合理分工的障碍。尽管官方正式宣传中大肆宣扬社会主义的一体性,但是民族感情却显示出非常高昂。

这篇经过压缩的讨论,不应成为某种严密结论的基础,并且我也没有这种意图,这是不说自明的。把社会主义的启示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加以对证,存在着几乎是没有完的不同看法,这表明即使是进行我的文章无法与之相比的、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详细分析,也不可能成为对问题的最后的解答。尽管如此,从我们关于赞成和反对的两种论点(即使对每一个论点只不过做了素描,或者认为它是不适当的)中,可以明白地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所统治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不是一样的),是处于对二〇〇〇年的恐惧的挑战给以回答的立场,这就是结论。如果把斯大林时代的极端过火行为看

作属于最后的已成过去的东西，那末社会主义经验的某些方面，对于它的生存问题的解决，以及工业化初期阶段所可能利用的模式感到迫切需要的广大不发达地区来说，具有很大意义。与此完全一样，社会主义制度的若干方面（例如物资器材由中央分配）——不是由于战争，而是由于原料不足或者制度结构的崩溃——对于陷入危机状态的先进各国来说，也有可能加以利用或者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不管社会主义解决办法的这个方面多么重要，多么有意义（而对它估计过低可能是错误的），它并不是我们必须对它找出答案的中心问题，更确切地说，不是全球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对于同二〇〇〇年的恐惧进行斗争所能提供的解决模式的长期的、一般的适用性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我们在这里同重大的矛盾发生了关系。一方面我相信，我们在同贫困、饥饿、不公正和掠夺原料等等的斗争中，从全球来看，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象今天东欧、亚洲和古巴所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它的实体来说，既没有应付这种挑战的能力，从它的政策来说，又几乎不适于吸引那些注重人的自由的价值的人们。

不久以前，我在东德的一位出色的科学家、纳粹的反对者、多年的共产党员罗伯特·哈夫曼（Robert Havemann）的论文中，找到了同样的结论。在《苏联、索尔仁尼琴和西欧左派》上刊出的题为《自由与必然》的这篇文章里，哈夫曼写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警告之声正在高涨。终于出现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但是，为了有效地防止日益迫近的危机，本来应该建议的是处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每个人来说所可能考虑的可能性范围以外的事情，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为了把‘防止危机’付诸实行，我们就必须放弃我们的

自由民主的秩序，而代之以权威主义的独裁体制，这是西方一位好朋友最近对我讲的。那末，是象我们的这种体制吗？——这是我的反问。而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个回答中，表露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背理。因为，这个回答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我的对话者同意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相反，他不仅是怀着恐惧的念头来看这个‘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而且认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这个解决办法是完全不可能的，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在身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我的朋友们的回答当中，也体现了西欧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的深刻的失望和幻想的破灭。对自己的政府失去信任的人民的‘作为必然性的不自由’的体制——对这种‘社会主义’，甚至在自己所支配的领域里，也提不出任何展望。”

哈夫曼的文章是对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戏剧性的呼吁，他是说，否则我们就要失去唯一的解决可能性。可能他有些过火了，并且他的公式化的方式也确实情绪过激了。但是我认为，他指出了现实的抉择。有没有这种抉择的出路呢？这取决于被认为不可避免的变化的性质，以及对这种转变实现的展望如何。

一般说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和两种层次上来进行探讨。第一个方面在如下的提问上达到顶点，即东方的转变是可能的吗？而第一个（较低的）层次，则与以扩大灵活性、扩大成本计算的重要性、加强经济活动刺激方面的个人利益同一般利益的结合等等为目的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关。这种改革，常常被叫作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范围内的、向有管理的市场经济的过渡。作为它的实例，与其说南斯拉夫，不如说1968年以后的匈牙利更恰当。长期以来（确切地说，

1956年以后)，在东欧，人们是支持了这种改革的，但是，它的成果是贫乏的。其原因很多，不过我的意见是，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且，新制度是由于担心党的领导的政治垄断有可能瓦解而产生的〔特别使人不高兴的是以加强企业自主性为基础的、工人的真正自己做出决策的思想〕。但是，在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并且同时对消费给予较多考虑这种双重必要性的压力下，看来也有可能比过去倾注更多的力量来促进经济改革。从这个观点来看，也许可以期待有某种改进，以这种改进为开端，也许可以希望实行真正的突破（也就是通过解决长期的经济问题和通过对作为可以接受的制度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认来突破）。这在对西方民主政府的经济成就正在广泛扩展着幻灭的面前，也许看起来象是奇怪，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所需要的是（在我说第二个、更高的层次时，所指的就是这件事情），权力结构的民主化，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资料真正移交社会管理。现在，在这个座谈会上，对于目前的极权的社会主义转向民主的社会主义，或者从独断独行的中央计划转向民主的中央计划，对于实行这种转变的实际可能性进行忆测，不是我所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问题的解决。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意义的转变，预料将是怎样的呢？这种转变，可以认为将是伴随着适当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向有效率的中央计划过渡等等。但是，在那种情形下，必须保持政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和中央领导与自由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必要的平衡。这种性质的转变的成功，不仅它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东方世界的发展也将发生不寻常的深刻的影响。不过，在这里，我想也没有哪一位会期待我做出一定的预言。

这个探讨的目的，不是要从社会主义的职能的观点来衡量对于社会主义的赞成和反对，并且也不可能是那样。我的唯一意图在于表明问题是多么复杂。而把这个探讨进一步向前推进，阐明把社会主义的解决方式的理论上的实现可能性变为实践上的实现可能性，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我想这种探讨仍然是有价值的。

（1975年9月向在巴黎近郊由人文科学国际财团主办召开的《二〇〇〇年的恐惧》座谈会提出的报告原文。1976年由法国阿其特书店出版法文单行本，德文以《对二〇〇〇年来说的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L76》季刊第1期上，克隆，欧洲出版社。）

译后记

W·布鲁斯教授于1979年12月至1980年1月第一次应邀来我国访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报告会和座谈会上，谈了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和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这里译出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是他在1972年离开波兰以后在国外出版的。书中收入的论文是在1964年到1977年之间写成的。他的第一部著作是1961年在华沙国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问题》。布鲁斯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决策和决策主体，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为宏观经济决策，第二层为企业一层的经常性决策，第三层是家庭或个人的决策。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他努力发展不是集权性质的“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构思和理论。一位捷克的经济学家赛卢茨基在他的《东欧的经济改革》一书中，提到了布鲁斯教授的这个理论，“给予了1960年代的匈牙利和捷克的经济思想以很大的影响”。

布鲁斯教授一贯追求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特殊关系，他认为在国家所有（制）统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一种“倒转”，“所有（制）的性质由权力的性质来决定，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依赖于政治关系而确立的”。因此，他提出了“作为过程的社会化”的思想，如要将“国家的所有”改变为“社会的所有”，就必须要有“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对于这个思想，作者在他

的第三部著作《社会主义的所有与政治体制》（1975年）中，作了更系统的更深入的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

布鲁斯1921年生于波兰的帕劳克。莫里斯·多布对他的生平已有介绍，不再重复。自1972年起，他移居英国，担任格拉斯哥大学客座教授、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客座教授和研究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客座教授、高级研究员。他最近的主要著作还有《民立的社会主义计划有何优点？》（1979年），《东欧改革，它们的结果如何？》（1979年），以及《经济制度变革的方向》（1979年）等。

中文版是根据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佐藤经明的日译本（1978年11月岩波书店出版），并参照了英译本。中文版的书名也采取了日译本的书名，因为日文版是在作者参加下形成的。布鲁斯教授特意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指出：“本书出现在中国的知识界，……其意义不论多小，也不同于一般。”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